

陈述黄埔

54 黄埔四期生黄应龙的长征路 / 陈宇

百岁黄埔老人

60 百岁黄埔老人袁开宗 / 林开伦

63 百岁黄埔寿星韩杰茜 / 孙立新

我的黄埔前辈

65 追寻黄埔生郎成栋的足迹 / 郎瑞敏口述 庞世娟整理

历史

口述历史

70 抗战胜利后赴台轶事 / 宋衡夫

黄埔往事

72 《良友》画报中的“八百壮士” / 姚新婧

黄埔研究

77 中央伤兵管理处的组织管理系统(上) / 杨守礼 黄胜利

黄埔收藏

84 我珍藏的中央军校《地形学教程释要》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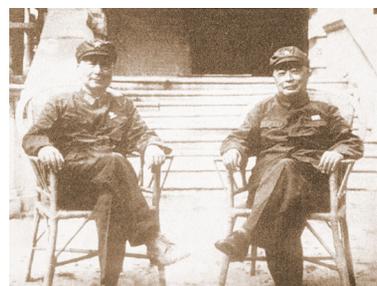
91 1926年4月19日,黄埔军校任命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代本校教育长 / 贾晓明

黄埔连载

95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七) / 熊子杰



双月刊 单月1日出版
2022年 第3期 总第204期



48 聂荣臻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纪念聂荣臻逝世30周年



63 百岁黄埔寿星韩杰茜



70 抗战胜利后赴台轶事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Android

ios

卫国御侮战淞沪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 90 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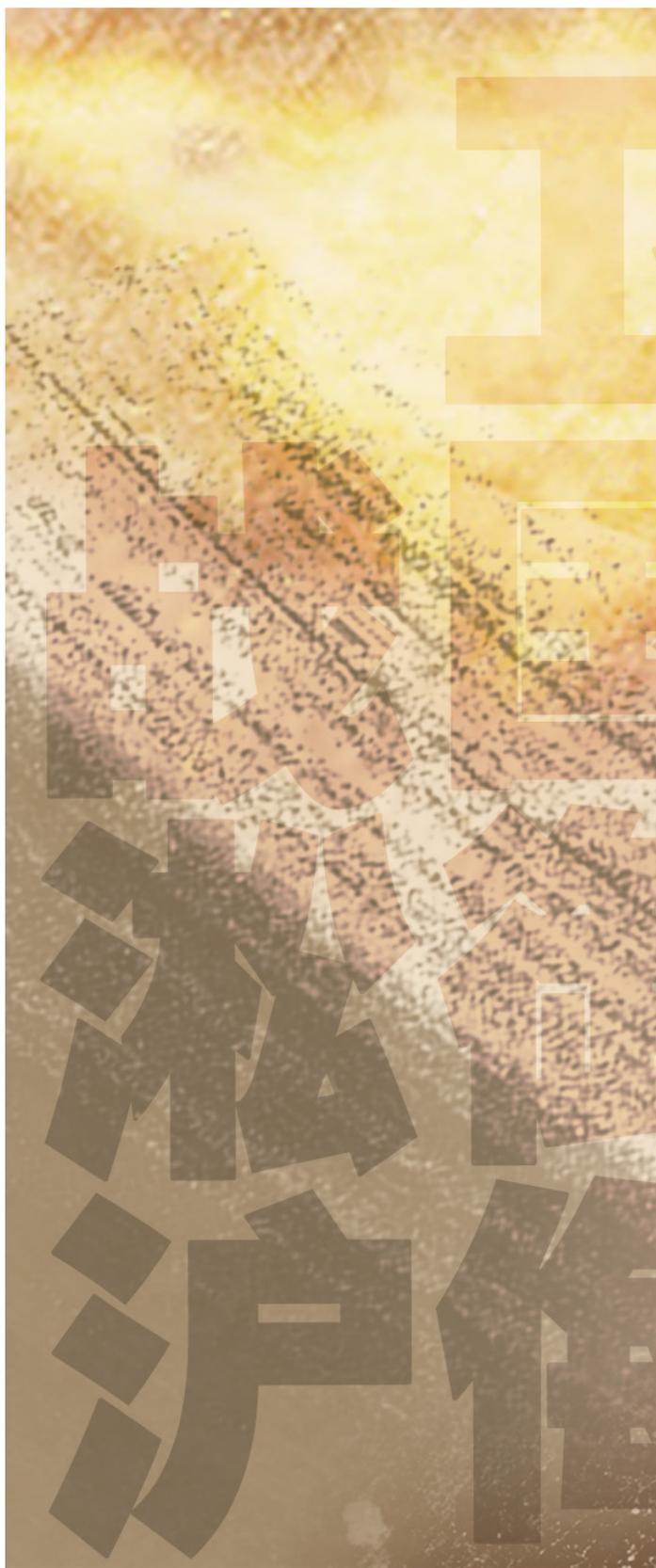
□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供稿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外交副中心。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港和守卫长江的大门,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因而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觊觎的一个战略要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发动了对淞沪地区的武装侵略。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驻守上海的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曾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抱着“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的决心积极请愿,率第5军增援淞沪战场,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全力支援,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最终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一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助推了民族精神的空前高涨;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被称誉“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宋希濂、黄梅兴等一批黄埔爱国将士挺身而出,奋勇杀敌,用鲜血和生命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注入了鲜活内涵。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今年是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90周年,我们铭记历史,从来不是为了咀嚼苦难、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获得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新的出发。今天,不忘苦难历史、继续砥砺前行,就是对抗战将士最好的礼敬、最好的告慰。我们相信,只要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一定能从容面对漫漫征途上的惊涛骇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感谢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本次特别策划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团级以上的 黄埔师生(不完全统计)

□ 李攀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犯上海的作战,又称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恣意挑起事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租界。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就地奋起抵抗,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次日,第19路军通电全国,坚决抗日,誓死保卫国土。

南京黄埔军校官生积极响应,发起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等活动。曾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积极请愿,率第5军增援淞沪战场。一大批出自黄埔军校的官生加入此役,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据不完全统计,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黄埔师生(团级以上)共24位,名单如下:

张治中,黄埔军校教官,安徽巢县人,第5军军长兼87师师长。

俞济时,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浙江奉化人,88师师长。

王敬久,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江苏丰县人,87师副师长。

李延年,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山东广饶人,88师副师长。

宣铁吾,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88师司令部参谋长。

萧冀勉,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兴宁人,88师第262旅司令部参谋主任。

钟彬(斌),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兴宁人,87师第259旅司令部参谋主任。

杨步飞,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88师第262旅旅长。

宋希濂,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湖南湘乡人,87师第261旅旅长。

孙元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浙江绍兴人,87师第259旅旅长。

伍诚仁,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福建浦城人,87师独立旅旅长。

刘保定,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湖南新化人,87师第261旅副旅长。

李杲,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四川安岳人,87师第259旅副旅长。

傅正模,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湖南醴陵人,87师独立旅第2团团长。

黄梅兴,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东平远人,88师第264旅第528团团长。

冯圣法,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88师第262旅第523团团长。

石祖德,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87师第259旅第518团团长。

张世希,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安徽桐城人,87师第259旅第517团团长。

张君嵩,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广西合浦人,78师第156旅第6团团长。

何凌霄,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生,浙江诸暨人,88师第262旅第524团团长。

沈发藻,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生,江西大庾人,87师第261旅第522团团长。

刘安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山东枣庄人,87师第261旅第521团团长。

施觉民,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浙江武义人,88师第264旅第527团团长。

钟经瑞,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生,广西合浦人,78师第156旅第4团团长。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戴戟

□ 沈坚

一·二八淞沪抗战，距今已有90年。外公戴戟（1895—1973）作为当年19路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和蒋光鼐、蔡廷锴的名字同那场气壮山河的民族抗战紧紧联在了一起。

记得1962年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30周年时，这3位当事者分别从北京、合肥来上海参加隆重的纪念大会，还联名在全国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发表了一篇近万字的回忆文章。那年我读小学，尚少不更事，只知道几位长辈专程来就是为了纪念一·二八。这样的纪念场景此后再也没有重现过。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战胜强虏、抛却屈辱的对外战争，一·二八淞沪抗战又恰恰是这场伟大战争的一部前奏曲和重要组成部分。外公他们那一代人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他们没有退缩，而是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火一般的激情与敌人作殊死的抗争，尽到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历史责任。

岁月如梭，又是匆匆60年流逝，3位老人已相继驾鹤西去。回顾外公一生，他为人一向低



/ 戴戟。



/ 上世纪30年代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

调，在世时一般不在我们小辈面前谈论那段经历，很多事情都是后来我从其他长辈的只言片语和阅读中获知的。直至今日，每当我重温有关一·二八淞沪抗战

的历史记录时，内心仍禁不住热血沸腾。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日寇得寸进尺，咄咄进逼。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正忙于策划“伪满”傀儡政权，为掩人耳目、转移国际视线，责令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及川岛芳子在上海蓄意寻衅。时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部队眼见陆军得手东北，急于求功，也迫不及待地欲在上海挑起战端，扩大侵略。

1931年12月21日，外公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不久前，19路军从江西调成南京、上海一线。这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英雄之师，祖籍安徽的外公在这支官兵几乎皆为粤籍的19路军中，可算得为数不多的“外江佬”。1932年，外公甫抵上海就任不过月余，便接连遭遇日本人挑起的“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袭击事件”“《民国日报》事件”的一系列骚扰。作为地方军事长官，外公面临重大压力。在日寇的种种威胁面前，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旨意，一再畏缩退让，曲意逢迎。外公却刚



/ 19 路军战士用重机枪射击。

毅不阿，沉稳应对，他是政府命官，既要坚持原则，毫不示弱，处处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又不能感情用事，外交场合须灵活处置，不卑不亢，不给日方滋事挑衅的口实。1月15日前后，19路军领导层已洞悉，日军进攻不可避免。外公积极组织司令部情报人员，多方侦察日本在沪社团、驻军动向，以及时判明形势，电告在南京的19路军军长蔡廷锴。外公还亲往医院面见正在治病的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与他一起分析时局，部署防务。19路军原本一直在争取组建北上义勇军，准备开赴东北支援马占山抗日。外公则清醒地意识到，上海即将有变，主张19路军打日本无须舍近求远，应及早做好准备。

1月23日，外公会同蒋光

鼐、蔡廷锴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营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展开动员部署。蔡廷锴在会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外公也慷慨陈词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蒋光鼐冷静地指出：“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军官们群情振奋，都表示为保卫上海矢志不渝。会议做出死守的决策，研究了各项应变措施，并发布陈铭枢、蒋

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签署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会后，外公同很多人一样，也留下遗书，安顿了外婆和尚年幼的母亲。

珍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1月23日紧急会议记录原稿，如今看来仍是那么真切感人。作为警备司令的外公，排在与会名单的首位，后面是军长蔡廷锴、司令部参谋长张襄、156旅旅长翁照垣……记录稿纸的右上角处，还留有外公于次日用毛笔亲书的批阅字样，以及他那熟悉的签名。

然而，当时的南京政府却一再电令19路军尽量避让，将驻守闸北的部队后撤南翔，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还亲自出马赶赴上海，召见蔡廷锴给他施压，并派宪兵6团接防闸北19路军阵地。1月28日深夜，宪兵6团抵沪还来不及换防，战斗就打响了。当夜11点，外公接到日军将进攻的报告，即令翁照垣部严密戒备。日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8:30发表的“声明”，迟至11:25才以信函形式送交上海市有关部门，而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1:30就向闸北中国守军发起突然进攻了。

19路军翁照垣部率先奋起抵抗，由此揭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外公即与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连夜赶至真如车站

范庄的临时指挥部，沿京沪铁路调遣部队进援。同时通电全国，严正表示：“为救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足凭之。”

日寇凭借枪炮、装甲车等优势装备，对我军发起轮番进攻。我军将士则临危不惧，勇猛抗击，当晚便打退敌人三次攻势。次日，日军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及民房狂轰滥炸，还野蛮地炸毁了著名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藏书数十万册的东方图书馆主建筑。第一个星期，战斗始终在闸北进行，日军没有取得丝毫进展。2月4日，日军开始发起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持续发生激战。日军虽以舰炮、飞机和装备精良的步兵发动一次次攻击，但均被19路军全数击退，死伤惨重。

其间，外公与蒋光鼐、蔡廷锴虽负全局之责，但遇有危急之时，他们也直接参与前线的作战指挥。吴淞要塞原任司令邓振铨（何应钦部下）畏惧日军，临阵弃职脱逃，致使阵地危殆。外公和蔡廷锴闻讯后，不顾枪林弹雨，迅即赶往吴淞前沿督战，急调19路军78师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代司令，组织翁照垣156旅部队增援、布防，终于

击溃敌人的攻势。直至后来3月3日主动撤离，日寇始终未能攻占吴淞炮台。盐泽幸一狂妄宣称“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牛皮，被19路军的顽强抵抗无情地戳破。

19路军的凛然之举，得到了全国民众的热烈声援，慰问电报、捐款、慰问品雪片般纷至沓来，上海更是出现了如火如荼全民支援的场面，民众抵制日货，组织义勇队支前，宋庆龄、何香凝亲赴火线慰问19路军官兵。外婆也同其他军人家属一道，参加了为伤兵制作纱布绷带、慰劳将士的行列。听母亲说，那时

只有六七岁的她也在大人的影响下，一怒之下将一套别人送的日本玩具给砸碎了。

前方激战，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不但要照顾前方的需求，还须顾及后方的其他工作，例如为肃清潜入市区搞情报搜集以及破坏活动的日本特务和汉奸，外公曾广派侦缉队侦察，及时破获与惩处了一批奸细，以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那段时日，平素微显发福的外公因夜以继日的操劳变得又黑又瘦，几难相认。

由于频遭阻击而不能得手，恼羞成怒的日军遂一再增兵，陆



／戴戟（右）、蔡廷锴（左）与78师师长区寿年（中）视察前线战壕。

海空齐上阵，恨不得将上海碾作平地。整个 2 月，日军从日本国内屡次增兵，并三度更换主帅，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白川义则相继赴沪接任战地最高指挥官，援兵每至一批登陆，便发动愈加凶猛的进攻。

19 路军则主要依靠步枪、机枪、手榴弹和为数不多的小型火炮等劣势步兵装备力抗强敌。因南京当局求和心切，久不发兵援助，19 路军被迫孤军奋战，苦苦撑持。在宋希濂、俞济时、张治中等一再慷慨请缨及各方压力下，蒋介石才宣布调集中央军系统第 5 军两个师增援淞沪战场，命张治中为军长。第 5 军的加盟，一时间让 19 路军如虎添翼，两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由蒋光鼐统一指挥。第 5 军和 19 路军在北线的庙行痛击寇寇，

取得大捷。

3 月 1 日，形势陡变。日军利用源源开抵的援兵，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总攻，尤其是第 11 师团万余人乘兵舰沿长江上溯，绕至我军防线左翼的侧后方，在太仓浏河附近强行登陆，对我军构成包抄之势。中国军队历经月余激战，兵员消耗巨大，更兼后援不继，已无战役预备队和足够的布防兵力可用，为保存主力，不失战略主动权，指挥部不得不下令于 23：00 开始实行有秩序的全线后撤，退守黄渡一方泰一嘉定一太仓一线，设立第二道防线。次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再度联名向全国发布《退守待援通电》。

对于撤退，全军上下无不痛心疾首。外公最初是主张死拼到底的，他惋惜地说，假如再

有两师兵力，至少也可同日寇见个高低。但蒋介石意在“剿共”，哪里还会再调援兵？

此次淞沪抗战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投入兵力首次超过中国方面的一次，日本陆海空军总兵力逾 9 万，且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军舰 41 艘、飞机 150 余架参战。而我军主力仅 19 路军和第 5 军，加上宪兵团、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队，共计不过四五万人，加上武器装备的差距，堪称是一场力量对比颇为悬殊之战。

我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抗争，以弱敌强，坚持抵抗达 34 天，予日寇以沉重打击，毙伤逾万（日方数字则大为减少）敌军，已属不易，尤可一扫九一八后的举国怨愤，大大提振民心士气。章太炎曾不无感慨地说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国际舆论亦为之大变，外国人再也不会以为中国人都是望风而逃、不敢抵抗的“窝囊废”了。外交部部长罗文干说，19 路军前方一打胜仗，西方外交官便格外看重中国，对他则又是请吃又是请喝。其实任何时候，国威、人格何尝不是争出来的！

宋庆龄高度评价 19 路军，赞扬他们“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



/ 19 路军战士在虬江口作战。

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

要完整地解读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外公戴戟，不能不说到后期的对日停战谈判。

上海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是中国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又有西方列强的租界，一度成为各种权谋利益错综牵连的交汇点。日本挑起战火之后，列强各国尤为关注，深恐日本会以此为契机大肆扩张势力范围，进而损及自身利益。所以，自一·二八开战之时起，西方列强使馆和英法主宰、美国支持的国际联盟便从外交方面积极介入，居间调停，力促中日双方停战、举行外交谈判。战事迁延，双方的外交、军事代表亦有过数度接触，只是外公都未出场。但至3月初撤退之后，列强干预力度加大，3月4日，国联大会专门通过上海停战决议，促使双方展开全面谈判，外公才被推上谈判桌。

作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外公，受命参加了从3月24日开始的淞沪停战谈判的一系列正式会议。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是外公和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黄强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植田谦吉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

光葵，军事代表为田代皖一郎少将、岛田繁太郎少将。西方国家代表有英国公使蓝浦森、美国公使詹森、法国公使韦礼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谈判围绕停止双方敌对行动、中国军队留驻原地、规定日军撤退时间、成立共同委员会等问题展开。

近年披露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的这场谈判进行得非常紧张激烈。中方代表为尽力维护国家主权，对日方代表的种种蛮横要求进行了强硬的辩驳，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这场谈判桌上的交锋，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面对面厮杀。植田谦吉无理威逼中国方面说明苏州河以南和浦东、南市的驻军情况，外公陈以事

实，严词反驳，并正告植田：“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外国限制。”日本人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之下竟诬外公为“败军之将”。外公在随后向人介绍日方代表田代皖一郎的名字时，伺机给予反击，谓：“我是皖人，知道‘皖’字含义，拆开是‘白’、‘完’二字，意为皖人勇武，如有敌寇侵我领土，皖人定叫他白白完蛋！”外公素来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逢事关民族尊严的关头，他可是绝不含糊。

迫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和双方军力对比的客观状况，这场谈判以中国方面承认既成事实，允诺军队原地留驻，日本



19路军俘获的日军俘虏。



/ 戴戟(前排右四)在淞沪停战谈判会场。

撤军至战前位置，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是在中国军队失利、退兵的情况下的不得已之举，用张治中将军的话来说，是“沉痛的收场”。外公作为签字者之一，他彼时的心境如何，却也是不难想见的。这个尴尬的历史角色本非他所欲，当蒋介石最初指令外公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他不禁怒从中来，对转告此话的陈铭枢一口回绝，表示如在日方认错的和平停战协定上可以签字，若是丧权辱国条款的协定，则坚决不签。还说：“阿蒋（介石）签字的人多得很，宋子文、何应钦、吴铁城都是能手，何必要我！”然而作为军人，又终究命令难违，且须止息战事，无奈之下，外公只有忍辱负重，勉为其难，替国家去担当。



/ 戴戟(右)、张治中(中)和俞济时(左)获青天白日勋章后合影。

正式签字前的5月3日，上海民众代表数十人到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郭泰祺住处，质问签字事宜，言辞激切之下，以铜元、茶杯掷伤郭泰祺头部。这位曾经留美的资深外交官事后宽厚地表示谅解，认为全系民众出于爱国心使然，绝非针对他个人。

一·二八那年，外公37岁，蔡廷锴40岁，蒋光鼐44岁，以今日标准视之，皆中青年也。三人虽说都曾身经数十战，而如此复杂、重大的挑战，却也前所未遇，应该说，他们都已竭尽全力。回望那场民族抗战，参战将士热血激情、振臂挺身、勇于牺牲，然而却有多方掣肘，内外交逼，一个“难”字，贯穿始终，这恐怕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是尤须体悟的。

硝烟散去，战尘落定，然而淞沪抗战精神不死，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不屈的民族精神。1933年8月，外公为纪念当时牺牲的抗日将士，主持将龙华警备司令部大礼堂改建为一·二八纪念堂，并建纪念园、纪念亭。他为纪念堂碑亲撰的碑文如下：

堂以一·二八名，纪念淞沪抗日之战也。日本自明季以来，为寇海疆，史不绝书。逮甲午挫衄，我遂一蹶不振。民国二十年秋九月十八日，沈阳变起，辽、吉、黑亡，不两周年，而热河失，



/ 龙华警备司令部大礼堂改建的一·二八纪念堂(右)、纪念园(左)。

而榆、滦陷，而长城内外，胡骑纵横矣。一·二八之役，当沈变之后四阅月，舆情敌忾，若决江河；明耻争存，人孰肯后。先是我19路军，移卫畿辅。戟受命危难，警备淞沪，囊鞬鞭弭，惟期效死。是役也，闸北、吴淞、江湾、庙行、大场，血战三十有四日，赖先总理威灵、全民族决心，以齿报齿，以目还目。若衡以近代战争，国力殊不逮，然肝脑涂地，牺牲过当者，非无故也。回首经年，痛定思痛。堂之东偏，盖战前与蒋、蔡诸君子决策处也。爰就陋简，略加丹墀。蒐集当时殉国者之统计与作战图籍，陈之一室，以备观览。夫九一八之不忘，然后一·二八之战可纪；一·二八之不忘，然后九一八之痛弥深。敢志沉

哀，勉尽一息。至于庙貌昭忠，观感为继者，尚待来叶于无穷期。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夏六月淞沪警备司令旌德戴戟。

以往我并不知道外公撰有此篇文字，近年始见悉。现将碑文全篇转录于此，以志不忘。

当时的纪念堂内还陈列着青年画家张云乔创作的大幅油画《血战宝山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纪念堂及堂碑、油画等各种纪念物，俱为日寇炮火所毁。同时被摧毁的，还有1936年落成的庙行的无名英雄墓、江湾的一·二八忠烈墓纪念碑等。然而，日寇可以用野蛮的武力毁去一座座有形的纪念物，却无法抹除矗立在中国人民心中那座抗日英雄的不朽丰碑。

为民族生存而战

——张治中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李攀

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习仲勋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是同时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邓颖超也曾评价：“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他就是两次率部血战淞沪、有着“和平将军”之称的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



/ 张治中。

“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请缨抗战

张治中，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生于1890年10月27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次年随军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3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

日军向上海19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19路军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揭开。而此时已经退职下野的蒋介石获知事变颇为意外，他在日记中曾记载：“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同时，蒋介石判断“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介石对上海局势非常担心。此时，张治中也心急如焚，他对19路军的处境十分清楚：19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持久，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在浦口会晤了张治中。张治中主动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说：“很好。”随即，张治中被任命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出发前夜，张治中写下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开赴前线

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对当年请战留遗书一事写道：“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2月16日上午9时，张治中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当天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接替19路军防务，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并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亘川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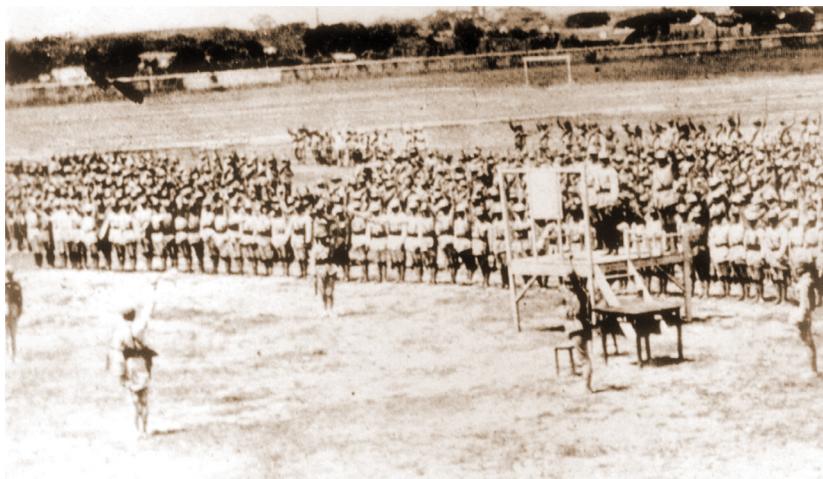
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17日，张治中进驻刘行镇，任左翼指挥官（蔡廷锴为右翼指挥官），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着重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我们全国一致的呼声，一致的要求，一致的决心。现在，行动已代替了口号，实力已代替了空言，我们的存亡，将诉之于极猛烈的战斗。”并勉励官兵：“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日军拼命到底！”

“此役是沪战中国军战绩的最高峰”——庙行歼敌

2月20日拂晓起，日军向第5军发起攻击，日军飞机成群结队在我军阵地附近及后方到处投弹，更以重炮及舰炮向吴淞、庙行一带阵地集中轰炸，日军步兵则借飞机炮火掩护攻击前进。张治中率领第5军奋勇抵抗，击落敌机一架。到了晚间，日军的攻击丝毫没有减弱，炮声依然不绝。第5军阵地工事被毁很多，官兵就掩身战壕内，等日军步兵接近时，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冲锋肉搏。这样血战了两天两夜，日军死伤较重，不支而退。



/ 张治中赴前线指挥作战。



/ 第5军88师259旅的誓师典礼。

22日，日军又倾巢来犯，庙行镇以南的88师527团大小麦家宅阵地遭日军炮火及飞机轰炸四五个小时，工事全部被毁，第3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一角。张治中亲率预备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两个营奔赴88师指挥策应，并命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向庙行增援；守卫蕴藻浜北岸的261

旅宋希濂旅长率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人的侧背；88师俞济时师长率部对被敌人突破地区进行反攻。蒋光鼐闻讯后，立即命令19路军61师副师长张炎率两个团从右翼向敌人包抄。日军被我军三面夹击，仓皇溃退，仅一小部分残留在金家宅、大小麦家宅一带负隅顽抗。我军与其血战到晚上8时半，最终把他们全



/ 张治中(中)和第 19 路军第 78 师师长区寿年(右一)检阅部队。



/ 第 5 军通信兵在山坡上用旗语汇报敌情。

部歼灭。

是役，张治中部官兵伤亡 1000 多人，其中包括 88 师 262 旅旅长钱伦体、副旅长陈普民。日军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则被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人尸体堆积如山。庙行战斗的激烈程

度，是中日两军淞沪开战以来所未有的。中外报纸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国军战绩的最高峰。蒋介石也给张治中发来电报，称赞道：“自经 22 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

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多年以后，张治中回忆起这生平第一次反抗外敌之战时说：“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特别是想起为国捐躯的官兵，他曾在一本名为《淞沪抗日作战所得之经验与教训》的小册子里写道：“以我官兵作战之勇，牺牲之烈，斯书殆亦不啻滴滴鲜血所写成。”

激战浏河、葛隆镇

日军战场失利，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赴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并加派第 14 师团的全部及 11 师团的大部赴沪增援。至此，上海日军总数达到 9 万人。当时 19 路军和第 5 军总兵力不足 5 万，自闸北、江湾、庙行经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一线，每天都在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相当大的伤亡。陈铭枢就此电告蒋介石，“兹决定以南翔至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阵地，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飭上官云相所部，前来作为为祷……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无奈之下，张治中把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宋希濂旅两个团调往田湾作为预备队，一旦战事吃紧，前可策应江湾、庙行，后可兼顾

浏河、杨林口。3月1日拂晓，日军果然选择在浏河附近登陆，并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军进行全面攻击。日军登陆后，随即连续占领浮桥镇等地，向浏河西的茜泾营猛扑。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的一个连拼死抵御，伤亡殆尽。张治中立即命令宋希濂率261旅两个团迅速赶往浏河，抢占茜泾营，力争阻止或迟滞日军前进，以防浏河被日军占领，对整个战局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再电告蒋介石，请求派兵援助。

3月1日，日军抢先占领了浏河屏障——茜泾营，我军处于被动，随着日军后续部队不断赶到加入战斗，521团第1营三面受敌，但仍殊死一搏，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到晚上10时许，日军一步也未能推进。这一天，除浏河方面战况紧张激烈外，江湾、庙行一带的正面阵地，也被优势之敌压制，我军伤亡很大，右翼87师阵地已被日军突破。在兵力奇缺、后援不济的情况下，蒋光鼐为保存实力、与敌作长期战斗起见，电请军事委员会同意，令19路军和第5军相继向第二道防线撤退。

日军发现我军退出第一道防线后，急忙下令追击，企图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尾随我军的日军第11师团3日凌晨1时突然在葛隆镇附近的娄塘、朱家桥发动袭击，企图突破我军嘉定、太仓

防线，切断我军撤退后路。守备在此的第87师259旅517团奋起阻击，日军两度增援，至次日午后兵力已达到7000多人，陷入重围的517团官兵孤军奋战。第259旅旅长孙元良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他向张治中报告：“第517团现受包围覆没，团长失踪。职拟在葛隆镇殉职。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迁移。”危急关头，

张治中沉着冷静，一面调集部队组成防御阵地，一面命令517团



/ 张治中(左)和部下在刘行司令部掩体内指挥战斗。



/ 88师跨越战壕向日军发起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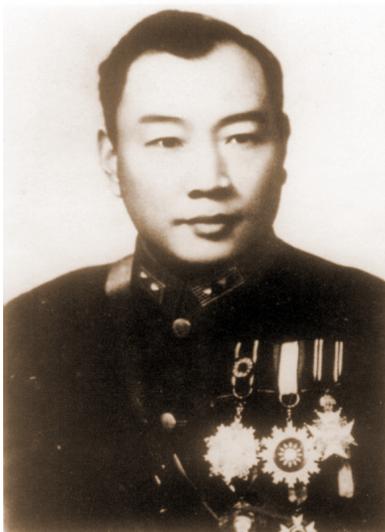
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

□ 宋希濂

淞沪请缨

1932年1月，日本人在上海多次挑衅，国民政府多方媚日，命令上海市府取消抗日救国会，并令驻防上海的19路军撤退。1月28日晚11时，日军突然向驻守闸北的19路军袭击，19路军奋起抵抗，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当时我任陆军第87师第261旅旅长，下辖第521、第522两团，驻在南京的小营、马标一带。全旅官兵深感形势严重，非奋起抗战将无以图存，对19路军的英勇抵抗，寄以深切的同情，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我代表全旅官兵，于1月30日下午3时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何应钦听了后，不仅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反而板着面孔对我说：“19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这是不行的。”我和他争论多次，都遭到他严词拒绝，不得要领。



宋希濂。

我乃返回旅部，于是晚7时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开会。我将何应钦不答应本旅开往上海参加抗战的情形传达后，大家情绪异常激愤，发言者甚多，有的声泪俱下地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敌人打进大门来了，友军已奋起抵抗，我们反而袖手旁观，难道要叫我们当亡国奴吗？”最后决议由旅长率营长以上干部向何应钦再度请愿，务要达到目的。

当晚11时，我率干部30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向何应钦再次请求开往上海参战。他没有想到半夜里突然来这样多

人，感到十分尴尬。一开始大家还是很有礼貌地向他陈述官兵的抗日要求，请他准许本旅开往上海支援19路军作战，但何应钦仍然拒绝，态度顽固，说：“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不能造，一切要从外国买来；国家没有真正的统一，各地方军阀口头上拥护中央，实际上各自为政，又有共产党到处捣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形势，怎能同日本人打呢？”何应钦说了一大套亡国谬论，大家听得不耐烦了，就向他质问，情绪激昂。记得有一位营长王作霖（陕西人，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说得最为扼要动人。他说：“我是部长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我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



/ 第 261 旅全体官兵在“不灭倭寇，誓不生还”的誓词上签字。

呢？难道作为我们的老师（何应钦任过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教育长等职），作为我们的长官，竟要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是决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这些话说得何应钦哑口无言。随后大家纷纷发言，一致表示抗战的决心。僵持到深夜一点多钟，何应钦看到大家情绪激昂，言之有理，知道单纯用高压手段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站起来，以和婉的态度和语调对我们说：“现在南京空虚，明天一大早你们就开到幕府山、狮子山、下关一带，对江面严密警戒。我即调第 259 旅从徐州开回来，等第 259 旅到达后，视情况的发展，如有必要，再派你们这个旅开往上海参战。”大家认为多少有了指望，不便再闹下去，遂即退出

返部。次晨，我们致电 19 路军，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及全体官兵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表示全旅官兵抗战的决心，誓以全力支援。此外，还将由我领衔，全旅干部（约 300 人）签名的一封信，送交当时的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同时，我又派员到京沪铁路局接洽，要求他们准备车辆随时运送本旅去沪参战。

军人报国在今朝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坐失广大国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责骂。数以万计的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蒋介石使用空言搪塞和高压手段，都不能阻遏全国人民蓬勃发展的爱国运动。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意见分歧，矛盾重重，最突出的表现是宁粤间的分裂。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被迫于 1931 年 12 月宣告下野。随后，国民政府改组，选林森为主席，孙科担任行政院院长，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但孙内阁对各项重大政策及经费的筹措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及至沪战爆发，国民党中央号召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并决定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于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于 2 月 2 日先后到了洛阳，又于 2 月 6 日回到浦口举行会议。

这时，上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19路军单独在沪作战，中央并无派兵增援的动向。许多社会人士及国民党内主战派纷纷责难，说中央看着19路军打，按兵不救。出身于上海交易所的蒋介石是善于看风向行事的。当沪战爆发时，蒋介石以下野之身曾发出一个给全国陆海空军官兵的通电，号召大家奋起抗战，并说他愿与诸将士共生死。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重要关头，酌派一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所以，当张治中于2月初在浦口见蒋介石报告各方舆情，并表示愿意去沪参加作战时，他立即同意了。张治中那时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即调动散驻在京沪、沪杭两线上的第87、第88两个师（这两个师原为警卫军第1、第2师）合编为第5军，并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任第87师师长，率领所部开沪参战。我这一旅奉命首先出发。当我在南京尧化门外集合全旅官兵宣布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有的甚至把军帽抛到空中，蹦跳、鼓掌、欢笑……形成了动人的场面。我当时以“军人报国在今朝”为题，对全旅官兵作了一次激昂讲话。

我部于2月9、10两日开到

南翔，当晚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报告部队到达情况，并请求赋予任务。蒋、蔡等表示嘉慰，嘱暂在南翔集结待命。11日，88师师长俞济时亦率该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当时上海有一种传言，说中央有意使19路军孤军作战，听任牺牲。因此，在俞济时提议之下，我们几个人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共同御侮的决心。通电由俞济时领衔，列名者为88师副师长李延年，旅长杨步飞、钱伦体，87师旅长宋希濂。电文大意如下：济时等忝列戎行，救国具有决心……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誓与我19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

2月11日（或12日），我旅奉蒋总指挥命令，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12日（或13日）晚接防完毕。蕴藻浜是一条自西向东（稍偏北）的河流，河幅不宽，但水深泥多，不能徒涉。当时对岸只有日军少数警戒部队，本旅接防后，积极增修工事，并派出少数搜索部队渡河施行侦察，与日军警戒部队常有小接触，殷家行附近的日军炮兵也常不断向我射击。我的旅部驻在由刘家行至吴淞镇的公路南面一个小村庄

里。15日，我曾去吴淞会晤守备吴淞要塞地区的要塞司令谭启秀和156旅旅长翁照垣，大家热烈地谈论着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意义，一致认为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情势下，一定可以打败侵略者。17日，张治中军长率军部及87师师部人员、直属部队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87师的259旅等，先后抵达刘家行附近。他根据蒋光鼐的命令，用左翼军指挥官的名义（右翼军指挥官为蔡廷锴），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旨如下：

一、奉总指挥蒋2月16日午后12时命令（附军队区分）如另纸印发。

二、本左翼军应占领江湾北端豆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置于大场镇北、杨行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家行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淞。

三、本左翼军兵力部署如左：

（1）第88师（缺一团）应占领由江湾镇北端至周巷无名河南岸之线，右与19路军、左与本军87师确取联系，惟主力须控置于大场镇以北地区。



俞济时在庙行指挥布置阵地。

(2) 第 87 师 261 旅应占领由无名河北岸经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之线，右与 88 师、左与吴淞要塞地区部队确取联络。第 259 旅应派兵一营归 261 旅宋旅长指挥，其主力为师预备队，应控置于杨家行至刘家行大道上之火烧场、董陆宅附近。

(3) 吴淞要塞地区部队之任务，如总指挥蒋命令所规定。

(4)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北之太平桥、张家桥附近。

四、各师须于明(18)日下午 3 时以前分别与我 19 路军接替防务、并完成一切之战斗准备。

五、关于通信联络、补给、卫生事宜，悉遵总指挥蒋命令办理。

根据这个命令，本旅归还

第 5 军的建制，所担负的作战任务，没有变更。

庙行激战——强渡蕴藻浜

一·二八战争爆发前，日军驻沪部队为海军陆战队，约有四五千，加上日本侨民所组成的武装约有三四千人，共有八九千人，统归盐泽海军少将指挥。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中国军队一击即溃，所以悍然发动进攻。不料遭到 19 路军的坚强抵抗，在闸北、江湾一带，激战十余日，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日军伤亡枕藉。日本帝国主义为挽回它们的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声誉，乃派其驻金泽的第 9 师团、驻久留米的一个混成旅团及飞机数十架和相当数量的海军舰队，陆续开抵上海，统归第 9 师团长植田谦吉指挥。植田到沪后，制定了一个

“中央突破”的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 19 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 5 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吴淞地区。

日军自 2 月 20 日拂晓，开始向我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轮流向我 88 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猛施轰炸，同时以重炮野炮向庙行一带阵地集中射击，另以一部分炮火向本旅阵地纪家桥、曹家桥一带轰击。敌步兵在飞机及炮火掩护下，向庙行镇附近阵地冲锋数次，均被我击退。

21 日晨，敌又以炮火向 88 师阵地集中猛轰，尤以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颇多，继之敌步兵以主力向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猛烈攻击。我官兵掩处战壕内，沉着应战，等敌步兵接近，以机枪扫射和使用手榴弹迎头痛击。敌军进攻数次，均未得逞。同时在 21 日午前 1 时许，敌步兵数百，借炮兵掩护，企图强渡蕴藻浜。本旅官兵，早已严阵以待，当发现敌军这种企图后，立即以炽盛火力向敌射击。双方激战约两小时，敌知我有备，未再进犯。本日，我师 259 旅之 517 团小炮连击落敌军 846 号战斗机一架，驾驶员田中大尉当场殒命。

至 22 日，敌倾巢来犯，先以重野炮五六十门向庙行镇一

带阵地轰击，连续四五个小时，火力之猛，前所未有，我们许多工事，多被摧毁。上午9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重点指向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守备该处的88师527团，伤亡甚大，第3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了一段，形势很紧张。张治中军长命87师的259旅旅长孙元良率部向庙行以南地区增援，同时，张军长亲率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前往88师指挥所策应。另由蒋总指挥命第19路军的61师副师长张炎率兵两团由竹园墩出击。

22日午后1时左右，张军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庙行方面激战甚烈，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这一地区猛攻，企图突破我阵地，情况十分紧张，想要我旅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增援，问我意见如何？我答：“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至快要四五个小时才能赶到，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也不无影响。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的压力？”我这一建议，张军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问渡河有无困难，我说我们会设法克服的。张军长最后说：“好，就这样办吧！”我接受任务后，感到十分兴奋，



/ 奉命赴沪增援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兵营。

立以电话召521团团长刘安祺、522团团长沈发藻来旅部，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我向他们说明庙行方面的战斗情况及张军长赋予本旅的作战任务，命两团各留一营守备阵地，主力立即在各团的正面渡河。渡河成功后，521团在右，首先夺取齐家宅，然后向北孙宅、西港方向攻击；522团在左，先攻占陆家桥，然后向南孙宅、顾家桥宅一带攻击。我问刘、沈两团长有无困难，他们以异常兴奋的情绪满怀信心地说：“有办法。”随即他们就回去部署了。

还不到下午3点，当我带着旅司令部的一部分人员走向蕴藻浜河边去的时候，听到一阵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但很快就终止了，我想大概是最先



/ 259旅旅长孙元良、副旅长李杲、参谋主任钟彬在研究地图。

渡过河去的部队和日军的警戒哨兵发生了战斗。从旅部驻地走到河边，约半个钟头就够了，当我走到河边一看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哪里来的这许多五花八门的渡河工具呢？除几只小



宋希濂及旅参谋部刘漫天主任在阵地指挥。

木船外，有竹筏子，有用门板扎成的平板船，还有大木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打听之下，才知道两团的队伍除留有一部分在北岸阵地戒备外，全都渡过河，迅速驱逐或消灭了敌军的哨兵，向前攻击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的速度！当我登上一个小木船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西面阵地工事里跑来 521 团的一个连长（忘其姓名），一面向我举手敬礼，一面大声说：“报告旅长，请准许我们这一连也过河去打日本鬼子。”我说：“那怎么行！北岸阵地的戒备还是要紧的。”他说：“旅长，我们在南京一再请求要来上海抗日，总算达到了目的，来了十多天，却没有机会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现在有了机

会，却不让我们去，全连士兵简直难过得不得了，纷纷向我质询责难，弄得我也很难应付他们。”这个连长的这一番话，使我恍然理解了有这许多形形色色的渡河工具和部队这样快就跨过了蕴藻浜的原因。是的，“大家都憋不住气了”！我在船上望着那位满面红光、意气风发、带着恳求的目光而又显得有些失望的表情的青年军官，我感觉到当一个军人真正认识到为何而战的真理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困难危险了！

我到了南岸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约 30 步地方躺着一具敌军的尸体，走近一看，这家伙显然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站在蕴藻浜河堤上，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正面的齐家宅和左

前方的一个村庄，已经看不见有我军的部队，只有少数的担架正在向后运送伤兵。我们走到齐家宅，在那里设立指挥所，叫通讯部队向两个团指挥所架设电话。这时得到两个团长先后送来的战斗要报，得知 521 团已攻占北孙宅，正向西港攻击中；522 团已攻占陆家桥及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正向南孙宅及顾家桥宅攻击中。两团都有相当缴获，以迫击炮弹、机枪弹药及各种罐头食品为多。522 团缴获迫击炮一门。两团击毙的敌人共有四五十人，我方亦共伤亡了八九十人。这是下午 4 时左右的战况。

我部随即继续向前猛攻。521 团于下午 5 时攻占了西港，击毙敌大队长一名，毙俘敌军 20 余人。522 团亦同时攻下南孙宅，颇有所获。我旅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敌军的指挥部根本没有预想到我军会强渡蕴藻浜来攻击它的侧背。本旅攻势的迅速猛烈，使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感到严重威胁。而我左翼部队的绕袭，更使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感到威胁。敌军指挥部为应付这一意外的严重局势，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调出约两个大队的兵力阻遏我旅的进攻，其炮兵的一部亦向我猛烈射击。22 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战斗异常激烈，双方进行了肉搏战，喊杀声、枪声和手榴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奋勇抵抗在杨林口登陆的日军。

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受伤的官兵，被刺刀刺伤者颇多，我亲见一班长的左腿和左臂均被刺入一寸多，可想见战斗的惨烈。由于官兵战斗意志旺盛，英勇杀敌，经过两三小时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军的几次反扑。我命各团在已占领之线上构筑阵地，彻夜警戒。

向庙行镇及以南地区进攻

的敌军，在正面遭受 88 师及 87 师 259 旅的坚决抵抗，同时其左右两侧受到 61 师出击部队及本旅的猛烈攻击，伤亡枕藉，损失甚大。敌军在三面夹击之下，不能不停止进攻，植田谦吉的中央突破计划，至此完全落空了。第 5 军的两个师，这一天几乎全部加入了战斗，一日之间，伤亡官兵达 1000 余人，这

一天战斗的激烈，实为自 1 月 28 日战争爆发以来所未有。

抢占浏河

敌人受到这次挫败，自不甘心，日军统帅部随即派其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赴沪担任最高指挥官，并加派其第 14 师团的全部及第 11 师团的大部开赴上海增援，至此，日军总数达到 9 万

人。敌人知道如继续从正面进攻，必须付出重大代价，且未必得逞，因此白川义则采取在我左侧背浏河附近登陆的计划。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仅有左翼军指挥官所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个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守备这一线的重要性，因为如敌军以有力的一部在此登陆绕攻我侧背，就会使我军全线瓦解。但当时 19 路军和第 5 军总兵力不过 5 万人，自闸北、江湾、庙行经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无日不在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相当大的伤亡，纵然有一些预备队，为防备敌军的正面攻击，也只能适当地用于阵地的稍后地方，不能过早地使用于远在二三十公里外的浏河、杨林口一带，所以该方面的守备兵力十分单薄。

3月1日拂晓，敌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进行全面攻击。同时，敌舰多艘携带大量民船和马达船，施放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薄弱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登陆，并以海军舰队上的大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轰击，飞机数十架从吴淞要塞起沿江轰炸各要口，严密监视我军的行动。敌登陆后，即连续占领浮桥等地，向浏河西端约 5 公里的茜泾营猛扑。我教

导总队的一连，拼死抵御，伤亡殆尽。本旅主力自 2 月 22 日跨过蕴藻浜向南攻击敌军侧背，缓和庙行方面友军所遭受的压力，完成任务以后，于 24 日奉令仍撤回北岸守备原阵地，只留一小部在南岸监视敌军的活动。至 29 日，又奉张指挥官命令，将本旅所担任的防务交 87 师独立第 1 团（附教导总队第 3 营）接替，本旅集结于庙行镇左后方之唐乔田湾附近，为左翼军总预备队。是晚，本旅又奉命担任构筑二线阵地。

3月1日上午，我率各团营长正在侦察地形，经过工事线的时候，突然旅部的一个参谋快步跑来报告，说张军长叫我立即到刘家行军司令部去，并要部队整装待命。我于上午 10 时左右到了军司令部，张军长告知浏河方面的情况，并当面交给我一道笔记命令，要旨于下：

一、敌有一部由七丫口（在杨林口西北约 3000 米）登陆，似有扰我侧背之企图。

我 47 师的一个团，正由黄渡向太仓方面前进。

二、本军为使敌在立足未稳之前，在浏河以西地区，将其歼灭之。

三、着宋旅长希濂率所部两团由现在地经刘家行、罗店向浏河前进；惟因汽车不敷，只可以

一部乘车，其余徒步用疏散队形向浏河前进。

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之一营，应固守浏河，以一部在茜泾营严密警戒，俟宋旅长到达后，即归该旅长指挥。

命令的其他部分从略。

我接奉这个任务后，了解到形势紧迫，必须尽可能使部队迅速到达浏河，尤其要尽快抢占茜泾营，拒止或迟滞敌军前进，否则敌军必然先我占领浏河，对整个战局将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部队官兵听说本旅负有紧急的战斗任务，都异常兴奋，认为又可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仗了。队伍很快就集结完毕。我把情况和本旅任务对刘、沈两团长交代后，即命 521 团的第 1 营由顾家宅汽车站用汽车运输。只有 11 辆车，很勉强地装完一个营。

大约上午 11 时左右，我仅带参谋、卫士各一人随同 521 团第 1 营营长唐德乘车出发。面嘱刘安祺、沈发藻两团长率部以强行军向浏河前进，并适当地用疏散队形行进，万一受敌机扫射和轰炸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我和先头营快要到达浏河（大约相距约两公里的地方）的时候，被在天空盘旋的 4 架敌机发现，我立即命令停车，指示队伍迅即向公路两边疏散隐蔽。果然一刹那间，敌机便俯冲

下来，疯狂地在汽车周围投掷重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而且竟然在离地面只有100多米的低空肆无忌惮地飞来飞去。隐伏在地面上的官兵，看到敌机如此猖狂，十分愤怒。有些士兵便不顾暴露目标的危险，站起来以一个人托着轻机枪的两个脚架，另一个人对着敌机瞄准射击。一个连这样做了，其他的连跟着仿效起来，一时便构成了对空射击的火网。我看见一架敌机冒着烟，一扭一拐地向东方飞去，这架敌机应该是被打伤了，其余敌机也都不敢再低飞。敌机的扰乱耽误了我们的行动约20分钟。待其走后，检查汽车，有8辆被炸毁不能行驶了，只有3辆还勉强可用。我乃命这3辆车开回去接运后续部队，我们步行去浏河，很快就到了，这时大约是12点半钟左右。

浏河街市店门紧闭，只见有三四个手缠“义勇军”臂章的青年，神色有些紧张。探询之下，始知他们就是属于冯庸义勇军的，共有100余人，奉蒋总指挥命令在浏河一带担任对江面敌舰的监视，冯庸本人到上海去了，现在这里发生了战争，他们不知怎样行动才好。我告诉他们，我军大部队即可陆续到来，此间可能发生一场激战，要他们立即离开浏河转到后方去。这些青年大半是东北籍，出于爱国热



宋希濂在战地留影。

情，不畏艰苦来参加战地工作，值得表扬。

我到浏河后，立即搜集情况，得知敌军自今晨以来，已有数千人在七丫口、杨林口一带登陆，尚有大批敌军正在继续登陆，判断当在万人以上。首批登陆之敌，在占领浮桥镇（浮桥镇位于七丫口附近，在茜泾营以西约七八公里）后，已向东急进。我认为茜泾营为浏河屏障，位

置扼要，必须先行占领，才能掩护后续部队展开，乃立命唐营长率该营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哪知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而敌已先我到达，于是与敌展开了白刃战，杀声震天，战斗愈演愈烈。敌后续部队不断赶到加入战斗，而我方到下午3时后，521团刘安祺团长才率第2营到达浏河。这时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低空飞行，掷弹

如雨，敌舰的重炮亦连续轰击，浏河的房舍多被炸毁，部队亦颇有伤亡。至4时许，茜泾营的敌军向我左翼迂回绕攻。原在右翼方面的教导总队第1营伤亡甚大。在茜泾营附近苦战的521团第1营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战死者甚多，伤者亦无法运下来。而该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视死如归，营长唐德左臂受了伤，不仅继续指挥作战，且亲自投掷手榴弹与敌肉搏。

到了5点多钟，天色已昏，我521团第3营才赶到，我命已到达的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并命唐营仍在原地抵抗，俟浏河防务布置就绪后，即逐步后撤，归还建制。我522团全部是徒步行军，加以沿途受敌机扰乱，到晚10时尚未到达浏河。

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

3月1日这一天，除浏河方面的战况已如上述外，而在江湾、庙行一带的正面阵地，亦均被优势之敌压迫，敌飞机大炮不断猛炸，我阵地工事多被摧毁，敌步兵向我军反复冲锋，我官兵奋勇迎战，伤亡甚大。延到午后，正面阵地有数处被敌突破，各师旅控制之预备队皆已使用，而从后方调来增援的部队，据闻因路程遥远和运输困难，

决非几天内所能赶到。淞沪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蒋光鼐盱衡全局，为与敌作长期抵抗起见，决定当晚转移阵地，命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镇之线，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是晚10点30分左右，我接到张指挥官派专人送来的笔记命令，命本旅及军校教导总队经由浏河、陆渡桥向太仓集结，应警戒西竹桥、横沥桥、太仓城、西湖川塘之线，右翼须与259旅（孙旅）联系。奉命后我即派人通知尚在途中的522团立即向太仓转进，我亦率521团及教导总队于当夜开往太仓，均于3月2日上午集结完毕，并以一部留置于陆渡桥一带，对浏河之敌严密戒备。下午奉张指挥官命令，本旅及教导总队担任右自陈家宅（西竹桥西南1500米达河岸）经太仓城、铁港滨河左至西湖川塘之线，构筑阵地。并指示各部队应尽可能地依河川为外壕，先于各要点构成据点式工事，然后依时间逐次增强之。奉命后，本旅不顾疲劳，又立即积极从事阵地的构筑。

3月3日上午，浏河方面之敌数千人附轻炮10余门，向守备娄塘镇一带阵地（在本旅太仓阵地的右翼约八九公里处）的我259旅517团猛攻。该团正面布阵过大，阵地被敌截成数段，两翼被敌包围，该团官兵奋勇抵抗，死战不退，因而伤亡甚大，

营长朱耀华壮烈殉国，下级干部及士兵战死者甚多。张指挥官得报后，即命在嘉定的88师及在太仓的本旅派兵前往支援，正行动间，突又奉急令中止。旋接张指挥官3月3日晚7时的笔记命令，大意谓奉蒋总指挥3月3日午后2时的电报指示，略谓：“敌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我归路，各军应留一部散据各要点，即第5军分占钱门塘、太仓之线，19路军由吴淞江北岸亘安亭望仙桥之线，节节抵抗，拒止敌之西进，即于今晚开始，第5军主力撤至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之线，第19路军主力撤至周巷沿青阳港西岸至陆家桥之线，构筑坚固工事固守之。本军遵令以主力于今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的撤退。87师宋旅应以有力的一部固守太仓，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其主力应俟孙元良旅通过太仓后经直塘镇向白茆、新市占领阵地，对敌警戒，该旅固守太仓之一部，如敌不来犯，不得放弃，如受敌压迫，不能固守时，准予相机撤退，归还建制。”

本旅根据这个命令，派了一个加强营守备太仓，主力转到白茆、新市之线占领阵地。5月5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南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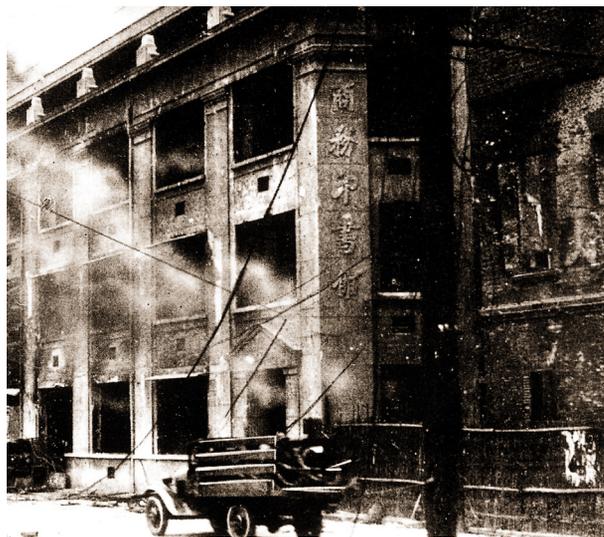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

□ 张人凤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起初只是一家手工的印刷作坊，1903年初设立编译所，创办人夏瑞芳聘请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担任编译总长。他们以“扶助教育”作为出版方针，从初等小学教科书入手，从事出版事业。由于出版方针正确，全体同仁努力，出版物质量上乘，所以在最初的35年中业务不断发展。资金从创办时的3750元增长到1923年的注册资本500万元，即25年间达到30%的年均增长率。商务印书馆总厂设在上海宝山路，拥有4座大型印刷厂，北京、香港皆有分厂，全国有40多家分馆。上海总厂有4000名工人和500名编辑、管理人员。出版物占全国同期出版物总量的50%，其中，中小学教科书的市场占有率在70%左右，其他如辞典工具书、中外名著、期刊、古籍等，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有学者对中外出版、印刷史作比较研究后认为，一·二八事变前的商务印书馆，无论其规模或出版物的数量、水平，都可与欧美同行媲美。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大型出版集团。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商务印书馆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中国的出版教育文化事业也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劫难。当时，上海的中华商务印书馆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单位，还拥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但这一切却随着战火毁于一旦。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时日本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制定了焚毁商务印书馆的险恶计划。他表示，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人，必先灭其文化。

1月29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动6架飞



/ 被轰炸的商务印书馆。

机，轰炸位于上海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由于厂内多为纸张、油墨等易燃物品，所以全厂很快被大火吞噬。公司同仁努力奋斗30余年建设起来的4座印刷工厂、办公楼、仓库、水塔、职工疗病房、尚公小学等，到当天下午就成为一片废墟。厂内原有消防队，但完全无力应对这样的大火；租界里的救火会，也因事态涉及战区而不能施救；许多工人不顾自己就在工厂附近的住处是否安全，奋力扑救，但亦无济于事。我在上世纪80年代访问过一位年已八旬的老人，他说后来他们去清理场地，发现下水道的管道中，结满了铅块，即是印刷厂的铅字被大火烧熔后流入了下水道，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大火的惨烈。

2月1日，在混乱中，日本浪人进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毁了这座拥有46万册藏书的著名图书馆。1921年2月1日，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256

次会议上，讨论 25 周年馆庆活动时，张元济提议以商务印书馆的公益金建造一座公共图书馆。他的出发点是当时上海已拥有好几所大学，但缺乏公共图书馆，商务印书馆正可以在 25 年馆庆之时，用多年积累的资金，以筹建公共图书馆的方式回报社会。他的提议得到董事会的通过。后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宝山路总厂对面买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定名东方图书馆。大楼于 1924 年建成，1926 年图书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来设有图书馆，名涵芬楼，收藏珍本古籍，所藏图书全部移入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共藏有古籍 29713 册，还有刚从扬州等地购入未来得及编目的古籍 4 万册；地方志 2641 种，2.5 万册，是国内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整套“本版图书”；15 世纪前的西洋古籍；多套完整的中外期刊，如《时报》《大公报》《新民丛报》、香港的《中国汇报》、荷兰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的《学报》等等。

199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我到《市民与社会》节目讲述抗日历史故事。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到电台，说当年他住在南市，还是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看到北面天空中升起的黑烟，心中有一种恐惧感，家里大人就告诉他，那是商务印书馆被日本人烧毁了。那一天，上海刮东北风，纸灰飘到张元济先生的家中，他在悲愤中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一批跟着张先生做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年轻编辑，到张家慰问，张元济见到他们，大家抱头痛哭。

后来统计，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的损失总计为 1633 万元。东方图书馆中大量珍本古籍，



/ 被烧的东方图书馆。

有不少是海内孤本，不可复得，它的损失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因此有人认为东方图书馆被毁，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又一个圆明园。

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文化人士，并没有被气势凶恶的敌人吓倒，反倒深感在国难当头之际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重大。

张元济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指胡适致张元济的慰问信），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渐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兄作乐观，弟亦不敢作悲观也。”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说：“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失，而且继起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

王云五随即提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审视国际国内局势，作出判断，放弃了宝山路的工厂基地，缩减规模。同时，宣布 8 月 1 日复业，出版整套《复兴教科书》。后来在长达 13 年的艰苦岁月中，辗转奋斗于上海、香港、重庆，把这家著名出版机构减持办到了抗战胜利，直至迈入新中国。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 释放四大信号

□ 钟厚涛

202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涉台部分指出：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站位高远，意涵丰富，既亮明了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底线，也展现了大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的决心，更向广大台湾同胞发出殷切呼唤，号召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同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前景。

一、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亮点纷呈，新意迭出，其中涉台部分出现多个全新表述，新时

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即为其中重要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洞察全局，敏锐观察国内外形势和两岸关系新变化、新动向与新进展，深刻总结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表述与新主张，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引领对台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完全统一注入了强大动力。

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涉及两岸关系的部分指出：党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这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首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相关表述的延续和发展，将进一步深化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理论意涵。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的深化和发展，是国家统一理论的丰富和提升，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推动祖国完全统一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在过去的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祖国大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砥砺前行，不断开创两

岸关系发展新格局。

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确保两岸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过往历史实践证明，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双方就能建立互信，两岸同胞的利益就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势必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现实利益将遭受巨大冲击。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各种“黑天鹅”与“灰犀牛”现象层出不穷，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也显著增多。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我们要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不惧波折，不为一时一事所动，始终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引领两岸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进一步强化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

次重申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显示大陆将始终坚守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为两岸关系发展明定规矩，为以和平方式消除两岸政治对立和实现国家统一创造广阔空间。同时，这也是向岛内民进党当局发出了明确的警示信号，促其早日与大陆相向而行，早日接受“九二共识”。未来民进党当局若再挑战“九二共识”，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挑衅台海地区和平与稳定，损害两岸同胞福祉利益，必将积薪候燎，自食其果，受到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

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统一是福，“台独”是祸。“台独”分裂势力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是广大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最大现实威胁。当前一段时间，台海形势严峻复杂，风险挑战突出，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民进党当局极力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企图制造两岸对立对抗，其所作所为违逆历史大势，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日益把台湾推向无底深渊。2022年《政府工作报

告》重申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这是在郑重宣示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

台湾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台湾。在全体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决心、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日益强大的能力面前，任何谋“独”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企图，绝不可能得逞。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搞“台独”必遭迎头痛击和当头棒喝，绝不可能有任何好下场。广大台湾同胞也应该认清利害关系，坚决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共同铲除“台独”祸根，守护台海和平，为祖国完全统一贡献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往年，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这显示祖国大陆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海局势的警惕程度已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内容方面也特别强调，要全面深化练兵备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其实也是向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发出明确警示信号，未来双方若变本

加厉，加大勾连，企图否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甚至突破红线，大陆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组织轰炸机、侦察机、歼击机等开展常态化环台岛巡航，常态抵近台岛周边组织多军种力量联合战备警巡，常态在台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对海突击、联合对陆打击、联合防空作战等实战化演练。这一系列举措，就是要以果断行动回击岛内外势力频繁勾连、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四、呼吁两岸同胞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2022年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新年贺词，向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新年祝福，其中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真诚期盼全体中华儿女携手向前，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与习近平主席

新年贺词遥相呼应，一脉相承，号召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和衷共济出自《尚书·皋陶谟》，意思是同心协力，携手前行，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涉台部分则是首次，显示祖国大陆对两岸同胞共创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祖国大陆推动实现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强大祖国是广大台湾同胞的坚强后盾和笃定依靠，祖国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相继出台“31条措施”“26条措施”“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举措，不断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使两岸交流越走越深、两岸同胞越走越亲，“两岸命运共同体”成为日益生动的现实写照。

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2022年，祖国大陆将再接再厉，继续落实落细各

项惠台政策，不断为广大台湾同胞在大陆的追梦、筑梦和圆梦，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创造更便利的条件。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把握时代机遇，积极投身到两岸交流合作的历史潮流中来，踊跃到祖国大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共同谱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经过全党全国人民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我们也更有条件、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让两岸同胞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实现祖国统一既是民族大义与历史大势，也是民心所向与众望所归。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始终是主旋律，分裂只是偶尔的杂音。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已经深深融入全体中华儿女的灵魂和血液。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无论台海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时与势始终在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这一边，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未来两岸同胞应该携手并进，共担民族大义，共享盛世荣光，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2年2—3月

□ 吴亚明

2月

汪洋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5日在京会见前来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和广大台湾同胞的新春祝福。

外交部：美方应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

针对美国宣布价值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日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用百姓血汗钱买武器只会把台湾推向灾难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把台湾老百姓血汗钱用来购买武器，挽救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命运，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动荡，一步步把台湾推向灾难。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对台军售答记者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9日就美对台军售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安全靠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而绝不是美国售台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持续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和关注北京冬奥盛会，中华民族奥林匹克梦想在“双奥之城”北京绚丽绽放，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和关注北京冬奥会，这是中华儿女共襄冬奥盛举、共享民族荣光的生动体现，亦彰显“两岸一家亲”“一起向未来”的两岸民意主旋律。

台湾1月对大陆出口同比增长5.7%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1日公布，台湾1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额达157亿美元，同比增长5.7%，占台湾当月总出口额的39.3%。

国台办：美方“印太战略”在涉台问题上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4日应询指出，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祖国统一是台湾前途所在、利益所系。美方“印太战略”在涉台问题上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损害，我们坚决反对。

大陆高校本科对台招生首次采取新系统，报名录取流程更优化

教育部对2022年大陆高校招收硕士专业、本科专业台湾学生有关事项作出安排，相关招生工作已启动。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5日应询介绍，本科专业对台招生中，依据台湾“学测”成绩报考大陆高校，今年首次采取系统报名或线下报名方式。通过新招生系统，台湾学生报名和录取流程进一步优化。

闽台青年在福建研习元宵民俗文化

以“两岸一家亲 上元尚团圆”为主题的

2022年闽台青年元宵民俗文化研习营活动15日在福建开营。来自台湾的30名青年与来自福建的10多名青年在泉州市、漳州市欢度元宵佳节，研习元宵民俗文化，感受浓浓福建年味。

台湾 IC 产业2022年产值预估达新台币4.8兆元

根据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TSIA)及工研院产科国际所预估，今年台湾 IC 产业产值将较去年增长17.7% 达4.8兆元新台币。

汪洋会见新党主席吴成典一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21日在京视频会见新党主席吴成典一行，欢迎他们出席北京冬奥会闭幕式。

中国决定对美两家军工企业侵权行为实施反制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表示，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两家军工企业实施反制。

大陆市场助力台湾工具机业逆势成长

台湾2022工具机联展21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开幕，950家参展厂商在5100个展台上呈现工具机大型、多轴、复合、高速的发展趋势，同时也透露不可或缺的大陆市场，助力台湾工具机业逆势成长。

国台办：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延迟、阻挠“小三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3日应询表示，“小三通”是两岸民众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两地居民都希望早日恢复“小三通”。希望民进党当局从善如流，不要再做延迟、阻挠的事情。

国台办：将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粉碎“台独”冒险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3日应询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包括通过所谓“制宪、修宪”谋求“法理台独”。岛内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为谋取一己之私，肆意操弄所谓“制宪公投”、鼓噪叫嚣所谓“革命”，弃台湾民众安危于不顾，将把台湾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误判形势、铤而走险、触碰红线，我们将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坚决粉碎，勿谓言之不预。

外交部发言人批民进党当局借乌克兰问题蹭热点：“不明智的行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有些人借乌克兰问题蹭热点和碰瓷，是不明智的行为。华春莹说：“台湾的确不是乌克兰。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7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75周年座谈会2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

外交部：台湾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的事

就日本个别政客近期频繁发表涉台谬论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8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事，不关日本的事。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迄今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停止挑衅滋事。

3月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乞灵于外部势力为谋“独” 壮胆只会加速灭亡

针对1日美国前参联会主席马伦等人窜访台湾

及民进党当局表示欢迎，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日应询表示，靠勾结外部势力换不来安全，换不来台湾民众的福祉，只会进一步让台湾沦为外部势力反华遏华的棋子。民进党当局乞灵于外部势力为自己谋“独”挑衅撑腰壮胆，一条道走到黑，只会加速灭亡。

台湾无预警大停电殃及逾500万户

台湾电力公司表示，3日上午9时07分，因兴达电厂开关场事故，造成约549万户停电。

国台办：蓬佩奥的谬论进一步暴露其本性和险恶用心

对蓬佩奥在其个人脸书账号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4日应询指出，蓬佩奥讲的这一套谬论是民进党当局一贯炒作的陈词滥调，完全是一派胡言。一个公开吹嘘自己善于“撒谎、欺骗、偷盗”还以此为荣的人，讲出这样的话来并不奇怪，只不过又进一步暴露了他的本性和险恶用心。

台湾多个团体联合举办春祭缅怀抗日英烈先贤

3日，台湾多个团体在苗栗福星山公园联合举办春祭活动，缅怀抗日英烈先贤。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对台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两岸同胞要和衷共济，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7个月“破二”，“外食

族”成最大受害者

台湾当局行政主管机构“主计总处”日前公布二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2.36%，连续7个月“破二”，触及通货膨胀警戒线。“外食族”是这波高物价最大受害者。

汪洋参加台湾代表团审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9日上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

李克强总理回答台湾东森新媒体记者提问

11日，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在回答台湾东森新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两岸同胞说到底是一家人，手足亲情任何时候是割不断的，我们愿意继续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对来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只要两岸同胞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就一定能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享中华民族复兴的福祉。

外交部：美方应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针对美国国会日前通过法案中相关涉台内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表示，美方有关做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方应该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纵容支持“台独”行径。

台湾居民在大陆开设个体工商户的新开放措施出台

国务院台办、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6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台湾居民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工作的通知》，自即日起实施。

国台办：加强运用法治方式法治力量打击“台独”推进统一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6日应询表示，统一是历史定论、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定要实现，也定能实现。我们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加强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力量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国台办：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6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近期多地多点发生本土新冠疫情，疫情防控难度加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相信有关地方会统筹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台胞台企做好服务工作。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目前，中美关系还没有走出美国上一届政府制造的困境，反而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是十分危险的。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希望美方予以足够重视。

两岸携手再现文化瑰宝《敦煌卷子》

两岸学者专家携手再现的文化瑰宝《敦煌卷子》19日在台北与读者见面。这部作品收录台湾图书馆161卷馆藏敦煌文献集，被学界喻为“重现敦煌宝藏的最后一块拼图”。

台湾2月销往大陆订单同比增长17.6%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1日发布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2月台湾企业销往大陆（含香港）的订单达128.3亿美元，同比增长17.6%。其中电子产品增加16.1亿美元，增幅31.9%。

国台办评台湾所谓陆委会言论：夹带“两国论”私货，暴露谋“独”本性

针对台湾所谓陆委会负责人23日有关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应询表示，这番言论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夹带“两国论”私货，进一步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推卸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责任、持续谋“独”挑衅的本性。

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座谈会在台北举行

郑成功收复台湾360周年座谈会27日在台北举行，台湾多个团体、近代史专家学者共同研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外交部：民进党当局假“民主”真谋“独”的政治操弄必将被历史清算

针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人近期打着所谓“民主”旗号访台，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日表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人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前往中国台湾地区，葫芦里卖的不是民主的良方，而是鼓动分裂的毒药。民进党当局假“民主”真谋“独”的政治操弄，只会将台湾民众推向灾难的深渊，必将受到历史的清算。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炮制“台湾有事、美国来帮”骗局早已破产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识到，外部势力操弄涉台议题，打的是“以台制华”的算盘，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利益。民进党当局苦心炮制的“台湾有事、美国来帮”的骗局早已经破产。



地中海新霸主：意大利“加富尔”号航空母舰

□ 石稼

2021年2月，世界航母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意大利海军“加富尔”号航母跨过大西洋前往美国，就美军F-35B舰载机上舰进行测试。从2月底到3月底，2架F-35B舰载机在“加富尔”号上持续测试了4个星期，在各种天气和海况条件下执行50多次飞行任务，并进行了夜间训练，约120次垂直降落，最后还进行了垂直起飞测试。测试结束后，意军方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计划中的测试，并且目前能够发出临时飞行许可（IFC），这将使舰员及机组人员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F-35B继续训练。”以此次成功测试为标志，意大利航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全球少数使用五代舰载机的海上力量。

意大利“加富尔”号航空母舰于2001年开始建造，2007年正式服役，舷号R550，造价约17500亿里拉（约10.5亿美元）。被命名为“加富尔”是为纪念1861年下令组建了皇家海军的意大利总理加富尔，他执政期间致力于意大利统一运动。该舰充分考虑了两栖兵力投送和海上联



/ 意大利“加富尔”号航母。

合作战指挥的需要，最大特点是多用途的结构设计思想，能够作为轻型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指挥控制舰和灾害救护船等部署至任意热点地区，是地中海地区一型颇具欧洲特色的多功能新型战舰，该舰的服役，也进一步模糊了轻型航空母舰与两栖攻击舰的区分界线。尤其是2021年7月经过大量改装升级之后，“加富尔”号成为意大利第一艘搭载F-35B战斗机的战舰。目前，它能够一次搭载12架F-35B和12架直升机，这就大大降低了对于甲板面积的要求，也更加贴近于两栖登陆舰的作战功能，满足了多样性作战任务的需求。

一、舰船结构

（一）整体结构设计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的舰体与岛式上层建筑全部使用FE510D钢材，该舰长244米，宽39米，标准排水量2.2万吨，满载排水量2.7万吨，从舰底到飞行甲板共分为9层，舰桥以上共分为5层。其中，舰体最底部的1至5层甲板主要用来安装燃气轮机系统、推进系统、发电系统、弹药库以及供搭载的两栖部队使用的生活舱室。第6至7层主要设有舰员舱室、货物仓库、机库、娱乐舱室、会议室、锚链舱等。第8层主要设有作战指挥

中心、联合作战指挥室、军官生活区等。岛式上层建筑和雷达天线塔的设计是在法、意两国联合研制的“地平线”级驱逐舰项目基础上借鉴改进而来。此外，该舰没有两栖攻击舰常见的舰尾坞井设计，而是改为一个面积350平方米的登陆艇舱，登陆艇无法直接从舰尾进出，必须通过升降平台和起重机械进行运输和吊装。登陆艇舱可搭载3艘LCVP气垫登陆艇、1艘隐身侦察艇和2艘高速攻击艇。

（二）飞行甲板设计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采用典型的“全通式”飞行甲板设计，滑跃起飞甲板位于飞行甲板前方左侧，向上倾斜12°，舰岛位于右侧，整体布局更加类似缩小版的美国“黄蜂”级两栖攻击舰。飞行甲板长220米，宽34米，面积约6800平方米，滑跃起飞区的飞行跑道长度为180米，宽14米，与舰体中轴线保持平行。该舰没有设计蒸汽弹射器和拦阻索装置，只能搭载直升机和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舰载战斗机。飞行甲板设有6个舰载直升机起降区，可用于同时起降EH101/SH-3D等型号的重型直升机，在飞行跑道外的舰体右侧区域，设有8个舰载战斗机固定停机区，可用于停放EH101/SH-3D舰载直升机或者AV-8B/F-35B舰载战斗机。其中，AV-



/ AV-8B 舰载机正在垂直降落。



/ 正在“加富尔”号航母上测试的 F-35B 舰载机。

8B“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是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力舰载机，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中，施瓦辛格扮演的特工驾驶的飞机就是 AV-8B“鹞”式战斗机。

按照意大利海军的规划，将在2024年实现 F-35B上舰的“初始作战能力”计划，并最终实现“最终作战能力”，这与 F-35B 的交付计划一致。

飞行甲板表面铺设了凸凹不

平的防滑复合材料，停机区设有大量固定舰载机的十字形金属扣。在飞行甲板外侧，则是各类舰载武器、雷达、天线阵列等设备的安装平台。

（三）机库区域设计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的机库位于飞行甲板下层，采用封闭式设计，长134.2米、宽21米、高7.2米，总面积约为2500平方米，可容纳12架舰载直升机或



/"加富尔"号航母的机库空间。



/"加富尔"号航母舰岛前部的升降机平台。

8架舰载战斗机。机库内包括各种隔间区、维修区、功能区、武器弹药区等。机库与飞行甲板之间的舰载机运输作业由2部30吨级的升降机负责完成，另外还有4部15吨级的升降机用来运输弹

药、后勤补给以及登陆艇等。其中，30吨级升降机1部位于舰岛前方，升降平台长21.6米，宽14米；1部位于舰岛后方，升降平台长15米，宽14米。在担负两栖作战任务时，机库可以改为车辆

库房，最大能够容纳100辆轮式运输车 /60辆装甲车 /24辆主战坦克，该舰右舷中央至舰尾之间，设有一个侧舷舱门，安装有一部类似滚装车的车辆运输坡道，承重量为60吨，舰尾也设有一个舱门，各类军用车辆可以直接通过2个舱门的运输坡道快速进出机库。

(四) 配套区域设计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采用了防核生化的封闭式设计，作战指挥中心和联合作战指挥室设在飞行甲板下部，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舰岛主要是由驾驶舱、航空作业舱、武器控制舱、各类雷达电子设备舱室以及烟囱管线结构等组成。为了保障两栖作战行动，该舰设有一个430平方米的舰内医院，装备了多种医疗急救设备，包括3间手术室 /重症病房，X光 /CT 检查室，1个牙医室和1个医学实验室。该舰生活居住区每天能提供150吨淡水，舱室床位总共能保障超过1200人，其中，舰员编制800人（含航空人员），两栖登陆部队400人。全舰划分为7个独立的损管区，每个区设有一个损管控制中心，配备了相应的灭火、堵漏和救生器材。

二、动力系统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的动力系统采用传统的全燃联合动力方式（COGAG）和“双轴双

桨双舵”设计，安装了4台美国GE公司授权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生产的LM-2500燃气轮机，每台燃气轮机均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维护和更换。每组推进装置分别由2台燃气轮机负责提供动力，2组推进装置采用交错布置方式，分别设置在底层甲板中后部的两个独立舱室内，每组推进装置主要包括1个变速齿轮箱、1根传动主轴、1个螺旋桨和1个尾舵。该舰动力系统的总输出功率为12万马力，最高航速30节，海上自持力18天，续航能力达7000海里/16节。舰艏和舰艉各安装有一套辅助推进系统，该系统能够在5级海况下精确控制本舰位置，有利于提升本舰在码头靠泊和两栖作战时的舰位控制能力。该舰的电力系统由6台柴油发电机组成，装机容量达到2200千瓦。此外，舰体底部两侧设有可伸缩控制的稳定鳍，能够在6级海况下保证舰载机起降作业。

三、船电装备

（一）指控系统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作战中心的综合作战系统主要包括战场综合管理系统（CMS）、雷达系统、武器系统、通信系统、电子战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和导航系统等，各类系统分别通过独立有线网络接入综合作战



“加富尔”号航母舰岛后侧的升降机平台。

系统服务器，并采取冗余备份设计。其中，战场综合管理系统（CMS）能够为航空作业、海上作战、两栖作战、防空作战等提供C4I服务。该舰大量采用了“地平线”级驱逐舰的信息化技术，软件平台为Linux操作系统，作战指挥中心和联合作战指挥室共设有20余台大型显示器和200余台互为备份的主机。全舰综合作战系统能够通过海上指挥控制网路（MCCIS）与外部实现信息交互，舰桥也有部分信息系统的指挥权限，主要负责航空作业和舰船航行等任务。

（二）雷达系统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的雷达系统由多型雷达组合而成，主要包括1部RAN-40L远程搜索雷达、1部SPY-790 EMPAR多功能相控阵雷达、1部RAN-30X/I中近程监视雷达、1部SPN-753（V）4型导航雷达、2

部NA-25X速射炮专用的火控雷达、1部SPN-720空中交通管制与先进精确迫近（APA）雷达等。其中，安装于后烟囱旁的矩形RAN-40L远程搜索雷达采用全固态电子元件和有源阵列的T/R收发模块技术，以机械旋转方式覆盖本舰360°的对空探测区，工作在D波段，主要用于对远程空中目标的预警探测，最大探测距离400公里，最小探测距离180米，最大探测高度30公里，能够同时跟踪500个以上的空中目标。安装于前桅杆顶端的球型SPY-790 EMPAR多功能相控阵雷达是本舰的标志性装备，工作在C/G波段，主要为本舰的SAAM/IT防空导弹系统提供目标指示和跟踪导引，最大探测距离100公里，可同时跟踪50个目标，并同时引导24枚“紫苑”-15防空导弹拦截12个高威胁目标。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岛一侧的信息设备。



/ 右舷的 SYLVER A43 系统发射“紫苑”-15 防空导弹。

（三）武器系统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主要的武器系统包括1套 SAAM/IT 防空导弹系统、2门“奥托 梅莱拉”76毫米速射炮和3门“奥托 梅莱拉”KBA 型25毫米近

防炮。其中，SAAM/IT 防空导弹系统是欧洲导弹防空公司研制的通用系统，可以装备于各型水面舰艇。该系统主要由垂直发射装置、防空导弹和火控系统等部分组成。垂直发射装置与“戴

高乐”号航母相同，由法国舰船制造局研制的4座8联装“席瓦尔”A43 (SYLVER A43) 型垂直发射装置组成，分别安装在航母舰艏右侧舷和舰艉左侧舷，装备32枚“紫苑”-15防空导弹，该导弹最大射程30千米，采用主动雷达制导方式和“PIF-PAF”喷气式推力控制系统，对来袭空中目标具有较高的拦截成功率。2门“奥托 梅莱拉”76毫米速射炮则使“加富尔”号成为现代航母中第一款装备驱护舰主炮的航母，主要用于两栖登陆作战时的近距火力支援。

（四）配套系统

“加富尔”号航空母舰的配套系统主要包括电子战系统、传感器系统、通信系统、声呐系统、大气污染处理系统、消磁系统等。其中，电子战系统包括1套 JTIDS 联合战术信息防御系统、1套 ECM 电子干扰系统、1套 SLQ-732 干扰系统、2部 SCLAR-H 反导诱饵火箭发射装置。传感器系统包括1部 VAMPIR-MB 型对空/对海红外探测系统、1部 SASS 红外监视系统、1部 AN/SPN-41A 型舰载机着舰指控系统、1部 SIR-R/S 型敌我识别系统以及1部 SIR M5-PA 型敌我识别系统。通信系统包括 Link-11、Link-16 以及 Link-22 数据链，以及多型不同频率的通信设备，能与北约指

挥体系内的所有作战平台进行联合指挥、数据交互和态势共享。声呐系统包括1部安装于舰艏球鼻艏内的 SNA-2000 声呐系统和 2 部 SLAT/IT 拖曳式鱼雷诱饵系统。大气污染处理系统能够对所有核生化袭击造成的本舰空气污染进行净化处理。消磁系统能够定期自动清除或减少本舰磁场强度，从而降低遭遇磁性水雷的风险，并保障全舰的电磁兼容工作环境。

总体看，“加富尔”号航空母舰从舰种划分上仍然属于轻型航空母舰范畴，但由于融合了大量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制造工艺，该舰的装载能力、作战能力、指控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二战以来，轻型航母最主要的作战任务是反潜作战，意大利海军在没有了苏联海军核潜艇部队的巨大威胁后，开始重新思考本国的海洋战略和地中海地区的作战需求。

“加富尔”号作为冷战后设计制造的新型航空母舰，正是意大利海军实现“由海向陆”战略转型的代表性武器平台，其以航母职能为主、兼顾多用途的角色定位，能够帮助意大利海军从容应对各种低烈度的地区危机和局部冲突。“加富尔”号自2009年6月正式服役后就比较活跃，多次参与北约的演习和出访。2010年1月，它被派往海



/ “奥托 梅莱拉” KBA 型 25 毫米近防炮。



/ SCLAR-H 反导诱饵火箭发射装置正在测试。

地与巴西海军合作执行“白鹤行动”，对海地地震中的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运去了约200吨食品。2015年和2017年，“加富尔”还曾部署到利比亚，执行反海盗反走私任务。

从未来发展看，如何在世界航母俱乐部里拥有一席之地，是航母小国面对的必然课题。意大利海军航母发展给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思路：既保持轻

型航母使用舰载机作战的能力，又增加兵力投送的功能；可以应付低烈度局部冲突，又可以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满足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和执行撤侨救灾等功能。如此“一舰顶两舰”的效能，无疑是既可行又实用的现实选择，而未来在海上驰骋的“纯正”航空母舰，也许只有世界少数几个海洋大国装备的中型以上航空母舰了。

军语新解

□石评

胜利对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对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

——朱里奥 杜黑

朱里奥·杜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颇有影响的军事理论家，意大利将军，空中战争论的主要创始人，在世界空军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建设空军和使用空军的思想和使用空军的理论，创立了制空权理论，被称为“战略空军之父”。

杜黑关于建立独立空军、夺取制空权、集中使用空中力量、空中进攻等思想，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战检验，已被许多国家认可，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杜黑军事成就主要来自于他对空军理论的发展，他写的《制空权》一书影响广泛，其中很多论断在当时提出后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比如，他提出：天空将成为重要性不次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制空权将变得和制海权同等重要；航空兵的重要性将日益提高，它不仅是一种辅助力量，而且是军事大家庭中的第三位兄弟；飞机用于战争，彻底改变了战争面貌，



/ 朱里奥 杜黑。

是战争发展史上的转折点，战争将成为全民的、总体的、不分前方和后方、不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战争；未来战争中，夺取制空权的斗争极端重要，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丧失制空权就是战败，等等。

后来的军事理论研究者把杜黑与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名著《海权对

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并列，称他为“空军的马汉”，足见其影响力。而这一切都源于杜黑打破禁忌的创新精神和极强的预见性。他的这句“胜利对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对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就揭示了杜黑在制空权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密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即要能准确预见到战争特性的变化，把握战争发展的规律。

对包括战争在内的事物发展规律的预见，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天性，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周易·系辞上》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指的是对未来有所预见，对已往心中了然。汉·袁康《越绝书·德序外传记》中说：“故圣人见微知著，睹始知终。”意思是圣明的人能见始知终，看见事物的开始阶段就能预见到它的最终结果。

在世界军事史上，凡是能

准确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军事统帅，大多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辉煌。苏联名将朱可夫元帅抗击纳粹德国的进攻时，在纷乱复杂的卫国战争形势中，显示了他惊人的预见性：尽管敌人暂时处于进攻状态，但苏联红军的顽强设防使他们很难完成既定目标，而随着时间的拖延，敌人的补给将越来越困难，恶劣的天气也将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

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毛泽东称为“窑洞里的预言家”“红色预言家”，核心在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科学的分析和精准的预测，并为后来的形势发展所印证。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讲了战争的五种预见性胜利：“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意思是能准确判断仗能打或不能打的，胜；知道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多少采取对策者，胜；全国上下，全军上下，意愿一致、同心协力的，胜；以有充分准备来对付毫无准备的，胜；主将精通军事、精于权变，君主又不加干预的，胜。其中“将能而君不御者”与杜黑讲的把握战争特性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冷兵器时代的孙子和热兵器时代的杜黑不可同日而

语。孙子讲的是兵法，更多是道的规律和术的谋略。杜黑讲的是兵器，更多是器的创新和发展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当道的规律、术的谋略和器的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成为推动新军事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进而影响或改变整个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

翻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几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从美军空袭利比亚“外科手术式打击”，到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的大规模空袭；从阿富汗战争空中打击，到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等，每场战争都是作战理论应用、作战兵器使用和战法创新的深度结合，其所涵盖的作战模拟推演、定量定性分析等都与历史上发生的其他战争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战争的发展进程中，新理论、新观点、新学说一直层出不穷，信息战、联合作战、非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非线性作战、网络战、空海一体战等理论陆续出现，战争在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空间同时展开。同时，激光武器、隐形武器、电子战武器、精确制导武器、新概念武器等高技术兵器推陈出新，大数据、云攻防、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元宇宙”等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这些，都将极大地推动着战争形态、军队编成和战

场面貌的深刻变化，并引发军事理论领域的深刻变革。未来，通过战场感知、网络联通和指挥控制三大因素的交互作用和无缝融合，将形成“信息主导、体系破击、网聚能力、自主适应”的全新战争制胜机理。

以美军为例，美军的指挥控制系统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C4K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杀伤、情报、监视、侦察、定位）的九位一体；作战手段从全纵深攻击发展到基于云攻防的全球快速打击；侦察手段由卫星、雷达、电子侦察发展到智能微尘传感器；作战方式从预先计划、预编程序为主，临时指令修正为辅，发展到“边看边算”和“追着打”“选着打”“精细打”。

所有这些发展和变化，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如何打赢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使战争按照可预测、可前瞻的方向发展，毕竟战争未起，庙算在先、胜券在握都是军事统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自然是对战争特性变化的深刻把握，核心是通过颠覆性的思维创新，来改变战争游戏规则，最终推动作战方式、样式，乃至国防组织体系等的变革。仅就此而言，杜黑的军事思想在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仍熠熠生辉。

黄埔英魂 名扬域外

——写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80 周年

□ 骆凡

我与戴安澜将军之子戴澄东相识已有16年，戴澄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我在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系黄埔亲属岗位上工作的5年间与戴部长多有交流，已年过80的戴部长给我讲了很多戴安澜将军的事迹，随着了解深入，钦佩之情愈深。将军短暂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是近乎完美的民族英雄。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80年前，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滇缅战场浴血抗敌，扬国威于域外，为民族解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要贡献。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订《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次年年初，第一批中国远征军3个军9个师约10万官兵应英方请求紧急入缅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多公里，多次有力支持英缅军。

第一批中国远征军团级以上军官中黄埔师生29位，其中军长杜聿明、甘丽初分别为黄埔1期生、4期生，军长张轸是第4期战术总教官；9位师长中7位出身黄埔。在这场御敌于域外的抗

战中，黄埔将士浴血杀敌，戴安澜是其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周恩来誉其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对这位能文能武，热爱文艺的学生偏爱有加。黄埔3期同学、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宋瑞珂回忆：“我们入伍同在一个连，戴安澜勤奋好学，文学根底深厚，多才多艺，在文娱会上曾演出《打严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2005年9

月4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念到戴安澜将军的名字时，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与戴澄东部长结缘也正是始于这次大会。

在成为中国远征军第5军200师师长前，戴安澜将军凭借长城抗战、台儿庄会战中“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以及武汉保卫战的功绩已是闻名全国的抗日将领。战功之外，将军亲情的一面同样感动世人。

1942年春节，远征军入缅作战前夕，戴安澜将军一家分居五地，他在2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农历除夕，翘首故乡，父兄隔离，母虽在贵阳……叔祖父母远在全州，荷馨率靖、澄两儿寄寓昆明龙团长家，过年作客，更多牵挂。篱儿又在贵阳，复多增想念。余与东儿在下关旅社度岁……”四个孩子分处三地，只有长子戴覆东（1928—2018）留在身边。戴将军对身边这个孩子倍加关爱，分别时留下亲笔信：“……怕你定要送别而致难舍难分，所以我就不等你走了，东儿，你对我的想念我是知

道的，其实我对你们兄妹弟的想念，比你更甚呢。不过，当这个时候，只有按下私情为国效力了。你总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是要英雄父亲。所以，对于一段时间离别，不要太看重才好。”如此情深意切的文字出自战功彪炳的铁血战将更是感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戴安澜将军以自己38年的生命赋予《诗经 采薇》新的诗意，一面是国之长者，一面是舐犊深情。绝世文情，千古常新。戴安澜真大丈夫也！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

200师是1938年春在湖南湘潭编成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由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组成，有苏联军事顾问协助训练。同年冬，200师在广西全州扩编。1939年1月5日，35岁的戴安澜接替杜聿明任第200师少将师长。昆仑关战役中，200师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戴安澜被赞有北宋年间夜袭昆仑关的大将狄青之风，获宝鼎勋章，并被誉为“当代标准青年将领”。

作为31集团军军官大队教

官，戴安澜将军曾经给学员讲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故事，他说：“巨人力大无比，但双脚离开大地就不堪一击，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就像巨人和土地，军队离开了民众一定会垮台。”1941年春，200师驻扎在位于黔之腹地的安顺待命。一年间，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传为佳话。安顺城内有一条年久失修的贯城河，200师主动疏浚河道，造福百姓。40年之后，时任中共安顺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倪如锡对戴安澜将军在寒风中指挥部队劳动的画面记忆犹新。倪如锡说：“戴安澜将军殉国时，我才16岁，他曾讲‘现在国家多事，年轻人要多读书，将来才有所作为’，这番话一直激励着我。”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在安顺驻扎一年后，戴安澜将军率领200师作为杜聿明第5军先头部队进入缅甸。东瓜又称东吁、同古，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枢纽，是“兵家必争之地”。远征军到达同古时，日军正在攻打仰光，若仰光失守，下一站必是同古。当得知仰光、皎德加相继失守后，英缅第1师立即于3月18日午后通报将于当夜撤出同古，并在接防未完成的情况下擅自撤出。对于英军在缅甸的糟糕表现，丘吉尔曾评价：“在日本战争机器可怕威

力的打击下，昔日白色人种在亚洲的形象被打碎了。”200师仓促接防同古，尽管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师，装备和日军仍有很大差距，士兵因穿着草鞋还被英军讥为“草鞋兵”。但就是以这样的装备，在孤军作战、后援困难的情况下，200师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英军的一触即溃形成鲜明对比。在同古保卫战前，戴安澜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1942年3月19日，同古保卫战打响。敌人进攻猛烈，我军伤亡骤增，200师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戴安澜立下军令：“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东瓜。”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200师同四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12天，以步兵顶住日军的立体进攻。鉴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戴安澜采取“百米决战术”，令官兵放敌人进入50米距离，突然

跳出战壕集中投掷手榴弹后，马上进行白刃战，以800人牺牲的代价打退了日寇20余次冲锋，最终完成了掩护英军撤退、为我军在不满纳进行布防争取时间的任务。此战歼敌5000余人。3月29日，200师奉命撤退出同古。戴安澜指挥全师出击，遭遇意外猛攻的日军狼狈后退，200师也借着这个时机有序撤出同古城，且没丢下一名伤兵，远征军副司令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评价：“连一副伙食挑子都没留下”。

英国《泰晤士报》称：“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国内的舆论对戴安澜赞誉有加，重庆报纸称同古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日军最高司令部称同古之役是旅顺口攻城以来最艰辛一战。日军军事记录中称200师“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特别是退却收容部队，固守阵地抵抗直至最终”。

“驱倭棠吉归”，是指1942年4月25日200师阻击日军第56师团抄袭我军东路并收复缅甸棠吉之战。这次战斗200师毙伤日军数百人，戴安澜将军两名贴身卫士一死一伤，可见战况的激烈程度。

沙场竟殒命，斗志也无违

1942年5月初，中英盟军全面溃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及第5军主力于5月10日退往缅北野人山地区，受到了日军阻击。大批日机密集俯冲扫射，中国军队不战自乱，进入山林躲避。在东路雷列姆附近担任掩护任务的第200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在后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况下，戴安澜毅然决定率部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以图寻隙退回国内。18日，戴安澜对部下说：“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而后带领数千官兵端起刺刀，顶着日军机关枪、步枪和火炮密集交叉的火网冲了上去。敌人在西保至抹谷间公路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戴安澜将军身负重伤。5月26日傍晚，200师与敌周旋撤退至缅甸瑞丽江畔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终因伤势过重，遗恨而逝，年仅38岁。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斗志也无违。

这是毛泽东为戴安澜写下的挽诗。戴安澜将军身后哀荣堪比二战中同盟国牺牲最高将领张自

忠。遗骨归国，灵柩覆盖着戴安澜将军两件布有弹孔、浸透鲜血的军装，见者无不动容。腾冲万人空巷，县长张问德率20万父老乡亲沿街跪迎灵车。自昆明至贵阳，直到广西全州一路举行公祭大会，百姓自发哀悼。中共方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都写下挽联，表达对血染缅甸沙场爱国将领的敬佩之情。

1943年秋天，戴安澜将军灵柩由广西全州迁葬于安徽芜湖小赭山故里。2017年，南京举行纪念戴安澜将军殉国75周年活动。出席活动的知名黄埔亲属有：陈毅元帅之子陈丹淮、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庶、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胡靖安将军之女胡葆琳、郑庭笈将军之子郑心穗、文强将军之子文定中、周振强将军之子周小奇、卫立煌将军之孙卫智。北京往南京的路上，大家讲黄埔父辈的故事，以及他们与戴安澜将军子女交往的趣事，黄埔后人间特有的情谊殊为感人。活动结束后，戴部长为我逐句解读将军的座右铭——“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忤；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忤不求不惧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那一刻，仿佛亲耳聆听到了戴安澜将军的教诲。

2021年9月14日，我有事打

电话给戴澄东部长，讲完正事，闲聊几句。戴部长见我对将军的精神颇为敬仰，就说：“母亲时常对我们姐弟转述，父亲在世时讲，做人要记住三句话：‘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责任担当；第二，人穷不能志短，如果人把物质满足看得太重，就永远都得不到满足；第三，要读书。’我们中国人始终要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戴部长还在电话里给我念了两篇将军的阵中日记，记录了将军在战斗间隙是怎么学数学，怎么读莎士比亚的。近几年，和戴部长每天微信互致问候，我的朋友圈也有幸得到戴部长关注。我有两个女儿，戴部长说：“看到你肯花时间陪孩子，这很好，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自己也会升华。”戴澄东部长对下一代的关爱，让我记起戴安澜将军那封著名家书：“……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戴安澜原名戴炳阳，字衍功，入黄埔军校前，为表达“镇狂飏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的凌云壮志、像海鸥一样搏击大海的勇气，正式改名为安澜，自



作者与戴覆东院士(中)、戴澄东(右)部长合影。

号海鸥。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海鸥将军殉国80年。40年前，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黄埔5期生萧克在纪念戴安澜将军殉国40周年座谈会上称海鸥将军为民族英雄。萧克说：“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强国。”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吾等后辈纪念海鸥将军的最好方式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促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告慰戴安澜将军还有留在域外的黄埔英魂和远征军士兵。📷

聂荣臻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纪念聂荣臻逝世 30 周年

□ 吴跃农

聂荣臻青年时代怀着富国强兵的壮志，负笈出川，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后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回国后，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聂荣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

聂荣臻（以下称聂帅）一生戎马倥偬，纵横驰骋，是我军著



/ 聂荣臻元帅。

名的将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他接替陈毅，是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是国防工业和“两弹一星”的指挥者。他也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为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又为党的知识分子拨乱反正工作大声疾呼。他是我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之一，杰出的执行者之一。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不重视知识分子和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化无法实现，国家的落后面貌不能改变，人民的

生活也难以提高。为了国家的进步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知识分子和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10月的一天，邓小平来到聂帅家，关心地询问聂帅的身体状况，并告诉聂帅，对他的工作安排，党中央有三种方案，请聂帅自己拿主意：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聂帅来抓；二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工作太忙，他兼任的北京市长一职由聂帅来担任；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工作。

聂帅与邓小平是留学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又是四川老乡，更是革命同志、战友，两人都有建设强大的现代化中国的急迫愿望。所以，对这三个方案，邓小平清楚聂帅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果然，聂帅稍一沉思，对邓小平说：“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

来兼顾也可以。但是，还是请中央决定吧。”邓小平工作作风向来果断干脆，雷厉风行，当即表示同意。不久，党中央就任命聂帅为国务院分管此项工作的副总理，党内职务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

在当时，或多或少的“左”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属性判断，使党内一些同志总是认为抓科学技术工作、抓知识分子工作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有些同志对聂帅的请缨感到吃惊，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项工作太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聂帅何尝不知道我们的干部思想中“左”的思想的厉害，何尝不知道在当时抓这项工作的风险，但他没有犹豫，因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清楚中国贫穷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就企盼着中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世界占一席之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晏河清，气象万千，正是实现自己青年时代梦想的极好时机。他对这些心存犹疑的同志说，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过去，想用科学技术改变国家的贫穷面貌没有条件，现在有条件，为什么不抓？为了祖国的富强，我就是来抓科技工

作，我不怕麻烦！

聂帅接受这项工作后，夜不能寐，他清楚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同时又感到十分振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到1956年，在周总理、陈毅等的领导下，科学技术领域已经初具规模，研究人员已经由原来的650人增加到9000多人，研究机构也由40个增加到了380多个。特别是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周恩来都到会做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明确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的知识分子，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知识工作，专门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并组织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国家还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1956年，科学技术领域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

同时，聂帅也有着对困难的清醒认识，主要是：十二年科学规划虽然有了一个初稿，但还没有搞好定稿，规划中还有许多问题含糊不清，不明确，不落实；科研人员在总体上来看，还是奇缺；虽然党已经规定了一些知识分子政策，但落实还是一个问

题；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缺乏领导经验；科研机构的布局有缺口，零星分散，很难形成攻关合力，等等。

强化基础工作，形成一个良好的知识分子工作氛围

——“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向党中央提出了建议，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同志的支持。”

聂帅走马上任，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薄弱环节，强化科学技术的基础工作，优化知识分子工作的大环境。聂帅信心很足，他认为，只要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艰苦奋斗，执行政策、规划到位，一定能够将科学技术工作做好，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

聂帅在此前参与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计划，他分管这项工作后，主要任务就是将计划进行完善。然而，1956年的良好的知识分子工作环境，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反“右”扩大化搞得无所适从。“大跃进”盲目求快，把原来确定的“争取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状况和十二年内主要科研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口号变成“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规划”“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而反“右”扩大化又

提出“拔白旗”的口号，使刚宣布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策很难兑现，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聂帅见此情景，自然是忧心如焚。每到一地视察，他都尽自己所能纠正一些不切实际的、不讲科学的“大跃进”做法。对知识分子，聂帅坚持1956年的结论，不搞极左的一套。相反，他要求广泛吸纳知识分子，进一步充实我国的科学研究领域。聂帅特别重视动员海外学者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有一次外交部召开大使工作会议，他得到消息后，特意赶去参加会议，做了主题鲜明的讲话，请使馆的同志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争取更多的爱国科学家回国工作。聂帅还要求起用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他的领导下，一批科学家，其中很多是党外专家，成为科研机构的领导人，或者是某个课题的领导者。

为了造就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聂帅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他采取了好几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放手采取“师带徒”，选拔确定了一批留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学毕业学有所成的高级知识分子，给他们每人带上七至八个助手，这样，就可带出上千名中级科研人员；二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派研究生和留学生，选派的学生以学理工科为主，到后期

主要派研究生。这样，一批年富力强，基础扎实，顶上去就能用的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形成；三是在国内的高校中调整学科，特别是开设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专业，如计算机专业、空气动力学专业，还成立了中国科技大学，办起了一批中等技术专业学校，为科学实验提供梯队人才。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留下的知识分子，聂帅认为，他们尽管许多人出身是非无产阶级的，但“重在表现”，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献智出力，经过学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他们要一视同仁，政治上信任，工作中大胆使用。

在聂帅的通盘布局下，我国的科研人员队伍得到了壮大，到1962年，已经拥有科研人员9万多人，而且是老中青结合，高精尖人才门类齐全。队伍壮大了，聂帅特别强调不可浪费人才，必须专业对口，人尽其用，凡是遇到人才不尽其用的情况，聂帅都当成大事来抓，哪怕是具体的一个单位的个案，他都一抓到底，决不松懈。

由于我国当时经济还很落后，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聂帅除了号召知识分子与党同心同德共度时艰外，还积极地为知识分子排忧解难，为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而奔波。他要求各级

科研机构的行政领导和行政工作人员，要像小平同志提出的那样，当好科研人员的勤务员，尽一切可能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事无巨细都要照顾周全，特别是他们的吃饭、住房、小孩上学、夫妻分居两地等问题，一定要帮助解决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他在一次有几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和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是个老兵。科研工作好比打仗，后勤工作一定要跟上。我就是科技战线的一个后勤部长。”3年困难时期，聂帅专门从海军调拨了鱼，从北京、广州、新疆军区调拨了肉，还从有关方面调拨了黄豆、食油，分给科学家，聂帅想得很细，特意关照分配鱼肉的同志，这批鱼肉、大豆、海带等都是专门给科技人员的，其他任何人不得动用。他亲自布置、检查分配方案，还对具体操作的同志要求说：“包括你们，一两也不能要。”事后，他不放心，专门派人来检查，得到“若吃一口，甘愿开除党籍！”的满意答复。

老五院建院初期，住房比较紧张，许多人住帐篷。冬天临近时，聂帅亲自到一个个帐篷去视察，检查是否都生了炉子，并且严肃地对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说：“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聂帅对知识分子的工作

环境相当重视，有一次他到一个科研单位视察，发现院子里的树叶全都被虫子吃光了，很生气，叫人马上采取灭虫措施。

聂帅还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要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问题，为此设计了具体操作方案，聂帅将这个提高知识分子工资的方案向毛主席做过口头汇报，毛主席听后表示完全赞成。毛主席当时对聂帅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他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后来由于受“文革”影响，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聂帅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不允许出现荒废人才的情况。他给工作人员定了一条规矩：如果科技人员来信，反映他们的工作安排不合适，经了解属实，工作人员可以用聂帅的办公室名义直接写信给他们所在单位，要他们解决。若解决不了，再报告给聂帅。对于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聂帅总是要求事先做好调查，安排对口的工作，如有不合适，要做进一步的调整。有一位科学家从法国归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原子能方面研究工作，专业并不对口，聂帅知道他的情况后，又派他到法国原来的实验室学习，回来建立自己的水声学研究室。后来，这位科学家感激聂帅的知人善任，说：“中国水声学的发展是同聂

帅分不开的。”

主持《科学十四条》，为我国的知识分子工作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

——“我希望，我们大家为着全国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更好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60年代初期，极“左”思潮

盛行，波及科技战线。聂帅响应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实地调查，倾听各级干部和科技人员的意见，发现问题不少。例如，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每周一半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和与科研无关的体力劳动。聂帅明白这样做的根子是因为给知识分子安上了“白专”的帽子，在所谓“红”的要求下，严重损害了科学研究工



1938年的聂荣臻。



/ 1971年，聂荣臻（左）与陈毅在北戴河。

作，挫伤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致使大量的科研能量白白消耗，这不利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聂帅立即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通知，规定科研人员一定要保证每周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与此同时，聂帅在上海和北京多次召集知识分子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发表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意见建议。经过调查，聂帅发现，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并不明朗，他们还是心存疑虑。为此，有必要搞一个科学工作条例，向广大知识分子开诚布公，做出政策上的明确宣示。在经过反复调

查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聂帅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并附上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提交的《科学十四条（草案）》。这个《科学十四条》旨在克服大跃进和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探索总结科学领域工作的成功经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政治局讨论通过《科学十四条》的会议上，邓小平说，我看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邓小平也提了自己的意

见，他说，党的领导方法，内容可以充实。党怎样做工作？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出科学成果。党的领导干部要和科学家交朋友，关心帮助他们。让我看，二十四小时都有事做，怎么能够说这样一来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好做了呢？我看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个报告，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可以向党外作口头报告，索性把政策讲清楚。周总理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补充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

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科学十四条》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也正是有了《科学十四条》的政策基础，才有了紧跟而来的广州会议，有了陈毅替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肺腑之言。

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

——“他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在聂帅的具体主持工作下，知识分子干劲倍增，特别是广州会议后，知识分子奔走相告，许多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摩拳擦掌，挑灯夜战，出现了领导干部、行政人员不得不到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去劝说同志们回去休息的感人场面。

《科学十四条》制定后，聂帅亲自选定了一批科技干部，其中许多是党外同志，报党中央批准后，选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要求各级党委支持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这批干部上任后，聂帅总是鼓励他们，与他们一起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能克服不足，很好地适应领导工作。

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要求，聂帅认为主要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使他们的精力用

在科研上，不能要求他们同政工干部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家。

聂帅明确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说：“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听科技人员的！”当时，“白专道路”的帽子横飞，给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压力，聂帅对此不予理会，严肃地指出：“有些单位对科学技术人员红的要求，确有一些不切实际、不加区别、要求偏急等毛病，有时甚至主次不分，求全责备，乱戴白专帽子。”“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在一次老五院的干部大会上公开疾呼：“不准提白专道路！专和白没有关系！我们要提倡学习知识，要为专家创造条件，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对确实有专业知识、有培养前途的‘尖子’，要给予特殊照顾，创造特殊条件，让他们很快地成长起来，要让‘尖子当长’，让专家当指挥员，说了算。”

聂帅是最早呼吁恢复党的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领导人之一。1982年8月28日，他专门与《光明日报》记者谈话，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看法。聂帅语重心长地说：“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不论革命和建设事业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我们重视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前进了，就发展；什么时候歧视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我们的事业就受到挫折。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这样。”“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担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聂帅的讲话，对进一步推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一些极左人物对聂帅的讲话很不以为然，骂《光明日报》是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并针锋相对地说，“现在对知识分子评价太高了”，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聂帅对此态度坚决，毫不退让，他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上，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舆论机关还要大声疾呼。光是一般地说不行，必须进行公开的批评。轻批评也不行，要尖锐一点。有时甚至要进行必要的斗争。”“我们一定要肃清‘四人帮’那一套‘左’的东西，在整个社会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道德、新风尚，充分信任他们爱护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能够施展远大的抱负。”

青山绿水去无声。聂帅晚年回忆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的前半生参加了组织和建立武装队伍的工作，后半生我致力于组织和建立科技队伍的工作。”聂帅是我党知识分子工作的优秀领导人，他的所言所行，是我党知识分子工作的宝贵财富。■

黄埔四期生黄应龙的长征路

□ 陈宇

黄应龙是黄埔军校史、红军长征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家乡的《黄梅县志》早期革命战争年代章节，大半部分内容都是有关他的家史。长征路上有两位被称作“总司令”的红军将领，一位是朱德总司令，一位就是黄应龙——中共中央特别任命的红军游击队抗捐军总司令。他高中毕业时已是中共党员，与林彪同路同时考入黄埔军校，同在步兵科学习。

黄埔毕业后从北伐战场回乡参加革命

黄应龙，本名王绍之，字德生，名临川。1906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柳林乡王敬湾一个极其反动的地主家庭。

黄应龙7—13岁时一直由塾师李芳教育，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李芳是鄂东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几年后成为黄梅县最早一批中共党员。后来在武昌启黄中学学习时，黄应龙又深受共产党人挥代英的教育和鼓舞，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开始萌芽。1925年底，黄应龙离家出走，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



/ 黄应龙(王绍之)。

1926年2月，经党组织推荐，黄应龙随一批黄梅籍青年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通过考试后，他被编入第4期步兵科大队第5连。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黄应龙随即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初，由于作战英勇，他已经晋升为国民革命军营长。后受中共上级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展革命斗争。

黄应龙等中共党员通过宣讲，让黄梅百姓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将带来新生活的希望，并带领他们打破祠堂，破除封建迷信，提出了“不信鬼，不信神，信的是革命”“三杀四抗”（即杀恶霸、杀反动、杀土

豪，抗租、抗税、抗粮、抗丁）口号。

1928年秋，黄梅的革命运动再次转入低潮。中共黄梅县委考虑到黄应龙在东区古角处境艰险，让他化名曾德安，以游医作掩护，到塘穴镇地区协助县委书记程运南组建下西区特别支部，开辟鄂皖赣边区地下交通线。黄应龙深入乡村，走街串巷宣传革命道理，串联群众加入革命组织，发动农民打土豪。不久，组建了中共塘穴特别支部。黄应龙善于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曾大夫”。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后来在红军中从事医院管理工作的重要原因。

1928年4月，时任中共黄梅县第2区区委书记的商味书英勇就义，临刑前作《七律》诗：

茅庐烧毁成荒丘，此去飘然作鹤游。

少妻廿年难耐冷，孤儿一岁不知愁。

贫寒总算无双我，气节堪嗟少别俦。

待到明年秋社日，定来荒冢泪频流。

得知商味书牺牲的消息后，黄应龙极度悲愤，更加坚定了他

与反动家庭彻底决裂的决心。同年冬，黄应龙步商味书遗诗原韵和诗一首，以寄托哀思，同时也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

社会践踏遍荒丘，近是豺狼兴日游。

志士有心去创业，精神无畏却无愁。

灿烂主张终不让，鲜明赤血信同俦。

兔死狐悲唯尔最，伤心谁不泪频流。

此诗由黄应龙的儿子王克忠保留至今，这也是目前唯一见到的黄应龙的诗作。

1929年初，黄梅县的革命武装斗争再掀高潮。在外隐蔽的不少革命骨干需要回乡工作，受到小池口国民党军队的阻挡。时任中共黄梅县委委员的黄应龙，组织下西区特支党员安排船只，从龙感湖上接送他们回乡开展土地革命。为支援山区斗争，黄应龙还发动下西区特支的中共党员到小池、孔垅大街上张贴革命标语，以分散吸引敌人的部分军事力量。

1929年夏，黄应龙派中共党员桂月秋到九江任报馆编辑和办私塾，借机联系进步青年和群众。他们以黄梅人经营的李义发客栈为联络点，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建立党支部，桂月秋任九江特支书记。黄应龙、桂月秋策划以塘穴特支和九江特支为基本

力量，组织长江两岸黄梅、九江的武装暴动。因不慎被国民党当局觉察，桂月秋被捕牺牲，黄应龙被通缉。党组织为了保护黄应龙的安全，将他转移到鄂东办事处，调到阳新工作。7月初，黄应龙到阳新报到，任阳（新）大（冶）手枪游击大队副队长。即在此时，黄应龙与封建反动家庭脱离关系，正式将名字王绍之改为黄应龙。

7月12日，中共鄂东南中心县委在大冶县殷祖镇南山村毛宕湾宣布成立红12军，下辖两个纵队和一个教导大队，由中央派来的谢振亚任军长。新组建的红12军是以黄应龙等率领的阳（新）大（冶）手枪游击大队为主，加上阳新、大冶两县的特务队和赤卫队合并整编而成。红12军建军后，转战鄂东南地区，开辟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秋末，彭德怀等率领的红5军第5纵队由江西转战到鄂东南。12月14日，红12军配合程子华、何长工等人成功发动了“大冶兵暴”，阳新起义也成功举行，红军势力大增。

12月底，鄂东南及附近的革命武装统一整编为红5军第5纵队所属支队：原第5纵队主力编为第1支队；起义武装为第2支队；原红12军和原第5纵队一部为第3支队，黄应龙任第3支队支队长。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

1930年春，红5军横扫鄂东南地区国民党武装大多数据点。此时，黄应龙调鄂东南特委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6月10日，彭德怀在大冶县殷祖镇洪口村马家祠堂召集会议，宣布将红5军第5纵队和地方武装扩编为红8军，原红12军主力编入第3纵队，纵队长谢振亚，政治委员余海清。6月16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湖北省委、红5军、红8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镇三房村召开扩大会议，由滕代远、何长工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宣布中央关于由红5、红8军组成红3军团的决定，彭德怀为军团长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这就是著名的红3军团的诞生。

原红5军第5纵队扩编为第8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黄应龙先后任第8军军部副官处长兼军卫生部附属医院政委，有段时间还到前线任过团长。黄应龙由此与何长工相识，数年后长征路上在干部修养连任职再次搭档。

红3军团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攻打平江县城时，红军伤亡多达300余人。红军医院药物奇缺，黄应龙同何长工研究，决心只身去武汉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何长工感到太危险，表示不

同意。黄应龙坚决地说：“为了伤病员，非冒这个险不可”。并决定仍用黄埔军校时期“王绍之”这个名字。由于购买药物过多，黄应龙引起了国民党的怀疑，遭到盘查，并被当作“通匪”嫌疑犯扣留审查。幸得党组织、武汉黄梅同乡会的友人四处活动，还有通过黄埔同学利用关系对他具保释放，最终得以脱险。虽然险些被捕，但通过这次事情，黄应龙打通了这条医药供应渠道。此后，他经常派人到武汉找同乡会的友人和黄埔同学帮助购买部分急需药品，保障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需求。7月上旬，黄应龙离开了家乡鄂东地区，随部队先后转战鄂南、湘东北等地。

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3军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第1、第2次“围剿”后，陆续向中央苏区开进。红3军团到赣南后，与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红1军团会师，组成红1方面军，即中央红军。

1931年6月，黄应龙任红1方面军第3军团第8军副官处长。9月，任红3军团医院政治委员，后任红5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红军军医学校政治委员。黄应龙的“游医”经历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部队中有许多指战员，师职领导人如石衡中（黄梅人，黄埔3期毕业）、洪超（黄梅人，黄埔5期毕业）等，都得到



/ 黎平会议会址。

过黄应龙的精心治疗和照顾。黄应龙曾多次要求到战场前线，但组织上认为红军医院岗位同样重要，在没有找到更好的人选到红军医院工作之前，勉励黄应龙继续战斗在医疗战线。

红军长征“特殊连队”首任指导员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即长征。黄应龙任红3军团卫生部政委，与部队一同踏上了长征之路。10月21日，在突破敌军安远、信丰间的第一道封锁线时，红8军第4师作为先锋部队，在信丰县古陂乡百石村遭敌截击，洪超师长不幸头部中弹，黄应龙急令医生前去抢救，但为时已晚。洪超与黄应龙既是黄梅同乡，又是黄埔校友，从在鄂东家乡组建红8军到并入红3军团转战

中央苏区并肩战斗，他们更是多年的亲密战友。洪超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师长，他的牺牲让黄应龙异常悲痛。

12月14日，中央红军由湖南兵分两路一举攻占贵州黎平县城。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座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城内翘街胡荣顺商号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确立了北上黔北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

中央红军冲破敌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经过湘江血战，到达黎平时，由出发时的8.6万人已锐减到3万人。部队减员较大，疲惫不堪，情绪低落，十分需要整休，以重振军威。黎平会议

决定重组部队，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作战力量，进行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首次整编。

周恩来亲自部署，把行军中有些年老体弱的高级干部、女红军和重伤病员集中在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即干部休养连，这支人员构成特殊的队伍，后来被称为“特殊连队”。在选择这支新成立的“特殊连队”的领导班子上，周恩来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别调来红3军团卫生部政委黄应龙任连指导员，中央纵队第2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任连长。黄应龙与何长工在鄂东南组建红8军时曾并肩战斗，他们无疑是一对好搭档。

《何长工传》第360页记述道：“长征路上，红军且战且走，部队牺牲数量大、伤病员多。当红军攻克文化名城遵义时，何长工率中央纵队第2梯队进驻遵义城。由于长时间的紧张工作，战斗的频繁，生活的艰难，何长工身体不支，积劳成疾，染上重病，住进了医院，即使治病，何长工也身负重任，周恩来任命他任干部休养连连长。”这段文字中的遵义，应为黎平，同时也说明何长工是因为重病治疗到休养连任连长，指导员黄应龙肩上的责任自然就更重了。

周恩来以命令的语气，郑重地对黄应龙和何长工说，这些干部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宝贵财

富，要对他们绝对负责，好好保护他们。你们在，他们在；你们不在，他们也要在。黄应龙和何长工深知这番话的分量。他们接受任务后，通力合作，挑起这个特殊连队的重担。

为了加强领导，周恩来还任命党的元老之一、总卫生部医院政委董必武任连党总支书记，并派曾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的女红军吴仲廉当秘书。

这个连队隶属红军总卫生部，没有排的建制，全连约有300余人，分成5个班：第一班为老干部班，由老同志和中央党校学员组成。班长是57岁的中央党校教员徐特立，人员有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等老红军，年轻一点还有成仿吾等；第二班为高干伤病员班，都是在战斗中负伤的团级以上干部。班长是陈伯钧，人员有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宗逊，第5师政委钟赤兵，第14团团团长文年生，中革军委纵队保卫团团团长姚喆等；第三班为女红军班，主要是生病和怀孕的女红军领导干部和中央首长的夫人。班长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人员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军事顾问李德夫人萧月华，红9军团党代表凯丰夫人廖似光，军委纵队副司令员邓发夫人陈慧清，总卫生部长贺诚夫人周越华，红9军团长罗炳辉夫人杨厚珍，红9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昆

夫人曾玉等；第四班为机要班。班长罗明，人员主要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还有伤病的机要人员及在白区做地下党活动工作的同志；第五班为流动班。人员不固定，野战部队中的干部伤病员送到这个班，养好了伤病又回到原单位。

工作人员分编在医务室和警卫、饲养、担架、运输4个排。担架和运输排的人员都是沿途请的民夫。谢飞、钟月林、钱希钧、王泉媛、邓六金、吴富莲、刘彩香、邱一涵、危秀英、谢小梅、蔡纫湘等11位女红军是这个连队的“政治战士”，她们多方面机动开展工作，既做政治思想和宣传鼓动工作，又做抬担架、挑药箱、护理伤员等工作。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有24位曾在这个连队工作战斗。

干部休养连的人员构成复杂并且身份“特殊”，管理有难度，然而首任连指导员黄应龙和连长何长工管理有方，尊重老同志，精心护理伤病员，工作出色，获得了休养连全体成员的交口称赞。

干部休养连这支特殊的红军队伍，在中国革命军队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红军长征中军队建设创新和实践的产物。中央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有许多领导干部曾在这个连当过“兵”，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遇到这个连的“兵”，都会主动停下来和他们打招呼与问候。如今，黎平县城翘街仍完整地保留有干部休养连的遗址。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召开。黄应龙与干部修养连在遵义城度过了难忘的日月，后随部转战川黔滇边，相继参加了四渡赤水一系列军事行动。

3月26日，何长工奉命到红9军团任职。红军总卫生部长贺诚提议，由原红8军团卫生部长侯政接任休养连连长。

4月初，黄应龙奉命任红5军团卫生部政委，由中央纵队司令部民运科科长李坚真接任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回忆录》第84—85页记载：“到扎西整编时，组织上便通知我到干部休养连任指导员……前任指导员叫黄应龙，是个军政委，扎西整编后，回主力部队去了，我接他的工作。”

从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4月初，黄应龙领导干部休养连工作的这段时间，这个“特殊连队”发生了多个“特殊”故事：女红军甘棠、李桂英加入川滇黔边游击队留在威信打游击；邓发的夫人陈慧清生孩子，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生孩子；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在敌机轰炸后负重伤，钟赤兵三次截肢后到干部休养连报到等。黄应龙在任内尽职尽责



/ 抗捐军的袖标和用过的大刀。

责，完成了“特殊连队”指导员的神圣使命。

4月中旬，黄应龙调任红3军团地方工作部（有称“后方部”）政委。25日，红3军团军团部在沾益县白水镇以东地区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黄应龙身负重伤，回到干部休养连养伤。

红军游击队抗捐军总司令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向北直进大渡河。5月20日拂晓，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部队抵达冕宁、西昌两县交界的漫水湾镇黄土坡，由此地开始进入冕宁县。冕宁是国民党川军第24军盘踞的地方，国民党反动当局敲骨吸髓，预征、借征驻军粮、彝务积谷等，名目繁多。红军决定成立抗捐军，以便推动广大群众与国民党第24军和地主土豪作斗争。

5月22日上午，毛泽东等领导

人与中央纵队（中央机关）进驻冕宁县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纵队政委陈云在县城召见中共冕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陈野苹，听取汇报，讨论成立地方政权、武装组织等事宜。下午，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出席会议，研究确定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抗捐军领导人的人选。时在干部休养连养伤的黄应龙伤口刚愈合，他在5月中旬会理会议召开后，即向组织提出分配工作回主力部队的要求。因为几年前他在家乡有着组建游击队的经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任命黄应龙为冕宁抗捐军总司令，他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黄应龙是红军长征中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唯一正式任命的红军游击队“总司令”。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1986年编撰出版的《红军长征在四川》第81页明确记载：“正式成立的

地方武装组织‘冕宁县抗捐军’，由红军干部黄应龙任总司令，陈野苹任政委，肖佩雄任大队长。”冕宁县志办2012年编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冕宁历史》第36页记载：“抗捐军总司令由红军干部黄应龙（长征初任第3军团后方部政治委员）担任，地方党组织领导陈野苹任政委。”

5月23日上午，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县城文庙（今冕宁第二中学校）大成殿前召开，有近千群众参加。大会由陈野苹主持，黄应龙等在主席台上就坐。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讲话，说彝汉人民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才能翻身过好日子。大会宣布成立中央红军入川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冕宁革命委员会，由红军干部陈云生宣布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随即宣布成立冕宁抗捐军，黄应龙任总司令，陈野苹任政委，肖佩雄任大队长，李发明任副大队长。

当晚8时，黄应龙奉命来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县城东街赵家老屋，同王首道、李井泉、陈野苹、廖志高等拟留下来打游击的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参加由中共中央常委毛泽东召集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大渡河两岸形势及游击战争、游击队任务和应当采取的政策和策略等问题。

冕宁抗捐军是一支由彝汉人



/ 冕宁县文庙大殿——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旧址（1994年拆除）。

民组成的地方革命武装。黄应龙接受任务后，乘主力红军进入冕宁革命热潮迅猛高涨的大好形势，广泛开展宣传，放手发动群众，努力扩大队伍，组织群众参加抗捐军。几天时间，抗捐军迅速发展，很快增加到500多人。司令部下辖大队，大队下辖若干中队，每个中队约100余人。抗捐军战士配带红袖章，由红军发给部分枪支，大部分战士使用的是大刀和长矛。抗捐军的建立，对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培养和锻炼革命骨干，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扩大红军队伍有着显著作用。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抗捐军选送向导给红军带路，动员当地青年参加红军，协助运送伤病员和物品，筹集军粮给养，宣传党的政策，维护治安，打富济贫，各项工作搞得热火朝

天。抗捐军枪毙了国民党冕宁县泸沽区区长、大恶霸余惠安，抄了城内大地主刘耀南、田坪大地主朱绍阶等人的家，把抄出来的粮食、布匹、财物分给穷人；烧毁原国民党县政府的档案和粮田册；宣传废除原国民党县政府残害彝族同胞的“换班坐质”制度。

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冕宁后，抗捐军以红军留下的100多名战士和当地青年为基础，精简改编成为一支约300余人的游击队，准备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因情况有变，抗捐军准备撤离。在撤离途中，被当地的反动组织袭击，抗捐军损失惨重，黄应龙负伤，后来被国民党抓获。

1935年8月，黄应龙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9岁。

1983年7月30日，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政府批准黄应龙（王绍之）为革命烈士。

百岁黄埔老人袁开宗

□ 林开伦

会理古城素有川滇锁钥之称，人文底蕴厚重。古城南街115号住着一位黄埔18期毕业现年103岁的老人，他叫袁开宗。黄埔毕业后，他先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76师师部联络参谋，后任黄埔军校第20期少校教官兼辎重兵中队区队长，及至第23期学生队区队长、教官。

1919年11月，袁开宗出生在会理金沙江畔黎溪镇绿水乡。他从小喜欢嬉水、游泳、滚沙滩，练就强健的体魄。他父亲袁廷仕是位熟读诗书的儒商，不仅在当地置有田产，在云南元谋、昆明还开了布庄，家境殷实。袁开宗8岁在乡下启蒙，1934年后到会理县城读书。1938年，袁开宗读西昌师范学校。一天，在学校举行的晚会上，体育教师汪一琴登台高唱《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从此，“黄埔军校”四个字深深烙在袁开宗心上。

寒假回家，袁开宗对母亲说

自己要去参军抗日，为国效忠！母亲为了让儿子留在身边，就将本村门当户对的杨家千金杨凤如迎娶进门，为儿子突击完婚。然而，抗战烽火越烧越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如战

鼓催征。袁开宗还是选择了服从自己的内心，义无反顾离家北上，从会理的金沙江畔徒步9天到达西昌，又翻山越岭16天到达成都，直奔从广州迁来的黄埔军校。不巧，第17期招考已经结束，18期要半年之后开始招考。情急



袁开宗。

的袁开宗斗胆呈文军校教育长陈继承，得以批准入入伍生团4营补习。经过一年补习，1940年12月，袁开宗如愿考取黄埔第18期2总队。

军校的生活艰苦而紧张，成都地处盆地，即便是夏天光照都少，冬天更是湿冷难耐。军校学生们穿着破旧的灰布棉衣，每天摸爬滚打进行训练，匍匐前进两百米，再卧倒、起立，这样的动作有时候要连续做几百次。平时进课堂、上厕所必须跑步。吃的饭里掺有稗子和沙子，吃的时候要先将备好的一碗水倒进饭里，让稗子浮起来，沙子沉下去，这样才能吃到中间相对干净的米饭。此外，还要进行饥饿和干渴训练，意志不坚强者，很难坚持下来。

1943年秋，由于远征军急需补充连排级军官。当年10月，军校奉蒋介石校长手令“第18期2总队学生提前毕业”。10月8日，军校举行毕业典礼。部分学生被空运到印度兰姆伽中国驻印训练基地，其余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直奔滇缅战场，袁开宗则被分配到在云南保山作战的第2军76师。辍重科毕业、会驾吉普开摩托的袁开宗，被任命为师部联络参谋，负责与在楚雄的军部联系。1944年5月，他奉命从保山到楚雄的军部接收任务，才上路半个来小时，就遭两架日机追踪



年轻时的袁开宗。

攻击。当飞机俯冲下来与吉普形成射击角度时，袁开宗机智地一脚急刹，躲过呼啸而来的弹雨，飞机随后拉起俯冲，他就再来个急刹。如此三番智斗敌机，虽然躲开了敌机的射击，却由于连续猛踩急刹导致刹车失控，就在吉普车即将冲下悬崖的一刻，袁开宗打开车门一跃而出，顾不上腿脚摔伤、右食指折断而赶紧隐入草丛。车已经坠下悬崖，日机在空中又盘旋了几圈才飞走。

由于未按时到达楚雄，军部派人前来搜索，袁开宗获救。伤愈后，坚持要上前线的他被前来昆明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军校教育长万耀煌调回成都，到军校校尉班工作，并担任第20期少校教官兼辎重兵中队区队长，及至23期学生队区队长、教官。

1949年冬，解放军进军大西

南。蒋介石密令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将黄埔军校迁云南大理待命。张耀明立即组成“迁校先遣支队”，以工兵科少将科长董劲儒为支队长，下设3个行动小组，袁开宗任第一行动小组组长，负责道路侦察及联络工作。10月24日，他们先遣支队官兵和家眷带着行李坐车从成都出发，成都到乐山汽车还能通行，但从乐山到西昌的公路早已中断，大家只能步行，走了8天才到富林，他们在富林停留了半个月。这时，乐山、峨眉都被解放军占领。袁开宗他们到西昌后才知道，黄埔军校的官兵均已投诚。

当时，顾介候的124军驻守会理，王炳炎赴会理任124军副军长。因为袁开宗是会理人，对当地情况熟悉，顾介候指名要袁开宗到会理去。因此，他作为王炳炎的随从参谋，匆匆赶往会理赴任。同行的还有蔡元注（黄埔20期生），李云超（黄埔21期生），付永宗（黄埔22期生），均是会理人。

他们一行到会理后，袁开宗和蔡元注被派到小关河指挥所，李云超、付永宗留作军部参谋。当时小关河指挥所主任是124军王之瑞副军长，实际兵力仅有王文汇一个团。袁开宗和驻守姜驿的韩培元营长、马成涛连长等6人从姜驿出发，经火焰山、下沙沟到金沙江北岸查看地势准

备构筑江防工事，阻止解放军北渡金沙江。当时驻金沙江南岸的李广惠营已脱离国民党起义了。事实很明显，解放军大部队即将渡金沙江北上进攻会理、西昌。

1950年3月22日晚6时，顾介候电令退守凤山营。3月23日凌晨4点左右，凤山营南面枪声大作，袁开宗从睡梦中惊醒，和王之瑞、王文汇及随行10余人从南面出街口观察情况，连遭冲锋枪扫射，回头从西面巷口冲出街，机枪子弹不停地向他们飞来，只好又撤回从北面冲，北面的机枪封住街口。他们感觉到南、北、西面都已被解放军包围，唯有从东面突击上山。3月24日早上，袁开宗从凤山营罗家村逃了出来。此后，他在潜伏特务的怂恿下东躲西藏。

1950年8月，袁开宗逃到昆明，不久被解放军抓获，随即，被判死缓。1952年，袁开宗开始在监狱服刑，潜心改造，立功赎罪。1955年至1957年，三次减刑后，袁开宗于1971年刑满释放，在监内就业。

1983年，64岁的袁开宗回到会理，第二次婚姻中所生的两个孩子虽说已经长大成人，但由于从小没有和他生活过，因此对他没什么感情。袁开宗只好租住在外，偶尔与老伴相聚。后来，女婿将自家在会理南街的房子留给了袁开宗。会理县政府每月也给



作者林开伦(右)与袁开宗合影。

袁开宗发放低保、养老金、高龄补助金，逢年过节，县上有关部门都到袁开宗家中看望慰问。2010年以来，袁开宗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资助、慰藉下，越活越开心，他开始写回忆录、写诗。

黄埔校庆
两岸黄埔兄弟亲，
爱国革命一条心。
齐心合力促统一，
振兴中华献余生。
黄埔军校铸群英，
黄埔学生肩重任。

黄埔情谊深似海，
黄埔老兵诗校庆。

此外，他还编著了《再生录》《正气文摘》《关爱抗战老兵》《抗战老兵诗词》《黄埔军校建校92周年》《黄埔老兵献诗刊》等文集。

如今，103岁的袁开宗正准备编印一本《抗战文摘》和《百岁文摘》，文稿已整理好，就等着编排付印。他说待春暖花开，天气暖和就集中精力投入编印，留点珍贵资料给后人。 

百岁黄埔寿星韩杰茜

□ 孙立新

202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十，家住河北唐山的黄埔同学韩杰茜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诞。受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委托，唐山市委有关领导前往韩老家中祝寿，向这位跨世纪的百岁黄埔老人送上诚挚的祝福。

韩杰茜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富裕商户。1943年腊月，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风华正茂的韩杰茜抱着抗敌卫国的志向，离开家乡只身闯过日寇封锁线，辗转到达陕西，于1944年春考入位于西安王曲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军校期间，学习军事理论和训练的同时，他和所在的学员队还参与了西安城防守军的部分外围协防任务，并在那里迎来了全国抗战的胜利。1947年，韩杰茜从黄埔21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不久即脱离国民党部队，到重庆的工厂当学徒谋生，后又考入当地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习。1955年，韩杰茜回到家乡唐山，当过学校的代课老师，也当过20多年的泥瓦工，直到1984年5月从市机铁铸造厂工人岗位退休。

今年100岁的韩杰茜，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体格硬朗，身轻如燕。他思维敏捷，活力十足，



/ 韩杰茜身披《黄埔》杂志社赠送的百岁寿星绶带。

说起话来声音洪亮，除了稍微有点耳背，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期颐老人。我们每次去他家慰问，他都是欢欢喜喜一路小跑着把我们送到路边。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状态，韩杰茜有他自己独特的养生之道。

他思想豁达，性格乐观开朗。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也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历经坎坷。但他从不抱怨、不消沉，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与人为善、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他与当小学教师的老伴长年居住在工厂宿舍区简陋的老房子里，过着相濡以沫、简单朴素但却快乐充实的生活。

韩杰茜从小爱好体育运动，尤其喜欢武术，还擅长篮球、足球等体育项目。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曾是校篮球队队长。刚回唐山担任体育老师时，他所带的学校篮球、足球队远近闻名。退休后，他仍然坚持体育锻炼，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身背宝剑、手握白蜡棍出现在公园里，练拳、舞剑、打太极，他的动作如行云流水，总是吸引众人驻足围观、拍手叫好。为此，韩杰茜被评为“唐山市健康寿星”、唐山市路南区“和谐社区文明之星健康之星”。除了自己练习，他还很乐于指导喜欢学习武术、太极

的群众。他也特别关心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曾多次给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提建议，表达一个黄埔老兵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还十分爱学习，关心时事。虽已是期颐老人，但他仍坚持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特别是《新闻联播》和《海峡两岸》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必看栏目。韩杰茜善于思考，不管是国家大政、两岸关系还是国际问题，他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谈起来头头是道。阅读时遇到感兴趣的内容，他就摘抄、剪贴到本子上保存起来，到现在已经积攒了好几本厚厚的剪报和读书笔记。每当我们收到他用钢笔密密麻麻书写的《学习〈反分裂国家法〉有感》《对台方针政策的新理解》《看阅兵式有感》《学习海峡两岸今日关注的心得》等学习体会时，都深受感动。他撰写的文章曾获得河北省有关单位征文的二等奖。

韩杰茜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里，他们一家曾被评河北省“书香家庭”。哥哥韩又新是一位书画名家，曾受教于徐悲鸿；弟弟韩溪是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音乐家。受家庭的影响，韩老兴趣爱好广泛，退休后他也开始学习书画，是唐山市老年书画协会会员。他每天在自己的斗室里笔耕不辍，经常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等组织的书



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看望韩杰茜夫妇(左一、二)。

画展和作品征集活动，他的书画作品入选《中华老年书画家作品精选》《新中国成立60华诞黄埔军校同学会书画作品集》《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书画作品集》《纪念建党90周年暨唐山大地震35周年“党在我心中”书画作品集》等，并多次在各种活动中获奖。去年，他的作品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举办的“历史伟业百年风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展”，到浙江、湖北、湖南等地巡回展出。他的书画作品充满了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也体现了黄埔老兵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

作为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唐山市黄埔联络组副组长，多年来，韩杰茜不忘初心，认真履职尽责，不但积极参与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还主动组织唐山市的黄埔会员学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种活动，为扩大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社会影响、促进祖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曾荣获河北省委有关部门“三增强四热爱比贡献促发展”先进工作者称号，多次被评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宣传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对此，他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号巨轮航行的海图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韩杰茜经常跟我们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今天的幸福生活源于党的正确领导。我，一个黄埔老兵，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我也是一个追梦人，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是：
盛世安享期颐福，
松鹤敬献上寿年。
东海南山皆典故，
且待人瑞谱新篇！



追寻黄埔生郎成栋的足迹

□ 郎瑞敏口述 庞世娟整理

2020年10月，家人在台湾的解密档案“非法颠覆案”中查到了我父亲郎成栋的有关资料。由此，揭开了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台湾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真相。

参加共产党

我的父亲郎成栋，1914年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第七区（现宋营镇）南豆村。他自幼在本村读书，1929年升入河北省立第七中学（简称正定七中，现名河北正定中学）。早在1924年12月，中共河北省立第七中学就成立了支部委员会，是中共石家庄地区党组织的发祥地。父亲在河北省立第七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叛徒告密，中共直中特委遭破坏，正定党组织停止了活动。1931年秋，河北省委派黎玉（党内名字叫李嘉年）到正定领导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父亲按照组织要求，很快把七中校内原隐蔽下来的党团员和转入学校的党团员组织起来和正定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父亲还先后参加了中共直中特委在灵寿县纪城和正定县三角村举办的学习班，接受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对敌斗争方法的教育。



／ 郎成栋入党时的照片。

1931年9月18日，日军出兵强占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在中共直中特委的领导下，父亲与二伯郎文栋、马玉堂、苏风德等人发动广大同学进行抗日

救亡大宣传。父亲平时住校，接受任务后带了几个同学回家，在家里刻蜡版，再用油印机印出传单，由大家分头出去张贴。10月，正定七中党支部决定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和规模，组织师生先后到正定、新乐、行唐、灵寿、阜平等十多个地方进行为期3个月的活动，印刷了大量标语及宣传品，把抗日救亡宣传推向了高潮，很多地方由此建立了党的组织。

中学毕业后，父亲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北平，先就读于平民学校，后来又考入北平铁路学院。1933年7月28日《华北日报》第七版刊登了北平铁路学院附属部铁路管理专修科录取名单，正取生共录取4名，父亲位列其中。

鐵路學院		東方高級中學校	
<p>鐵路學院 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三</p> <p>張雲、 德倫、 立志、 霍本、 本誠、 李煊、 金</p>	<p>鐵路學院 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三</p> <p>張雲、 德倫、 立志、 霍本、 本誠、 李煊、 金</p>	<p>東方高級中學校 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二</p> <p>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二</p> <p>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二</p>	<p>東方高級中學校 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二</p> <p>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二</p> <p>附屬部 鐵路管理專修科 正取生 二</p>

／ 1933年7月，北平铁路学院新生录取榜。

南京黄埔生

1934年8月，军政部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在南京、北平、杭州招收第5期学生，正取生120名、备取生20名。报名资格要求高中毕业或有同等知识水平的18—22岁男生。考试分口试和学科考试，口试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学科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国文、英文、理化、数学。8月10—24日报名，8月25日体检及口试，8月27日公布合格名单，8月28—29日学科考试。父亲看到招生公告，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便向组织汇报了自己想投考的想法，得到组织上的同意。军政部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旨在培养军事电信人才，包括特种通信教导队、通信军士训练班、通信勤务班等。学习内容包括入伍教育、本科基本教育、实地技术演习教育。

1934年9月16—18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闻报》等各大报纸，同时连续3天刊登了军政部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第5期第2队电信班录取人员名单，父亲被录取为正取生。公告中要求，被录取的新生须在9月20—22日到北平东安市市场锡拉胡同军政部军用第十四无线电台领取保证书，24日持证书到十四电台报到，交3张四寸半身照片。10月1日到南京上课，如果未能在10月1日准时报到，入学资格将被取

消。从报名、考试到入学的时间都很紧迫，父亲来不及跟家里联系，就直接从北平坐火车赶赴南京报到，路过石家庄时也没有下车回家看一眼，那时我刚满一岁。后来母亲收到父亲从南京寄来的信很是纳闷，心想不是去北平上学了吗，怎么信是从南京寄来的呢？看了信才知道，父亲从北平直接去南京上学了。

1936年4月，父亲从军事交通技术教练所（黄埔军校第13期）毕业，被授少尉军衔，分发到整编第2师。后来，父亲奉调到通信兵第1团工作。由于通信兵属于特种兵科，任职需要配备勤务兵，一般都由自己招收亲属或老乡。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回家乡招勤务兵，我见到了父亲。父亲从南京给我带回来好几件漂亮的小衣服和好吃的点心。小衣服很好看，我一直留着，后来把其中几件改给女儿穿。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我记事后唯一一次与父亲共处的珍贵时光。

抗战卫国

1937年4月，父亲奉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卫士大队第4队电信区队，任中尉区队副，后任卫士队第三区队电信分队中尉分队长。初夏，父亲时任上尉区队长，奉命带领陆军通信兵团刚刚结束新兵训练的40余人，从训练基地

出发，当晚到达首都南京。第二天被载到中山陵孝陵卫营房，继续对新兵进行训练。营区中建有一座德国式的靶场，每周进行两次射击科目训练。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随着日军步步逼近南京，南京政府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将重要人力设施向西南转移，使西南成为大后方。在整个转移过程中，父亲担任蒋介石侍卫室的警卫护送和通信任务。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抗战初期的防御阶段结束，向第二期抗战的相持阶段转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师以上军官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受邀参加会议。当时，父亲率部在南岳区祝圣寺后院驻扎，负责警卫通信工作。一天上午10点左右，传来空袭警报，父亲认真巡查值班岗位，叮嘱侍从室浙江籍战士孔次宫：“今天先生（蒋介石）召开一项重要会议，不可离开机要室。”话音未落，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就纷纷落下，有两枚落在机要室的后屋檐下地面两米处，幸好均未爆炸，屋子的后墙被震出丈余长的裂痕。

后来，父亲率部押运侍从室军需物资，顺湘桂路西迁桂林。在桂林，父亲负责布置蒋介石官邸和巡查护卫。有一次，他遇到

正在工作的蒋介石，被问道：“执勤卫士为何戴灰色领章？”父亲答：“隶属通信分队，所以佩戴通信兵领章。”部队离开桂林向贵州出发，路途艰辛，敌机轰炸频繁，全体官兵日夜兼程，最后由贵州进入四川。父亲也顺利完成了蒋介石的警卫护送和通信任务。

1939年，陆军36军成立通信兵营，父亲担任副营长。随着对日作战进程的不断深入，新兵训练任务越来越重，父亲奉调任第1补训总处通信兵营长，负责培训通信兵后备力量。补充兵训练总处和补训处隶属军政部，补训处的基本职能是训练军队的后备力量，结训后直接拨各军或卫戍部队做警戒之用。补训总处则源源不断地向作战部队补充输送通信技术人员，使各部队与后方保持密切的联络。

赴台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向中国政府正式移交台湾、澎湖列岛主权。抗战胜利后部队整编，父亲改做补给工作，隶属后方勤务部供应局，奉调去台湾参加军事接收工作。1945年11月，父亲在上海等船期间，托人给家里捎了一封信，告知他这些年都转战过哪些地方，现奉命随服务单位前往台湾受降。

台湾的军事接收工作统一开

始于1945年11月1日。当时军政部特派员兼后勤总部台湾供应局局长李进德还在上海候船，后于11月19日到达台北参加接收工作。凡台湾地区各陆军工厂、货物厂、医院、仓库和军事建筑等，均由军政组直接接收；其他由陆海空军各组接收的军品、物资等，集中接收完毕后，交由军政组接收。1946年2月19日，中国战区、台湾地区军事接收委员会办公处发文，通报于23日上午9时在本部大礼堂召开军事接收结束会议。对台湾的军事接收工作虽然按计划于4个月内完成了，但由于赴台接收人员数量不足，导致接收工作表面化严重，有些仓库接收后仍委托日军代为保管或还有部分未被接收。7月8日，军政部部长陈诚电告警备总部，由军政部部长台湾特派员李进德担任验收清点工作。

1946年9月1日，为统一后勤管理，后勤总部与军政部的兵工署、军医署、军需署合并，在南京军政部旧址设立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联勤总部下设12个供应局。1947年，父亲担任联勤总部台湾供应局第三科中校科长。1949年8月底，联勤总部在广州撤销建制。

涉案退役

早在1946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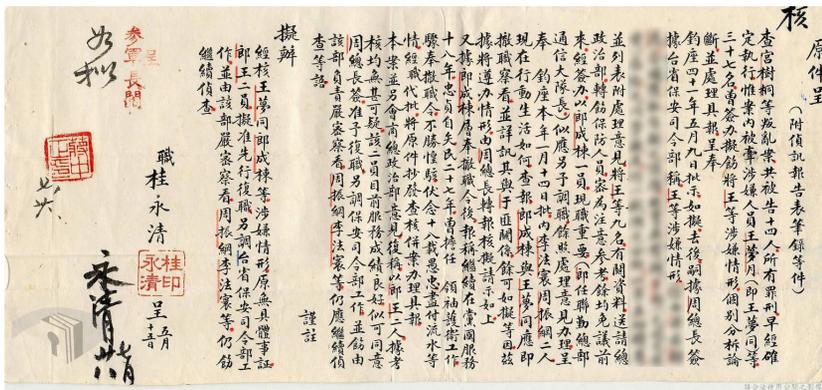
党组织，由台籍干部蔡孝乾担任书记。到1949年4月，台湾地下党组织蓬勃发展，正式党员增至1300多人。台湾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设定了1950年4月作为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时间表。

1949年5月，国民党在台湾发布《台湾省戒严令》，对台湾实施战争状态时的军事管制，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和旅行的自由受限，特别是可能与所谓“匪谍”有关的人，一律被逮捕和审判。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基隆委员会秘密发行的刊物《光明报》曝光，全台开始大搜捕，很多在台地下党员遭到逮捕。1950年1月，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最高领导人蔡孝乾被捕。这个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党员没有抵御住国民党刑讯逼供和各种诱惑，交代了台湾地下党的详情。据不完全统计，仅因蔡孝乾变节，就有400多人被逮捕，波及18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非法颠覆案”。

1950年4月，联勤总部在台湾恢复建制，总部设址台湾台北市中正区上海路（现中正纪念馆）。国防部下兵工、工程、军医、通信、运输、财务等各署划拨联勤，隶属台湾省“国防部”。



/ 1950 左右的郎成栋。



/ 关于郎成栋复职批示。

父亲被任命为台湾省联勤总部通信大队上校大队长。

在“非法颠覆案”中，随着变节者供述名单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地下党员被牵扯进来。1952年1月，正定七中毕业的宫树桐（陆军第87师作战处中校组长）、梁钟浚（国民党陆军总部体育处上校副处长）被捕，1953年被杀害。受宫树桐、梁钟浚案牵连，同为正定七中毕业的父亲被传讯。1953年1月14日，蒋介石亲笔批示：“郎成栋与王梦同应立即撤职查办，并详讯其与于匪关系，余可如拟办理。中正。”同案涉及王梦同（别名王梦月，正定七中毕业）和其他台湾军政各界人士37人。军法局经过近半年的严密审讯和调查，父亲中学时期表现左倾的问题被人供出，但父亲坚守组织原则，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因未查到父亲与中共地下党关系的具体事证，加上他在单位表现良好，1953年5月7日，国防

部发文《查报李法环等之行动生活及讯明郎成栋等未与于匪发生任何关系》。7月9日，总统府发文《王梦月等侦讯报告表笔录等件均悉王梦月郎成栋可准复职》。郎成栋被准予复职，但调离原单位，严密监视，以防意外，直至退役。

落叶遗憾

1985年的一天，正定县党委要对父亲的事情进行调查，我和丈夫一起去了正定县政府，接受了当时负责正定县党史编纂人员的访谈。县里的工作人员主要向我们询问了一些父亲在家里时和去台湾前的情况，就让我们回家了。后来，正定县党委把一本《正定党史人物简介》的小册子交到我手中，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地下革命斗争，带领同学们进行抗日宣传以及被组织派遣去军校等事情。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去台湾受降，也是受政府指派去的。我和家人第

一次在这个小册子里看到了父亲入党时交给党组织的照片。

1987年，随着台湾的解严，两岸经贸交往、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蓬勃发展，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家里开始委托去台湾看望亲人的正定老乡，帮我们寻找父亲在台湾的下落。自1949年12月以来，台湾各地相继建立起不同省市的同乡会，仅台北河北同乡会的在册人数就有4000多人。他们借助发行刊物，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聚会，资助老乡子女升学深造等方式开展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抒发在台军人及其亲属对大陆的思乡之情，同时开设寻亲平台，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分隔在大陆和台湾两地的亲人团聚。父亲也参加了河北同乡会，并通过这个平台寻找我们。1988年，我在给父亲的信中捎去了全家福照片，向父亲讲述了家乡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在等待了一年多后，我们终于收到了父亲的回信。这封信，母亲和我等了40多年。

父亲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淑娥（我的小名）吾女，收到你去年8月的来信，深知你的家庭愉快，值得庆贺与安慰。关于我的方面，真是千头万绪，不知如何说起。主要是时局总不稳定，而失掉联系。内心感到十分歉疚，实在对不起家中父母亲与你的妈妈，无法偿还的罪过，恳请宽恕，容后再报。自从去年十一月台湾开始来台民众大陆探亲，我即将身体方面再做进一步的保养检查，除血压高一点外，其他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疾病。希望有机会回家欢度晚年，共享天伦之乐。望来日安定，还有见面之日，我们共同祈祷吧！

1992年左右，家人在一次亲友聚会上偶遇父亲在台湾的旧同僚，得知父亲曾经涉案被捕的事情，不敢贸然前往台湾。1995年8月，父亲在台北荣民医院病逝，享年81岁。落叶不能归根，父亲抱憾终生。母亲苦苦等待59年，终身未再嫁，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离开了我们。冥冥之中，两位半个多世纪不得相见的老人，相伴去了他界。

2013年12月，为了纪念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无名英雄纪念碑）。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台



1988年，郎成栋夫人（左三）、作者郎瑞敏（左二）、庞世娟（右一）和家人摄于石家庄市长安公园。

基正面有毛泽东题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与父亲同案的宫树桐、梁钟浚和其他844位隐蔽战线烈士的名字都被镌刻于此。无名英雄纪念碑铭的最后这样写道：“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女儿告诉我，她在查询姥爷从军的佐证史料过程中，看到抗战期间成千上万名军官和战士的名单，仿佛时间隧道将她带回到那烽火连天的战场，看到了无数位年轻战士为保卫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献出他们的青春乃至生命的场景，对先辈和先烈的敬佩和感激之情倍增。那些档案材料会随着岁月的侵蚀风化泛黄，字迹会越来越模糊不清，但抗战

将士舍小家为大家，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铸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今年80岁，每天坚持看报看电视，特别喜欢看《海峡两岸》这个节目。我随时随地向亲友们宣讲党和国家在治理疫情方面的英明决策，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效率地管控住疫情扩散而自豪。我此生虽然没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有着共产党员般的坚强意志和信念，毕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传承黄埔精神，期盼祖国统一。我作为黄埔后人，让家人把我所知道的父亲的经历整理成文，是对传承黄埔精神的最好诠释。亲爱精诚，世代相传。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我很怀念我的父亲，期盼祖国统一早日实现。 

抗战胜利后赴台轶事

□ 宋衡夫

宋衡夫(1917—2003),湖北汉阳人,民革党员,黄埔军校13期生,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曾任国民党92军318师上校参谋长,抗战期间从事训练工作。1949年后在华北军大、第六高级步校、石家庄高级步校、石家庄步校战术系任教员组长。

1945年9月,宋衡夫以军政治部台湾特派员办公处少校参谋身份,赴台接收日军投降后的物资。此文记述了宋衡夫在台工作一年期间的所见所闻。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我被调至军政部台湾特派员办公处任少校参谋,赴台接收日军投降后的物资。10月上旬,在重庆朝天门集中编组后,即乘轮船经武汉到上海,再换海轮赴台湾。一路上,我们这群年轻人总是兴奋地聚在一起谈论到台湾后的打算。有的说:“要登登阿里山,看看日月潭的优美风景。”有的说:“一定要吃一顿台湾的海螃蟹、大对虾,解解馋。”我却想看一看有关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的遗址。



/ 宋衡夫。

我们到达台湾时,虽然日寇投降已一个半月,欢庆的气氛依然很浓,我们的到来好像给这热烈的气氛又添了一把火。我们抵达基隆港时,许多当地民众自发地汇集在岸边,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拼命挥动双臂,有的摇着手帕、帽子、彩带,向我们表示欢迎,有的还振臂高呼:“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庆祝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欢迎内地兄弟到台湾工作!”等口号,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般,用亲切、渴望的眼光望着我们。我也沉浸在无限自豪和极度欢乐之中。他们欢迎的仅仅是我们这几十个人吗?不,他们欢迎的是来自祖国的温暖,欢庆的是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

到达台北后,我们雇用了一些当地人,大多是福建和广东迁来的,大部分人说闽南话,少部分人说客家话。他们以能说普通话为荣,用刚学会的一点点还不流利的普通话与我们交谈。其中一位姓林的中年人与我们很谈得来。当我问及日寇统治时期日本人怎样对待中国人时,他说:“别提了!那些不平等的待遇和折磨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就拿说话来说,我们是中国人,可是我们连说中国话的权利都没有。学校里只教日文,不准学中文,一旦发现你说中国话,不是挨揍,就是挨整。”我问:“现在的年轻人和小孩能说中国话吗?”他说:“能!日本人不准学,不准教,



/ 台湾民众庆祝台湾光复。

不准说，我们就在家里偷着教，偷着说。不过，要说普通话就难了。你们今后多教教我们吧！”我说：“我是湖北人，普通话也说不好，咱们以后互相学习吧！”从此以后，只要相互接触时，我们就向他们学闽南话，他们则积极学说我们那种似是而非、南腔北调的“普通话”。

工作开展起来后，我们很少有闲暇游览风景名胜，也没能实现我参观郑成功收复台湾遗址的心愿，倒是去北投温泉洗过几次澡。北投温泉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区，三面环山，南临淡水河，温泉泉穴很多，流量丰富，据说常在此洗澡可健身去病。北投距台北有二三十里路，坐火车半个小时即到。每次去北投温泉，我们几个人总是爬到山顶，遥望着祖国大陆的方向，思绪万千：过去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和蹂躏

几十年的美丽宝岛收复了！

一次，办公处同仁在一起谈论抗日战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时，有人说：“主要由于美国向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为此，老特派员李进德在朝会中专门严肃地进行了训导。他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全国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不畏牺牲所获得的。外援是重要的，原子弹是有其相当大的作用的，但都非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是我们自身。作为中国人来说，应该有民族自豪感、自尊心与自信心。”这番训导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我非常信服李进德的观点，他的话使我认识到，民族团结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在台湾的这段时间，我们同当地人的感情与日俱增，关系愈加亲密。当地人待我们也如家人

一般，只要有就会就拉我们去做客。相互熟识以后，谈起话来也越发能够敞开心扉。我们到一个陈姓当地朋友家中做客，酒酣饭饱，主人突然带着凄楚的声调问我们：“听说你们快走了？”我们说没有那回事，他才轻松地说：“这就好了，这些年来，我们就像没有母亲的弃儿那样孤单凄凉，白天黑夜盼望回到祖国的大家庭里。以后，咱们这一家人可以同心协力建设国家，永远安居乐业，你们说这该多好啊！”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诚朴的语言始终回荡在我的心田。

1946年9月，我们返回祖国大陆的那一天，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站在最前面的是我熟识的朋友，他们眼里噙着泪花，我们的舰出港很远了，他们还不愿离去。我喃喃应道：“祖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良友》画报中的“八百壮士”

□ 姚新婧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带领的“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奋战四昼夜，成功掩护国民革命军撤退的事迹，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当时的《良友》画报也对“八百壮士”临危受命、死守四行仓库、被迫撤退到公共租界的孤军营，以及谢晋元的牺牲进行了跟踪报道。

临危受命

八一三事变当天，日本就对上海闸北地区进行猛烈炮击，《良友》画报报道中说：

日军既大举侵入华北，复威胁我淞沪，故意派中队长大山勇夫及一等水兵齐藤要藏，闯入我方虹桥机场，而造成淞沪之恐怖局面，企图以此要挟我当局。我为自卫与维持和平局面计，拒绝日方之无理要求，日乃增调部队来沪，而于八月十三日开始进袭我闸北八字桥一带防地。日方侵沪之野心，至是已全部揭露……日军布置就绪，遂于八一三开始向我闸北守军挑衅，引起淞沪战争。

事变第二天，1937年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国民革命军最精锐的部队87师和88师首先主动出击。随着战线的拉长，军队部署在不断调整，军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9月21日，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15、第19集团军编为左翼兵团；朱绍良代替抱病的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作为中央兵团，作战区域为北站、江湾、庙行一线及以西



／“八百壮士”。

地区；以张发奎为总司令的第8、第10集团军编为右翼兵团，作战区域为苏州河以南至杭州湾北岸地区。10月23日，日军率重兵前往真太公路，直逼大场左翼。因庙行、大场位置较为突出，成了日军的眼中钉。

10月26日，大场失守，守军为保存实力而转移，“上海闸北为我军淞沪战线之右翼，工事坚固，敌军屡攻不逞。十月廿六日，因大场失守，闸北形成突出之势，故不得不忍痛退出，即军事上所谓‘战略的撤退’。退出部队秩序井然，右翼部队依次支持左翼防线，以致我军全部退出”。当时撤退时，原本是要88师全部留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以掩护撤退，但征求88师师长孙元良意见时，孙师长建议只留一个团留守掩护。孙师长便把这重担交给了524团团附谢晋元。

四行仓库保卫战

四行仓库最初是四家银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共同出资建设的存储货物的联合仓库，以墙厚楼高、易守难攻著称，因此成为第88师司令部

驻地，其中还有不少弹药和粮食。四行仓库的北面和西面是被日军占领地区，东面是公共租界，南面是苏州河，河的对岸是公共租界，所以四行仓库的位置形同“孤岛”，而“八百壮士”便也成为了孤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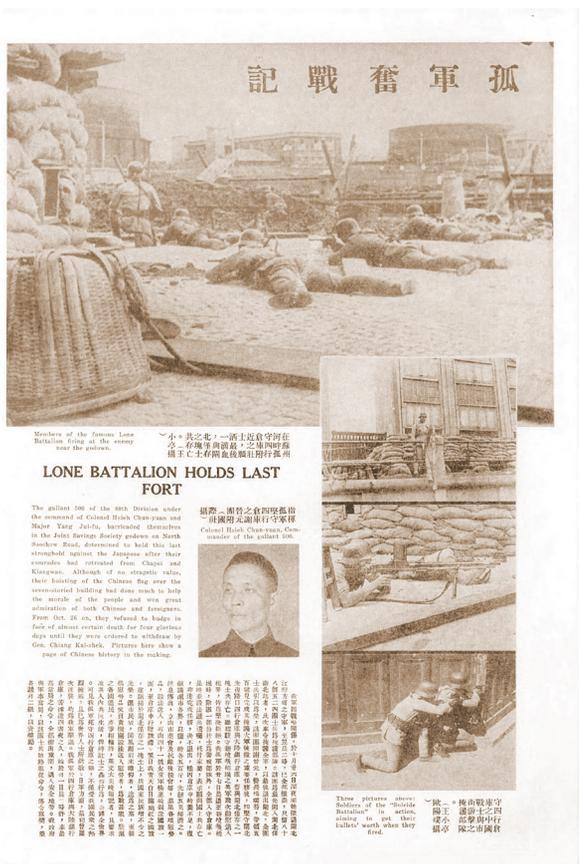
谢晋元率领该团400余人，于26日深夜开始退守到四行仓库内，坚守闸北这一块阵地，进行了4昼夜的艰苦战斗。《良友》画报也立即报道了相关情况：

因战略关系，于十月廿六日深夜开始撤退闸北江湾方面之守军，之翌晨二时，已全部撤尽，只留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士兵为掩护部队。该团为最先开入闸北保卫北站者。此次奉令掩护全军，以最后退出闸北，全团士兵引以为荣，该团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带领五百健儿完成其掩护大军后撤之重要任务后，即坚守闸北光复路口四行仓库与大陆银行仓库，誓与闸北仅存之一块土共存亡。

27日晨，谢晋元率该团退至新垃圾桥头时，除派一部分壮士为警戒部队外，全部入守仓库。进入仓库内，谢晋元便立即部署兵力防守，加固防御工事。驻守新垃圾桥头的英军几次劝慰退入租界，谢晋元皆坚决拒绝。当天晚上并设法递出遗嘱，托付家属，表示愿与国土共存亡，非完成任务，决不退出。因四行仓库中供给不足，谢晋元呼吁外界人士支援：“以盐，糖各五百斤，光饼五万接济之。”消息传出后，上海市商会及抗敌后援会等，立即募集各项慰劳品，想方设法送入四行仓库。

28日下午，女童军杨惠敏渡河献旗。上海民众、在沪各国侨民以及一些外国记者听说后，纷纷前来观看瞻仰：

沪市民众，闻风而前来瞻仰者，途为之塞，至亲携慰劳品交负责机关设法送入慰劳者，为数甚众。



《良友》画报第132期《孤军奋战记》。



四行仓库。

驻沪之各国侨民，亦争相输将，英文大美晚报记者，且要求准其入内共同生活，俾将壮士之轰炸行为，公诸全世界。可见我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之举，不仅受我国民众之热烈拥戴，且已为世界认识所钦敬。

日军屡次进袭均被击退。“八百壮士”于四行

仓库与大陆银行仓库苦撑达4昼夜之久，成功完成了掩护大军撤退的任务。日军伤亡200余人，“八百壮士”则只有20余人伤亡。“八百壮士”英勇抗战，引起了上海公共租界的严重不安，他们要求“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国民政府与公共租界的英军达成协议，英军助力压制日军火力帮助孤军撤退入公共租界内，乘英军的汽车回沪西归队。31日凌晨1时许，谢晋元率军冲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但由于受到日军的威胁，公共租界违背了协议内容，把孤军扣留于胶州路孤军营内。这一困便是4年之久。

亲历者的叙述

孤军琐记

“八百壮士”中的一位军人在撤离四行仓库后投稿给《良友》画报，讲述了在保卫四行仓库的过程中，“八百壮士”井然有序，各司其职，抱着与四行仓库共存亡的决心，积极地对抗敌人，展现了崇高的爱国情怀。

作者首先向送来慰问品的民众表示感谢，并向民众传达撤出四行仓库到达公共租界后平安的消息。接着，作者对守卫四行仓库的过程作了一定的叙述。当时接到命令之后，谢晋元团附和杨瑞符营长带士兵分途退出北站，开入四行仓库。凌晨2点多，一些人布置防御工事，作者和几个士兵把守着蒙古路附近的要口。6点左右，日军开始袭击。为保存力量，他们一边迎战，一边退出四行仓库附近的阵地。下午2点后，“我们退入仓库中，有些敌人再逼近来，我走上屋顶，由窗口扔下几个手榴弹。当场就击毙了几个敌兵，其他的慌慌张张的退走，不一刻敌人派来了几条猎犬，拖了死尸就走”。

最后，作者还介绍了在保卫四行仓库过程中的几件趣事：

其一，我们以为吃水极缺乏，不敢乱用，拿了几只大水桶，把撒下的尿都储起来，当作“消防药

水”，因为敌人时常用火攻我们，我们不能不预防万一；其二，有一天晚上，我亲自拿一个用棉花做成的照明弹抛下地上时，却碰巧打中了一个伏在地上的敌人，他嗷叫了一声，以为是吃了一个钢炮弹，曳了尾巴就跑；其三，还有一天，我用望远镜望过对岸，见到一位外国太太，一边仰头望着我们的窗口，一边用手巾拭着眼泪，不胜怜悯的样子，到后来，又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好似请求她的上帝来保佑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紧要的，最紧要的是国家民族的生存，所以上海中外人士对我们的热诚，我们是感激的，但是各界的慰劳，我们却受之有愧，因为我们军人是有守土的天职的，为国而死，可说是责无旁贷。

沉着的一夜

在“八百壮士”奋战4昼夜的过程中，各界人士及民众争送慰劳品，以此表达他们对“八百壮士”的热烈支持和崇高敬仰。童子军战时服务团也积极负责后援接济工作，他们把民众送来的慰问品装满卡车后，想方设法送到“八百壮士”手中。一位在童子军总部工作的童子军，将他们支援“八百壮士”的经过也刊发在《良友》画报上。

当数百健儿死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市的300万民众可以说没一个不表示着敬意与关怀：

那天午后，无线电是不停地播送出闸北八百健儿抗战的英武情形，同时又竭力为孤军呼吁，请求各界人士多多捐助食粮。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工人，商人，学生，黄包车夫，卖报小贩，他们都亲自走来，手里提着一包东西，很诚意的，千叮万嘱，要送给死守闸北的孤军的。

童军团部在4小时之内就被许多捐赠的粮食堆满，有光饼、大饼、面包、年糕、面粉、白米、火腿、麻油、香蕉、苹果、生梨、白糖、枣子、食盐、

大头菜、自来火、洋油、馒头……

当晚，童子军便开始运输物资，共有5辆车开往四行仓库。前面两辆是褐色的自备汽车，里面坐着几位穿西装的中年人，中间两辆是装煤的卡车，上面满载了许多慰劳孤军的食品，后面一辆是没有篷的小卡车，那里立有六七个穿着传统军制服的童军，“当抵达四行仓库时，童军们都不谈话，同时车上的灯，也全都熄灭了。几个男童军，小心翼翼地搬运着，直到搬完为止。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敌人曾发三小钢炮，来试探过他们”。

我们的生活

1937年10月31日凌晨，“八百壮士”接到命令开始撤退，退出四行仓库后，被困在公共租界的孤军营营内，长达4年之久。在这4年内，“八百壮士”是如何生活的？《良友》画报在139期（1939年2月）发表了谢晋元的一篇文章《我们的生活》，并配上12幅照片，展现了“八百壮士”一年来在孤军营中积极乐观的日常生活状态。

孤军营的生活环境较为艰苦，谢晋元写道：

余等被困于上海公共租界，驻地为星加坡路十号对过。因为这块十亩上下的空地，原系水湖，高低不平，过去用作堆积垃圾，因此没有门牌，和胶州花园仅一墙之隔。我们住的房屋，极度拥塞，且高不及丈，简陋不堪，雨天满屋漏水，衣寝尽湿，行动维艰。尤以卫生设备毫无，一切凭余等艰苦经营。

“八百壮士”的生活环境虽苦，但是生活作息以及业余生活还是较为规律稳定和丰富多彩的。“八百壮士”全体官兵，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起床后有半个小时的洗漱和打扫清洁时间。5点到7点半是晨操时间。担任警备的万国商团俄国队会在8点检查人数，大约10分钟左右。9点开始早饭，10点

到11点为课堂时间。11点到下午2点半为自由活动时间，可以洗衣洗澡等。下午2点半到3点半，教练拳术或唱歌、游戏。晚上7点半到8点半为洗澡休息时间，晚上9点正式就寝。除课堂时间外，其余时间大半花在运动场上。孤军营中有篮球、排球、垒球、网球场各一个，三个乒乓球台，以及钢架、木马、铁饼等。

我们篮球队共有五队，计分“孤军”“攻击”“斥候”“突击”“冲锋”。为了各队人数过多，球场不敷分配，所以现在正在计划加筑一方。篮球方面，蒙吴子彬先生暨青年会陆总干事派人前来指导，又有宋福华先生每周前来放映电影一次。另有口琴队，承石人望先生亲来教授。

谢晋元牺牲

在孤军营内生活的4年之中，汪伪政府曾想笼络谢晋元，但被谢晋元坚决拒绝。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像往常一样到操场率兵早操，却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用匕首行刺，不幸去世，谢晋元当时年仅36岁。

谢晋元深受士兵和民众的爱戴，所以在他的追悼会上，民众都自发前来吊唁，入场致祭的民众达4万余人。《良友》画报也报道了这一壮观场面：

谢晋元团长不幸殉难，中外闻耗无不痛骇，孤军营内大礼堂上各界之前往瞻仰遗容者日必四五万人，因谢团长之棺木，系用玻璃棺盖，在棺旁可以窥见遗容，谢团长生前与本市各界交谊素切，故噩耗传来，均自动前往吊唁，仰瞻此民族英雄之遗容，追念其忠凛勋绩，无不肃然起敬。青年学生于瞻仰谢团长遗容后，莫不面露戚容，间有失声痛哭者。孤军壮士对四年来艰苦共进的谢团长遗容作最后注目礼，热泪盈眶。孤军士兵与民众代表为谢团长盖棺。谢团长盖棺时在场民众莫不哀嚎凄怆，如丧考



月日炳光·忠孤節大 國殉元晉謝長團軍孤

WHOLE CHINA MOURNS LOSS OF FAMED LONE BATTALION LEADER

全中國哀悼孤軍領袖謝晉元元帥之殉國
孤軍領袖謝晉元元帥，於淞滬戰爭中，率領孤軍奮勇抗日，至死方休，其忠勇精神，為全國同胞所敬仰。謝元帥於本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淞滬戰爭中，率領孤軍奮勇抗日，至死方休，其忠勇精神，為全國同胞所敬仰。謝元帥於本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淞滬戰爭中，率領孤軍奮勇抗日，至死方休，其忠勇精神，為全國同胞所敬仰。

孤軍領袖謝晉元元帥，於淞滬戰爭中，率領孤軍奮勇抗日，至死方休，其忠勇精神，為全國同胞所敬仰。謝元帥於本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淞滬戰爭中，率領孤軍奮勇抗日，至死方休，其忠勇精神，為全國同胞所敬仰。

His battalion maintained its position for several months despite severe Japanese attacks. When the main Chinese army withdrew from China in October 1937, Col. Hsueh's battalion took up a position at the Joint Szeung Society Bank Gardens. For four days and nights the battalion resisted, but as Japanese attacks from all sides under desperate conditions. The fight was so spectacular that it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 battalion was eventually ordered by Gen. Chiang to be withdrawn into the settlement on October 31, 1937.

存長氣浩·在永型典^①

— 英 毅 的 前 生 長 團 謝 —



/ 《良友》画报第 166 期。

/ 《良友》画报第 166 期。

她。孤军营后一小园，将为谢团长安葬之处，将军英灵不泯，可以含笑九泉矣。

军集中营，经过几年苦役，最终回到了上海；部分人曾追随新四军的步伐积极抗日；部分人解甲归田；部分人在上海码头从事劳力工作……“八百壮士”最终回归到平凡生活并逐渐消失于人们视野，但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敬佩与铭记。上海市将北火车站到四行仓库的道路改名为“晋元路”，将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了谢晋元墓。

谢晋元带领“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之久。为了能够更好地缅怀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的壮举，《良友》画报进行了相关内容的汇总整理，配上了24幅照片，重新展现了谢晋元生前的生活、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以及“八百壮士”在孤军营内的生活状态，并对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1983年，上海市在虹桥万国公墓重建谢晋元陵墓，以缅怀这位抗日英雄。198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展出了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图片。2014年9月1日，谢晋元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12月17日，民政部正式批准追授抗日英雄谢晋元为烈士。^②

结语

《良友》画报1941年10月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日军查封。但从其他资料可以看到，同年12月，日军突然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将“八百壮士”剩下的士兵押走。部分人被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日

中央伤兵管理处的组织管理系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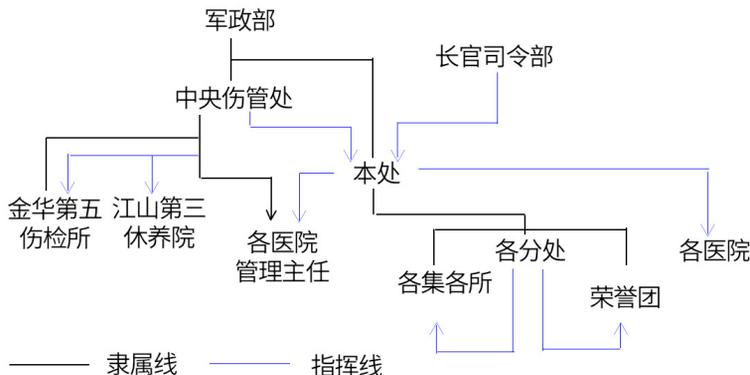
□ 杨守礼 黄胜利

一、中央伤兵管理处组织管理系统概述

抗战时期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略部署失误等诸多原因，使得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政府对伤残官兵的救治、安置和抚恤，必然会对前线将士的士气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军队兵员的补充，因此，政府对伤残军人的救治、安置和抚恤就变得特别重要。伤兵经常是数以几万、十几万地涌向未被敌人占领地域，救治和安置伤兵是十分繁重而艰难的工作，而隶属于军政部的中央伤兵管理处正是负责救治、训导、安置伤残官兵的政府机构。中央伤兵管理处编制庞大，组织管理系统也比较复杂，但也颇为有效。

各省、战区设伤兵管理处，隶属于军政部，受中央伤兵管理处和相应省或战区指导，分别管理各自辖区的伤兵救治、管训和安置工作，并对中央伤兵管理处直属之残废军人教养院、临时残废院、休养院、感化所(队)等进行指导。中央伤兵管理处还通过派遣管理主任或管理员到

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系统隶属及指挥表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一一，案卷号 10490；
吕文洁：抗战时期伤残军人的救助问题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各类医院和医疗机构，实施其管理权限。中央伤兵管理处还有直属的伤兵检查所(纠察所)，负责伤残官兵伤残等级的评定，借此给予相应的救治、照顾、补助和抚恤。此外，中央伤兵管理处还设有伤兵感化所，对不遵守纪律的伤残士兵进行教育；设立荣誉团，对伤愈官兵进行必要的训练，以便他们以更旺盛的斗志重返抗日战场；成立荣誉军人习艺所，培养伤残官兵生产自救的能力。

从形式上各省及战区伤兵管理处隶属军政部，但实际上他们的业务领导是中央伤兵管理处，

包括各省、各战区伤兵管理处所设的国民党区分部，也直属于中央伤兵管理处的区党部领导；各省、各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副处长任命都是经过中央伤兵管理处的。如中央伤兵管理处的行文：“本(二十六)年十月派宣铁吾兼任浙江伤兵管理处处长，刘绍先兼任江苏伤兵管理处处长，廖士翘兼任江西伤兵管理处处长，丁炳权兼任湖北伤兵管理处处长，王锡钧兼任安徽伤兵管理处处长……”宣铁吾、王锡钧、丁炳权都是黄埔1期毕业生，刘绍先和廖士翘都曾任中央军校主任或教官。

表1 伤兵管理机关新旧名称对照表

原名称	改正名称
军政部中央伤兵管理处	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
X省或第X战区伤兵管理处	X省或第X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
中央伤兵管理处第X休养院	荣誉军人第X休养院
中央伤兵管理处第X残废军人教养院	荣誉军人第X教养院
中央伤兵管理处第X临时残废院	荣誉军人第X临时教养院
中央伤兵管理处第X伤兵检查所	荣誉军人第X纠察所

名称变更时间为1940年5月，但伤兵检查所改为荣誉军人纠察所为1941年5月。

各级伤兵管理处负责的事宜包括：伤残官兵收容、出入院及输送的监督与协助，治疗、给养及经理的监督，纪律秩序之维持，伤兵训练及慰问，奖惩之执行，等等。同时在必要地点设置总集合所和检查所，用以办理分遣伤兵前往适当医院、分派伤愈官兵前往部队、发放伤票等工作。

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系统隶属及指挥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各省、战区伤兵管理处隶属于军政部，但它们受中央伤兵管理处和相应省和战区的指导和指挥，本文所用“下属”一词系指指挥权所致，不是隶属的概念。这些下属伤兵管理处又根据需要设地区管理分处，或第X管理分处，这些管理分处管辖若干医院、休养

院、残废院等具体实施救治的单位。中央伤兵管理处和军政部军医署、各战区兵站共同管理一大批医院、野战医院。安置伤残官兵的机构有垦殖团、实验农场、屯垦总队、荣军工厂、实验工厂、习艺所、各种生产合作社等，我们将在另文介绍。

中央伤兵管理处及其组织管理系统内各单位的名称，都带有“伤兵”“残废军人”字样，这是这些机构建立之初，按人们的常规观念命名的，比较直观。1940年初，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总干事段绳武先生鉴于“伤兵”“残废”等称呼会增加伤残者的自卑心理，并影响社会人士对抗敌致残将士的崇敬，于是倡导改称“伤残军人”为“荣誉军人”，此举得到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1940年4月18

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函请军政部代电全国各军政机关，将“残废”字样一律废除，改称“荣誉军人”，各伤政机关以“残废”命名者，亦以此改称。为此，军政部特令各伤政机关自1940年5月1日起将“残废军人”字样一律改称“荣誉军人”（简称荣军）。同日，中央伤兵管理处奉军政部令，改称“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临时残废院”改为“临时教养院”。“荣誉军人”一词遂逐步取代“伤残军人”，而成为因伤致残官兵的普遍称谓。

1940年5月之前的文件资料，都使用旧名称，此后改用新名称。由于新旧名称互换常引起混乱，特给出对照表（表1），以利查照。本文依然主要使用原来的一套旧名称，因为它们比较直观，不易混淆。涉及1940年5月以后的叙述使用新名称，必要时后面加注旧名。

本文使用一些表格来说明中央伤兵管理处的组织结构，其中的资料都是逐条查找来的，有的表格内容比较完善，有的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来补充。本文资料来源主要有：台湾“国史馆”，荣誉军人之管理安置，典藏号：008-010706-00028-004；黄雍呈蒋介石《管理伤兵改进意见书》，典藏号：002-080200-00949-120；何应钦呈报蒋介石以黄雍为残废军人生产事务局

筹备处处长，典藏号：002-080200-00520-082；李常宝：抗战期间的国军伤兵群体考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152-9页；陆九畴：我在第三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的见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纪实，政协江西上饶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吕文洁：抗战时期残废军人的救助问题研究，2017年辽宁大学硕士论文；匡丽娜：中央伤兵管理处曾设万县管理分处，重庆日报，2012年7月30日。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引用文献。

二、中央伤兵管理处及其下属管理处

中央伤兵管理处是奉蒋介石之命，1937年10月成立于南京，紧接着依抗战形势的演变，于1937年11月，1938年7月、12月相继迁移到汉口、衡阳和重庆。1940年5月，奉军政部之令改称“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抗战期间，广西、云南是除四川之外最重要的战备腹地，是安置伤兵治疗休养比较安全的地域，所以自1938年12月起，中央伤兵管理处在桂林设立了驻桂办事处，以加强与东南各战区、各省伤兵管理处及各院伤兵管理业务联系，直至1943年6月撤销。此外，军政部为安置尚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伤残官兵，专门于1939年6月成立了残废军人生产

事务局筹备处，以黄雍为处长。此机构与中央伤兵管理处救治安置伤残官兵的任务是一致的，只是它启动比较早，为伤兵安置预先做一些开拓农场、工厂的工作。1942年12月，该机构裁并到中央伤兵管理处。这也是身兼伤兵管理处专任副处长和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处长的黄雍的本意，以利于他一心专注于中央伤兵管理处的各方面工作。

中央伤兵管理处成立之初的编制是官佐100名，士兵69名，以后官佐又增加到118名，残废军人生产事务局并入后，编制扩增，仅官佐就达134名。1941年5月，中央伤兵管理处会计室编制改组为3课。8月，修正荣誉军人总管理处编制，将原管理课改为编训组，慰给课改为慰给组。另设归编、管训、经理、福利4课，并改总务课为总务科。

中央伤兵管理处作为军政部的一个正式机构，也必须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伤兵管理处成立两年多之后，1940年1月，奉军政部特别党部命令组织区党部。3月，中央伤兵管理处组织第一区分部，第六战区和第五战区荣管处分别组织第二和第三区分部。5月，第四战区荣管处组织第四区分部，四川荣管处组织第五区分部。1942年9月，荣誉军人实验工厂组织第六区分部。1943年5月，荣誉

军人第二农场组织第七分党部。1942年4月，处荣誉军人习艺所组织第九区分部。1943年6月，云南荣誉军人管理处组织第十区分党部。虽然各层级逐次建立了区党部、区分部，但一如国民党其他各级党组织一样，近乎徒有其名，并没有什么实际活动，以至党员连其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是谁都不清楚。中央伤兵管理处及其下属管理处机构见表2。

中央伤兵管理处下属主要是省和战区伤兵管理处，但有的伤兵管理处是在某市或地区设立，其级别与省和战区伤兵管理处同级，如开封伤兵管理处、鄂西伤兵管理处、奎陵伤兵管理处、贵阳伤兵管理处等，这是由于该地在战时的特殊地位，或所在该省部分地域已为敌人所占领。此外有一些省或地域伤兵管理处，随战局的演变和战区设置的需要被改为战区伤兵管理处，如开封伤兵管理处改为第一战区伤兵管理处，广西伤兵管理处改为第四战区伤兵管理处，湖北伤兵管理处改为鄂西伤兵管理处，再改为第六战区伤兵管理处，湖南伤兵管理处改为第九战区伤兵管理处等。有个别直属中央伤兵管理处的下级伤兵管理机构，不是伤兵管理处而是伤兵管理分处，如第八战区1940年7月成立伤兵管理机构时，是第八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分处，到11月才

表2 中央伤兵管理处及其下属管理处

中央、省及战区伤兵管理处及其附属机构	成立或变更时间	所在地	处长(主任)	副处长	编制	
					官佐	士兵
中央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南京	魏益三	郝子华	100	69
	1937年11月	汉口				
	1938年1月	汉口		黄雍		
	1938年7月	衡阳				
	1938年12月	重庆				
改称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	1940年5月	重庆				
中央伤兵管理处驻桂办事处	1938年12月	桂林			总处调充	
销荣军总管理处驻桂办事处	1943年6月	桂林				
成立残废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	1939年6月	重庆	黄雍			
裁并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	1942年12月	重庆			118-134	
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	1943年2月	重庆		伍瑾璋		
浙江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浙江	宣铁吾		6	13
江苏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江苏	刘绍先		6	13
江西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江西	廖士翘、谢溥福	杨杜甫、姚永安	6	13
万安修养村辖遂万一带医院,改为江西						
伤兵第一管理分处	1939年8月				13	5
赣县伤兵管理所辖赣南各医院,改为江西						
伤兵第二管理分处	1939年8月				13	5
湖北伤兵管理处改武汉	1937年10月	湖北	丁炳权	沈澄、王公遐	6	13
卫戍区伤兵管理处	1938年6月	武汉	郭鐵、沈澄	傅肇仁、王公遐	63	29
改为鄂西伤兵管理处	1938年12月	鄂西	沈澄		26	13
安徽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安徽	王锡钧		6	13
撤销皖南皖北分属三五战区	1938年6月					
开封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开封	文朝籍		6	13
无锡伤兵管理分处	1937年10月	无锡			15	9
奎陵伤兵管理所	1937年10月	奎陵			5	2
陕西党政军伤兵管委会	1937年10月	陕西	董钊		6	13
撤销成立西北伤兵管理处	1938年7月				58	31
下设南郑伤兵管理所	1940年1月				6	5
改组为陕西荣誉军人管理处	1940年7月		李家鼐、李圻		49	22
	1943年12月			张超, 庞棲山		
四川伤兵管理处	1938年11月	四川	何毅吾、宋人傑	袁家佩、华栋梁	26	13
	1942年9月			林锡钧		
缩编	1943年2月				31-27	22-16
下设 第一管理所	1940年11月	宜宾			8	3
第二管理所	1940年11月	忠县			8	3
第三管理所	1941年11月				7	3
贵阳伤兵管理处	1939年2月	贵阳	韩文娱	吴云庵、何鞍美	29	14
缩编为贵州荣誉军人管理所	1943年3月				8	5
云南荣誉军人管理处	1942年2月		张泰麟	魏季元	26	15
增编	1942年5月				36	19
下设第一管理所	1942年5月				5	2+1
开封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开封	文朝籍		6	13
改为第一战区伤兵管理处	1938年1月		文朝籍、郑毅诒	邵训	31	13
裁撤第一管理所	1943年2月					
第二管理所改为许昌管理所	1943年2月					
撤销第一管理分处	1943年5月					

中央、省及战区伤兵管理处及其附属机构	成立或变更时间	所在地	处长(主任)	副处长	编制	
					官佐	士兵
第二管理分处改陕县管理分处	1943年5月					
第二战区伤兵管理处	1938年7月		李家鼐、孟子哲		17	26
	1941年2月		郭进才、刘陞	张乐亭		
缩为第二战区荣军管理分处	1942年11月				21-18	14-12
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浙江	钟焕全、冯剑飞	张功铸、刘蕉元	6	13
	1941年7月	江西上饶	冯剑飞	刘蕉元		
	1943年1月	江西铅山				
第二管理分处	1943年2月	婺源			14	10
第四管理分处	1942年7月	建阳南平				
广西伤兵管理处	1938年12月	广西	陈恩元		26	13
下设霏川伤兵管理所	1939年2月	霏川			5	3
改组为第四战区荣军管理处	1940年11月		彭林生、林秉彝	刘起时、李文剑	35	28
下设怀远管理所	1942年7月				5-6	2-4
第五战区伤兵管理处	1938年5月		黄剑鸣	韦韬	28	13
下设 第一管理所	1942年8月				5-7	2-4
第二管理所	1942年8月				5-7	2-4
第三管理所	1942年8月				5-7	2-4
鄂西伤兵管理处	1938年12月	鄂西	沈澄		26	13
改为第六战区伤兵管理处	1939年6月			严尔艾	39	21
第一管理所	1943年4月	永兴秭归				
裁撤第四管理所	1943年4月					
第七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	1940年7月		辛森	张孚亨	35-27	8-21
第八战区荣军管理分处	1940年7月				18	9
第八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	1940年11月		拜伟	崔树椿		
下设天水管理所	1942年4月				6	3
湖南伤兵管理处	1937年10月	湖南			6	13
改为第九战区伤兵管理处	1939年1月		赵凌霄	周化南、魏季良	62	45
	1943年8月			伍景雯		
修正编制	1943年4月				59-54	44-36
下设 万县伤兵管理分处	1937年底	万县				
辖 第十重伤医院	1938年初	万县				
第十陆军医院	1938年初	万县				
132 后方医院		万县				
第四休养院	1938年中	万县				
第三教养院		万县				
下设 芷江伤兵管理分处	1939年3月	芷江			6	4
零陵伤兵管理分处	1939年3月	零陵			6	4
淑浦伤兵管理所	1939年3月	淑浦			5	3
湘泽伤兵管理所	1939年3月	湘泽			5	3
辰溪伤兵管理所	1939年3月	辰溪			5	3
新华伤兵管理所	1939年3月	新华			5	3
撤销第一、六、九管理分处	1943年4月					
第三管理所	1943年10月	宜章湘潭				
第十三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	1943年8月			刘蕉元调离		

注：编制“官佐 5-7，士兵 2-4”表明增编，官佐从 5 员增至 7 员，士兵从 2 名增至 4 名；反之则为缩编：官佐 31-27，士兵 22-16。

升到管理处。也有的伤兵管理处被缩编为管理所，如贵阳伤兵管理处1943年3月被缩编为贵州荣誉军人管理所，编制也由官佐29员减为8员，士兵由14名减为5名。所有上述改变都是因应战局演变，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做出的。

湖北地处华中，九省要冲，兵家必争之地，首府武汉更是国民政府西迁时的临时首都，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也是抗战初期主要的伤兵收容之地。湖北省政府颁布《设立伤兵管理处的训令》（湖北档案馆，卷宗号：LSI-4-0354-003），于1937年10月成立了湖北省伤兵管理处。军政部规定：战区和省伤兵管理处处长以资深之警备司令、保安处长、肃严司令等兼任之。这些行伍出身的长官有带兵经验，在士兵中有一定威信，有利于伤兵的管理。据此派湖北省保安处长丁柄权为湖北省伤兵管理处处长，沈澄、王公遐为副处长，并选定汉口唐家墩观音寺为处址。设立武昌伤兵检查所，以袁鼎动为主任。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期间，湖北省伤兵管理处一度改为武汉卫戍区伤兵管理处，以沈澄为处长，傅肇仁、王公遐为副处长。武汉沦陷后，省府迁往宜昌，武汉卫戍区伤兵管理处改为鄂

西伤兵管理处，沈澄为处长，傅肇仁、严尔艾为副处长。1939年6月又改为第六战区伤兵管理处。

全面抗战初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总共有伤残官兵15万人，江西就收容了5万人；全国伤愈出院伤兵7万余人，江西就有3万人；1938—1942年江西共收容伤残官兵27.74万人，1943年收容7300余人。整个抗战期间江西共收容伤残官兵33.47万余人，占全国总数的19%。1937年10月成立江西省党政军联合伤兵委员会，负责招待、收容、治疗、慰劳伤残官兵，并维持军风纪；11月，奉军政部颁发各省伤兵管理处组织大纲，成立江西省伤兵管理处；1938年1月，以上两机构合并为江西省伤兵管理处，后改名为军政部江西伤兵管理处（江西荣誉军人管理处）。1938年，奉军政部令，于吉安、萍乡设第一、二分处，并在赣县、临川各设管理所。1939年因战事转移，上述分处、管理所撤销，将万安修养村和赣县管理所升为第一、二分处，统辖江西省内各后方医院、临时医院、分所和休养院。

中央伤兵管理处及下属伤兵管理处都属军事机构，工作人员都有军衔。中央伤兵管理处处长魏益三是中将军衔，先后任副处长的郝子华和黄雍都是少

将。各省和各战区伤兵管理处的正副处长，也都分别为中将与少将，也有的分别为少将和上校。如浙江伤兵管理处处长宣铁吾，中将，黄埔1期；江西伤兵管理处处长廖士翘，中将，黄埔军校初期著名教官，军事教育理论家；湖北伤兵管理处处长丁炳权，中将，黄埔1期；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钟焕全，中将，黄埔1期；陕西党政军联合伤兵管理委员会主任董钊，中将，黄埔1期；第五战区伤兵管理处处长黄剑鸣，中将；第八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少将处长拜伟，上校副处长崔树椿等。上述中将军衔多是职阶军衔，不是经铨叙厅审定的官阶军衔。各下属伤兵管理处的处长军衔都比较高，但都是兼职，大多只过问重大事件，一般事务都是副处长处理。

下面以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为例，说明省或战区伤兵管理处的运作。该处设立于1937年10月。1938年4月，中国军队已经从南京撤退，第三战区也在皖南休军，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由军政部及中央伤兵管理处直接统辖，但是也受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监督指挥，处长及职员由军政长官及机关要员兼任。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每个月有2800余元的经费，分处经费每月各800余元，集合所有经费每月200余元，均由本处向中央伤管处领发”。荣

眷团经费则根据收容士兵的多少，由军政部核实发放，按月报销。前线战士官佐经医院治愈归队，第三战区伤管处依据规定发给官佐归队费官佐五元、士兵三元。另为伤愈而未归队的官佐士兵设荣誉团，除了教授文化科目外，还注重伤兵的精神教育，促进其精神健康发展。第三战区伤管处在金华、南昌等地征募棉被5600床。伤管处还注重培养伤员业余读书的习惯，规定每晨在办公前，各职员均须读书一小时，即以四书、三民主义、孙子兵法、曾胡语录、总裁抗战言论集及南岳军事会议训示集诸书，为标准读物。

下属伤兵管理处通常设秘书室（文件审核呈送）、管理课（各医院兵站伤病员管理）、宣慰课（伤病员宣传慰问思想教育）、督察室（代表管理处巡督所属兵站医院）、医官室。课设上（中）校课长1人；少校和上、中尉课员若干人；上（中）尉副官2人，专办事务性工作；少（准）尉司书若干人，负责文件拟稿、誊抄等工作；此外还有卫士勤务兵若干人。督察室设上（中）校主任督察1人，中（少）校督察若干人。具体各部门人员多寡，依据该下属伤兵管理处的总编制。编制最多的，如由湖南伤兵管理处改成的第九战区伤兵管理处，官佐62人，士兵45人（1939年1月），

1943年4月缩编后官佐也有54人，士兵36人；由湖北伤兵管理处改成的武汉卫戍区伤兵管理处，官佐63人，士兵29人（1938年6月）；西北伤兵管理处官佐58人，士兵31人（1938年7月）。不过多数下属伤兵管理处的编制并不太多，如浙江、江苏、安徽省伤兵管理处成立时只有官佐28人，士兵13人，这是由于随着战争的演变，这些地区逐渐沦陷，政府无法再进行运营。

表2中所列各下属伤兵管理处，或管理分处，或管理所，都辖制数量不等的医疗和康复机构，因过于细化，资料收集困难，也因版面限制，不能一一列举。表内仅给出江西伤兵管理处第一管理分处，原由万安修养村改制而来，这个管理分处就下辖遂万一带各医院；第二管理分处由赣县伤兵管理所改制而来，他们下辖赣南各医院。再如湖南伤兵管理处（第九战区伤兵管理处）下设的万县伤兵管理分处，就辖有第三教养院、第四休养院、第十重伤医院、第十陆军医院、132医院等，当然这后三所医院可能与军医署和战区兵站共同管理。万县地处长江边，战时转运伤员方便，可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第三战区的兵站医院设在浙江的常山、江山，江西的玉山、广丰，福建的浦城、莆田、邵武等很多地方，他们直属于军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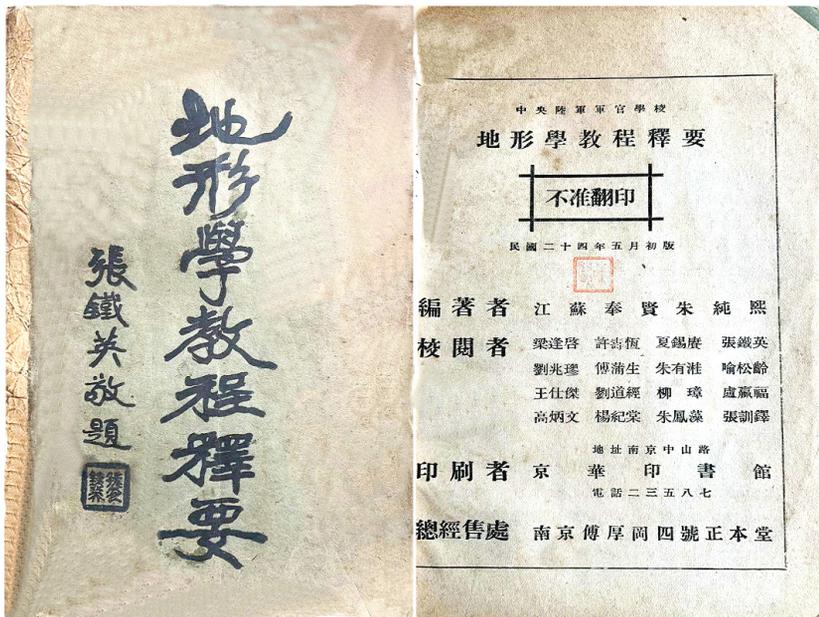
军医署，但伤兵管理处对其亦有管辖权和监督权，所以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不断派人到各兵站医院进行督导。1938年2月8日，黄雍在给蒋介石的《管理伤兵改进意见书》中，第一个建议就是健全管理组织。他指出直接指挥各医院的上级机关至少有4个：军医署驻某地办事处、战区兵站总监、战区伤兵管理处、各省伤兵管理处。系统复杂，管理方法迥异，常使医院管理出现混乱，需要改变。

细看表2会发现，某个下属伤兵管理处的结构里，有的记录不连贯。如第二战区伤兵管理处，1938年7月建立时的编制为官佐17名，但1942年11月缩编为第二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分处时，官佐却是从21名减至18名，比建立之初还多了1名，这说明这中间的4年多时间里，曾经增编过，只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一记录。再如第九战区（湖南）伤兵管理处，我们列出7个以地名命名的下属伤兵管理分处或伤兵管理所，并没有发现按数字排序的第一到第九伤兵管理分处，但却发现撤销第一、六、九伤兵管理分处的记录。类似遗漏随处可见，虽然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还是不能做到完善的地步，一方面我们感到遗憾和歉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查寻和考证历史资料的艰难。

我珍藏的中央军校《地形学教程释要》

□ 单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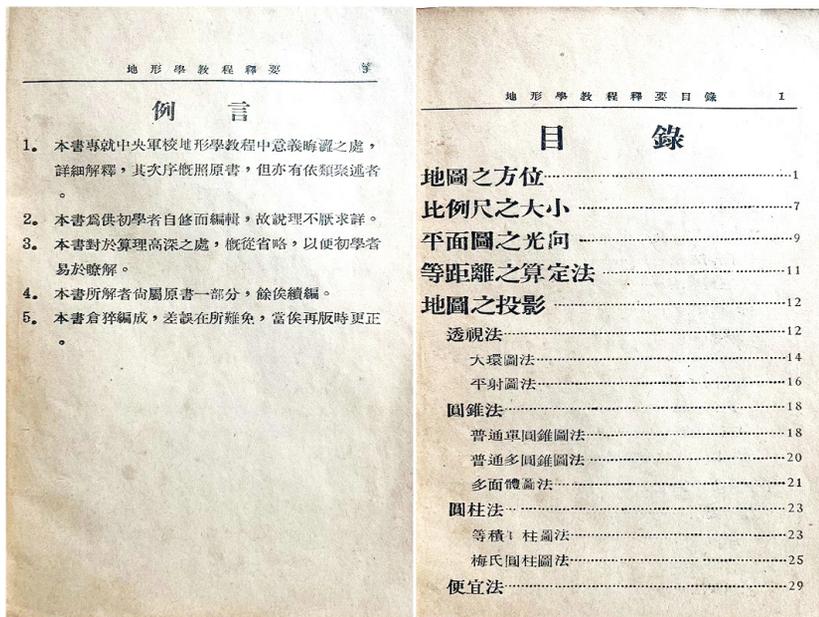
凡藏书者都非常在乎书籍有无版权页，或前言序语，因为它是了解图书出版及文献著录的主要信息源，所以每当意外买到心仪之书，还会搜索图书馆目录有无馆藏，有藏一二为稀少，无藏即是孤本。藏书家阿英在《海上买书记》中说：“获得了不经见的珍秘书籍，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这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欢快的心情，确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这种快慰之情，大概也是许多“嗜书如命”的藏书人所感同身受的吧！



/ 《地形学教程释要》封面、版权页。

同学同仁同撰序言

笔者在旧书网淘得一本《地形学教程释要》，平装，大32开，铅印本，274页，1935年初版，印刷者是京华印书馆，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发行。版权页印有大号铅字“不准翻印”，及铃印红色篆体“朱纯熙”名章，借以防伪。朱纯熙为本书编著者。朱纯熙，别号褒万，江苏奉贤人，江苏测绘学堂毕业后，入京师陆军测绘学堂高等科3期深造。1911年，服务于测量界，研究测量，积学有素，富有根柢，经验尤深。1929年10月，任全国测量



/ 《地形学教程释要》例言、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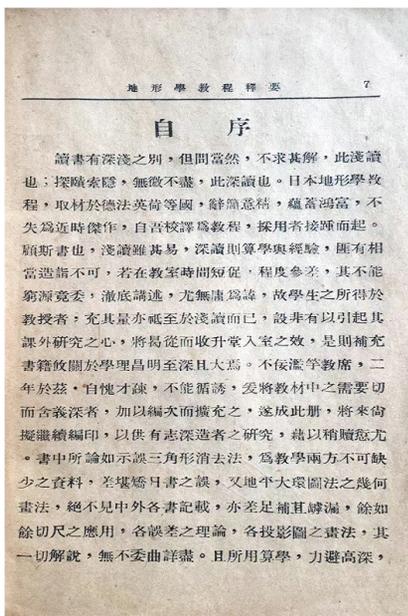
会议指导员，在南京陆地测量总局及中央陆地测量学校任职期

间，对测量事业多有建树。1934年，中央军校罗致其为上校地形

讲席。本书校阅者为其同仁：梁逢启（别号迪吾，江西赣县人，保定军校1期）、张铁英（别号保华，江苏青浦人，保定军校3期）、许寿恒（别号有常，江苏无锡人，保定军校3期）、刘道经（别号粹六，安徽望江人，保定军校3期）、朱有淮（别号云白，湖北江陵人，保定军校6期）、刘兆璆（别号讷庵，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8期）、夏锡赓（浙江富阳人，京师陆军测绘学堂毕业）、喻松龄（别号绮岩，江西南昌人，京师陆军测绘学堂毕业）、王仕杰（别号辉之，江苏江都人，南洋测绘学堂毕业）、高炳文（江苏盐城人，南洋测绘学堂毕业）、卢羸福（四川成都人，四川陆军测绘学堂毕业）、朱凤藻（江苏盐城人，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张训铎（别号警亚，江苏江宁人）、傅蒲生（江苏江宁人）、杨纪棠、柳璋。以上16位都是军校地形教官。上校地形教官张铁英题写了书名《地形学教程释要》。

关于成书经过，朱纯熙自序曰：

……不佞滥竽教席，二年于兹，自愧才疏，不能循诱，爰将教材中之需要切而含义深者，加以编次而扩充之，遂成此册，将来尚拟继续编印，以供有志深造者之研究，藉以稍赎愆尤……



/ 朱纯熙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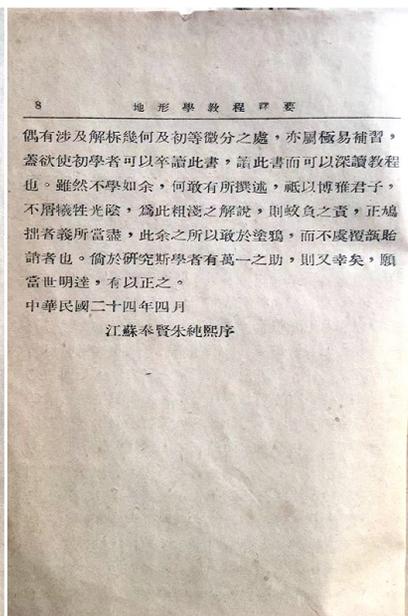
著者自序当然谦恭，而他序在前却众口交赞，兹将同学同仁同撰序言节录如下，以示读者。

同学李原序曰：

……中央军校地形教官朱君褒万，余同学也，出示所编《地形学教程释要》一册，以浅显之文字，述高深之学理，无图不详，无微不尽，且所述地平大环图法之几何画法，实为二千五百年来投影学者所欲解决问题，今乃解决之，其于斯学之贡献为何如……

同学曹灏序言：

……同学朱君褒万积学有素，适充军校教职，为欲激发学者之兴会，与增进授者之教材，不厌



悉心探讨，于各书所未述及者，从而详解之，扩充之，不独优于理论，捷于运算，妙于用法，而阐发新义，亦属不少……

洛阳分校教官夏锡赓序曰：

……同学朱君褒万鉴于学术之落伍，外侮之日亟，乃于教学余闲，编著《地形学教程释要》，意欲以此补助军事教育，其志甚可钦也。阅其书理论与实用冶为一炉，尤足引起研究者之兴味；如投影部分，详征博引，抉尽幽微；如余切尺与急造量距尺合用，爬罗搜剔，反复证验；如道线法，误差之探求，规条之疏解，诀窍纷陈，理由充畅；如交会法，示误三角形之消除，精度之探讨，簿算之证明，执简驭繁，详切实用；如误差说明，于立法原意，

范式由来，一以浅显而曲达之文字述之，莫不批隙导窾，迎刃而解。且其所述，颇多未经人道之处，远非坊本所可比俊；吾愿军校学生，人人澈底读之，以为他日制敌决胜之助，庶几不负作者之苦心也乎。

同仁同撰弁言：

……朱君褒万早岁研究测量，已富有根柢，及服务测量界，经验尤深，嗣就本校地形讲席，遂得共事一堂。近出其所著《地形学教程释要》，其中各种投影法，余切尺原理，余切尺与急造量距尺合用，误差规定之原理与算式，道线法、交会法各项立法之原意等等，皆有待于研究者，朱君莫不解释详尽；又示误三角形与交会点之位置，专用图解，无须实地证明，而阅之无不了然；尤以大环图法、几何画法之匠心独运，为中外书籍所未见；是于此书高深之理，阐发无遗，不独为地形测量参考之秘籍，抑亦我国军事学上伟大之贡献也……

综上序言所述，不难看出众教官一致高度评价《地形学教程释要》，目的是希望军校学生彻底读之，以为他日制敌决胜之助，而不负作者之苦心也！

黄埔14期炮科生陆嘉昌回忆：

地形学很重要，例如一个军作战，首先是要了解敌情和地形，决心要快。抉择是攻击，还是防御？假如军长决心是攻击前进，图上作业就要画出展开攻击的主攻和助攻的标志。我们要学会画伸缩及简易地图，而且还要会画详细地图。如教官要求我们用五万分一军用地图，圈定一个范围，要我们在这个圈定的范围，扩大绘成一万分一或五千分一的地图；比例不但要正确，而且绘制要比军用地图更好看。筑城也是按图实地作业，包括挖散兵坑、掩蔽部、轻重机枪阵地、交通壕，使之连成一个步兵连阵地。我们当炮兵的，还要练习马操、炮操等科目。作战移动中随时都要测量地形画图，运用三角几何、数学计算等。对于炮兵来说，必须计算准确，发炮才能命中敌阵。炮兵还要沉着，就是说敌方炮弹打来的时候也不要怕，这正是辨别敌方炮位进行回击的好机会。

黄埔18期2总队炮科生张锡珍（河北清苑人）回忆：

地形课非常重要，我们的第一任地形教官是南方人，口音很重，我听他讲话非常困难；第二任教官是上校王秀豪，河北饶阳人，听他讲课就比较有兴趣。学习测量科目时，需要两个同学配

合，一个是测手、一个是标杆手。标杆手负责放置标杆让你观测，高的地方就采用曲线形的方法，每个曲线按照比例计算，显示在地图上就是一个圈一个圈的，还会让你画地形图，制图要选点，用比例显示在地图上，连起来要表明村庄和道路之间关系，这基本是属于军事要图的范畴；我在最后测图的时候还受到了表扬。……在毕业考试的时候就不考测图了，而是给你一个情况图，让你去分析判断敌人在哪个地方，有高地的时候路怎么进去，如何消灭敌人，是包抄还是直接进攻等等。我们常说地图是“侦察员的眼睛”“行军的无声向导”“指挥员的左膀右臂”“协同作战的共同语言”，这些生动的比喻，足以说明地图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地形学教程释要》为黄埔军校教授四大教程（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之一，是学习识别与利用地形的一门军事学科，主要研究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军用地图和航空照片的识别与应用原理，战场简易测量方法以及标绘要图的基础知识。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对地形的研究和利用，认真研究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朱纯熙“咬文嚼字”



/ 陆地测量总局局长黄慕松。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认识到测绘全国地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开展了大规模地图测制工作。1914年，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制订并公布了“十年速测计划”，提出以全国面积迅速测量五万分一地图3.0591万幅，至1928年已由各省测量局测成3595幅。1929年10月3日至12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在南京召开全国测量会议，邀请各省测量局局长及代表参加，由局长黄慕松主持。会议在“十年速测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全国陆地测量十年计划（1930年至1939年）》；分两期加紧注重国境五万分一的测量，除西北沙漠地域可以缓测者4130幅及拟待第二期测量之蒙藏图5246幅外，其第一期应测者计1.762万幅，限于1939年以前制成

五万分一地图（限于篇幅，其他测量表述省略）；日后因抗战爆发，导致测量十年计划未能如期完成。

当时陆地测量总局上校技正朱纯熙受邀会商指导，其对于各省陆地测量局组织大纲中的用词提出修改意见，以旧部致函局长黄慕松，“赞同请于谈话中一微与会诸公，意见是否有当，尚乞钧裁”。另纸录呈如下：

查各省陆地测量局组织大纲第一条有“管理全省陆地测量业务”及“担任土地测勘事宜”等句，其意所谓陆地测量者系指三角、水准、图根、地形等测量，所谓土地测勘系指清丈田亩，但就表面而论，“陆地”“土地”之意义，一而二，二而一，实无区别，不如将陆地改为地形，土地改为地产（或地籍）较为醒目，盖三角测量在求地体之真形，水准测量在求地面之高低，一言以蔽之俱求地球之形状而已，故地形二字可以包括三角水准等一切之意义，以此名之似稍妥切；又田亩多为人民产业，清丈目的重在税收，名之地产似亦适当，或论前者可名大地测量，不知前者后者俱以国境为范围，本无大小之区别，况且实施地产测量非仅按田举丈，不将前者所包之，各种测量依次办竣，自必无从措手；今姑不问陆地测量局能

否兼办地产测量，但抱兼办希望以订组织大纲，要以明白规定为是，爰本上述意义，拟请该条改为“各省陆地测量局直隶于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兼受各省省政府之监督指导，管理全省地形地产测量业务及印制田地图籍各事宜”。

黄局长阅之，大加赞赏，将文会商，集思广益。后来，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去掉“陆地”二字，改称中央测量学校，与此不无关系。

测量学校沿革概要

中国办理新式测量教育，始于清廷陆军参谋处所办北洋测绘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时设立，请外国人为教习，调北洋军队中优秀人员入堂学习，培训测绘参谋人才，虽仅办一期即告终止，但为中国办测绘学校之始。

迨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始由北京练兵处创设测绘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改名京师陆军测绘学堂，模仿日本正式测量教育之办法，学课及实习兼施，造就中央基本测量人才。先后招考高等科（研究班）三角、地形、制图三班，毕业64人。旋为谋全国测量技术之一致，于宣统二年（1910年）成立模范班，由各省陆军测量局选送各省测



/ 陆地测量学校校长吴德芳。

绘学堂毕业生，或现职技术人员入学，计毕业70人。时在校执教者，除一部分留学日本返国之测量先进外，复聘有日本测量顾问多人，分任各班教官，教学规模，于是奠立。宣统三年（1911年）复招考寻常科（正班）分三角、地形、制图三班，未几停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于4月将前清京师陆军测绘学堂改组为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隶属参谋本部第六局，校长先后为李番、吴德芳（湖北江陵人，留日陆地测量部4期）、张振声，校址在北京西城祖家街（原京师陆军测绘学堂旧址）。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其学制一循前规，赓续接办尚未毕业之第1期寻常科。至1915年更举办高等科，以为造就高级干部及师资之需，所



/ 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文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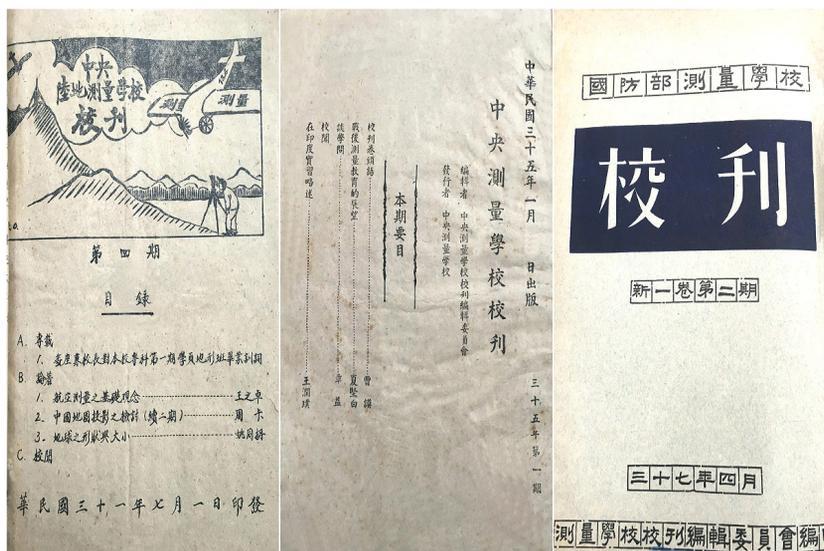
有学员均由各省测量局保送曾在测量学校寻常科毕业生，且服务二年以上者，入校深造，并聘请欧美测量专家来校担任教授，对近代西方测量学术多所灌输。1921年以后，因经费时常中断，学校停顿，文卷图书散失无存，终于在1927年7月因经费支绌而停办。设在北京的参谋本部第六局、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北京陆军测量局、制图局合并，缩编为军事参谋署陆军测绘总局。至此计历办高等科（研究班）4期，模范班1期，寻常科（正班）4期，共毕业600余名，均分派中央及各省测量局服务。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测量事业为政治军事及各种建设事业之基础，爰就江苏测量局原有规模，改组为陆地测量总局，直隶参谋本部。局长黄慕松（广东嘉应人，日本陆军大学1期）。当时测量人才不敷应用，就在测量总局内划分场所，办理测量教育。鉴于世界航空测量学术之发达，乃于1930年秋，举办航空测量研

究班一期，由各省测量局选送有地形测量经验的技术人员来班受训，所有教官及仪器，均来自德瑞等国，测量技术获显著进步，同时为制图业务需要，举办简易科（训练班）制图班一期。

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停顿3年之后，1931年春，当局深感测量人才缺乏，遂本校在南京大石桥正式恢复，改称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校长先后为黄慕松、刘器钧（湖南宁乡人，留日测量部3期毕业）。初仅招地形、制图两班学生，是年夏复招三角、航测、制图三班。1933年3月，招2期三角班一班，及简易科（训练班）地形、航测、制图三班；9月续招三角班及2期航测班各一班；10月收同济大学测量系附属实习生一班。又因边疆国防测量之重要，1934年5月，招考边省学生来校肄业，名曰边区地形班；同年秋，续招2期制图学生一班；收同济大学测量系第2期附属实习生一班。1935年3月，招简易科第2期航测班学生一班；9月收同济大学测量系第3期附属实习生一班。1936年夏，由各局队保送职员来校受训，定名为三角研究班及航测研究班。是年调整学制，奉令改学制为本科（三年）、专科（二年）、简易科（一年半）三级；7月招收简易科第2期地形班及制图班各一班，依新制学生当送中央军校

入伍，计有60名在五校（军需、军医、兽医、测量、兵工）入伍生营受训10个月，入伍期满，回校授课。9月由局队保送学员一班入校实习测绘训练；同月收同济大学测量系第4期附属实习生一班。1937年全国十年测量计划颁布，因人才缺乏，奉令扩充班次，致原有校舍，不敷设置，乃呈准于南京中山门外麒麟门附近，征收校地，建筑新舍，图样设计，甫经就绪，而抗战军兴，从此因战局变化而经历了9次迁校。是年秋，本校第一次奉令迁湘，在湘校舍，先借用四十九标，后迁长郡中学旧址，校址既定，复召集在南京检验及格之新生，来湘笔试，录取专科三角、航测及简易科第3期航测、制图共四班。1938年春，续招专科第1期地形、制图各一班；是年秋，第二次本校奉令迁桂林七星岩侧。1939年春，广东陆地测量学校归并本校，其原有之地形班，改为专科第2期地形班，制图班改为简易科第4期制图班。1940年春，第三次本校奉令迁黔省镇宁之文庙，时军事委员会规定，中央各军事学校校长均由委员长兼任；5月，委员长蒋介石兼中央测量学校校长，原校长刘器钧任教育长；夏间就本校及各省局队历年简易科出身学生甄选来校，授予专科教育，开办专科第1期学员班地形、航



/ 测量学校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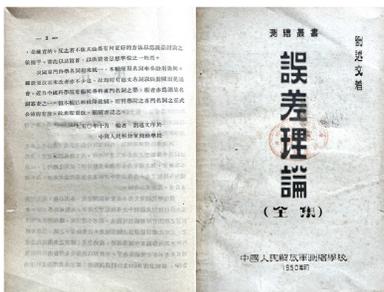
测、制图三班，同时复招专科第2期三角班。1941年夏，续办专科第2期学员班地形、航测、制图三班，并招专科第3期地形班学生一班；冬间应环境之需要，附设制图训练班学生一班。前与同济大学所订教育协定，为每年由该校送测量系学生来校实习，先后仅履行四期，该协定遂因抗战迁校而中止。

1941年秋，为适应战时环境，本校将简易科改为战时训练班；同年，又在陕西开办了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第一分校。1943年，本校第四次因镇宁过于偏僻，而迁至贵阳南厂兵营。时曹谟（1897年生，浙江兰溪人，北京测量学校高等科毕业，留学德国、芬兰）任教育长，迁新址后，本校进行了业务基础建设，增聘教授，改良学制，增设各种测量实验室，并派部分优秀教

师赴印度留学。1944年秋，增设测量仪器制造科。11月，因日寇侵入贵州南部，本校进行第五次迁移，由贵阳迁到重庆北碚，在澄江镇附近租民房和利用部分原有公房继续进行教学工作。

1945年2月，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改称中央测量学校，隶属军令部。学制改为研究班、正班（大学部）、训练班三级，分大地、地形、航测、制图及测量仪器等五科，并成立教材编译委员会及教育研究会。聘请驻北碚的复旦大学教授兼课，考选部分人员分别到美国和印度留学。8月抗战胜利后，中央测量学校大学部招生，学制4年。时各军事学校所设分校奉命一律裁撤，中央测量学校第一分校结束。

1946年6月1日，军令部第四厅迁南京，改称国防部测量局，晏勋甫任局长。本校第六次奉令



/ 刘述文著《误差理论》。



/ 地形图图式。

从北碚迁到重庆松林坡原中央大学旧址，新校址与重庆大学为邻。1947年4月，杜心如继任局长。因南京原校舍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破坏，本校第七次奉令迁移苏州洋关。10月，军令部中央测量学校奉命改为国防部测量学校，直隶国防部。蒋介石不再兼校长，曹谔任校长，古振今任教育长。1948年8月，国防部测量局迁往广州。1949年春，本校进行第八次迁址，由苏州迁往广州黄埔港对岸的深井村，大学部在瘦狗岭地区实习，其余坚持上课。7月，本校第九次奉令由广州迁到台湾省花莲港。此前本校曾出版阅读刊物《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校刊》《中央测量学校校刊》《国防部测量学校校刊》。该刊以报道校内外人事动态，加

强同学之间的联络与团结，增进外界对测量教育及测量事业的认知和理解为宗旨。其栏目设有特载、论著、译述、校闻、校友动态、测界消息、杂俎等。

溯本校自1912至1949年，计毕业研究班（高等科）2期，119人；正班（寻常科、专科、本科）18期，1211人。训练班（简易科）12期881人；共毕业学员生2211人；训练班毕业出校任三等测量佐（少尉），正班毕业出校任二等测量佐（中尉）或一等测量佐（上尉），具有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学籍登记证。该校迁台前，有许多毕业学员生及教员都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测绘事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例如：

刘述文（1892—1971），湖北钟祥人，大地测量学家。192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地测量学校高等科，曾任中央陆地测量学校主任教官，分校主任，贵州大学教授，苏州测量学校大学部特约讲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教授、副院长，是中国现代最早从事天文大地测量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主要著述有《重力测量学》《误差理论》等。

吴忠性（1912—1999）安徽肥东人，测绘制图学家。1936年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制图班毕业，任测量总局技术员。1942年调中央测量学校任教。1945年被

派往英属印度测量科学研究中心进修，回国后于1947年升任测校地图制图系主任教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配至解放军西南军区测绘分局制图科任科长，为解放军进军西藏夜以继日赶制出行军路线图，受到上级嘉奖。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制图系主任。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国测绘学会理事、制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测绘学报》杂志副主编、国家科委测量制图组领导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大地图集编委会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部推荐吴忠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副军级待遇，被誉为“测绘将军”。1999年6月，吴忠性在京逝世，享年88岁。著述有《制图学》《地图投影的选择与设计》等。

参考书目

- 1.《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发行。
- 2.《中国测绘史（第二卷）》，测绘出版社1995年发行。
- 3.民国期刊《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校刊》《中央测量学校校刊》《国防部测量学校校刊》。
- 4.《海上买书记》，作者阿英，载《小说闲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
- 5.《全国测量十年计划》，1930年2月出版。 



1926年4月19日,黄埔军校任命 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代本校教育长

□ 贾晓明

方鼎英是著名爱国将领，曾于1925年至1927年间在黄埔军校担任入伍生部中将部长、教育长、代行校长等重要职务。自1926年4月19日担任入伍生部部长兼代本校教育长后，他运用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专业知识，在新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普通科学的补习等多项工作上颇有建树；他在军校实行诸多军事教育改革，为北伐培养出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在危急时刻，他毅然挺身而出，掩护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事业保存了力量……他的黄埔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中山舰事件”后，劝说谭延闿“从长计议”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痛斥蒋介石不经过党代表附署就擅自调动部队，是“造反行为”，要谭延闿出面组织各军团结起来，调兵共同讨伐蒋介石。谭延闿便召集第2军高级军官进行研究，2军军官纷纷表示赞成该计划。谭延闿在



/ 方鼎英。

众军官的催促下，正准备乘火车前往北江的2军防地，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的方鼎英突然来到会场。方鼎英虽然和谭延闿及2军军官都交情颇深，但与会者认为他是蒋介石的说客，没人理他。等众军官散去，只剩谭延闿时，方鼎英才开口询问。谭延闿回答说“介石发疯了”。方鼎英为谭延闿分析说，国民革命军各军犹如兄弟一样，今兄弟之间，既然“有一个发了疯，那么其余兄弟，只能想方设法，为之治疗，使这个疯病者快些好，才

是兄弟间应尽之道。如听汪精卫的一时冲动之词，要其他兄弟，调兵遣将同这发疯的兄弟动起武来的话，这疯子已经是动了手而乱来的了，还怕你们去打他吗”，结果只有两败俱伤。言毕又劝谭延闿要以“大局为重”，作为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年龄最长，资格最老，而且是唯一能够说话的人”，应该“马上提出顾全大局的意见，征求各军同意，然后同去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蒋介石必说出理由。如其讲得对，则协商采用之；不对再说服纠正之，任何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实际上，谭延闿并非军人出身，他以“政治手腕老练圆滑”著称，平时“不大接触实际政治问题”，更“不会有逆水行舟的勇气”（张国焘语）。听了方鼎英的话，便把“武力反蒋”改为“居间调停”。而此时的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尚未丰满，也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姿态，先是把“中山舰事件”说成是“误会”，然后一面表示“事先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辞……自请从严处分”，一面提出将直接参与

行动的如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欧阳格等人免职查办，更派人登门向谭延闿表示“可以和平解决”，并请求谭延闿带一封信给汪精卫，请汪谅解。于是谭延闿约同朱培德一起去了汪精卫处，将信交给汪精卫，还劝汪精卫说，蒋介石“平常就有神经病，我们还是再走一趟，问问他想什么和要干什么再说”。22日，在汪精卫家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特别会议上，谭延闿带着蒋介石到来。随着苏联顾问选择“退让”，表示不“反蒋”，谭延闿等人也都选择“默不作声”，“甚至对蒋介石表示同情”。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事前反对此举动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也。”

汪精卫称病不出后，4月16日，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在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同时，谭延闿被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

教训何应钦

方鼎英前后两次留日学习军事共计11年，遍读日本军校，其学习军事的学历与军事学识、才能，为蒋介石所赏识。方鼎英任教育长后，认为“想教好学生，必须先有好先生”，为延揽教官人才，就向蒋介石提出：“今则教育长以上皆是中将级，甚至主任

教官，也是将级地位的居多，望今后用人尺度要放宽些。”蒋介石听后立即采纳他的意见。蒋介石是留日陆军士官出身，所以学校制度大都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框架建设。方鼎英得到许可后，注重延揽留日军人为军校教官，授予他们高军阶待遇。在此政策下，一批“留日陆军士官第3、4、5、6期同学，曾入日本陆大，且任过将级职务多年”的资深军官纷纷进入学校任教，一时间“人才日益集中，教学各方向，都成绩显著，声誉亦较前更高”。

一天，何应钦来找方鼎英，反对他任命张春圃为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可能是怕其他在场的人听到，何应钦进屋使用日语问方鼎英：“张春圃这家伙是谁找来的？”方鼎英深知何应钦和张春圃之间结怨很深（张春圃、何应钦、谷正伦曾共同就读于东京日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又一起效力于黔军王文华麾下，并参与了王文华向其舅父刘显世夺权的斗争。王文华被刺身亡后，张春圃曾支持谷正伦和何应钦火并，最终把何逐出贵州），本来打算从中弥合，但听了何应钦说的日语修辞中竟毫无对“先辈”学长的尊敬之意（方鼎英为振武学校第8期，何应钦为第11期），且态度骄傲狂妄，感到何应钦对自己的用人方法横加干涉，于是想教训一下

这个“后辈”学弟，便生气地说道：“怎么？此人是我找来的，他与你同期，且与你同在贵州任过旅长多年，我找他来学校教书，也是找错人了吗？”何应钦说：“这家伙在北洋军阀吴佩孚那里乱钻的人，今天也钻到我们的革命军里来，我们只好卷着被包走好了。”方鼎英说：“你讲这些是什么话！大丈夫不北走胡必南走越，我们不去找张春圃，你能禁止吴佩孚要他吗？张在汉口闲居很久，我才找他来的。吴佩孚那里，他并没有去钻，或者钻也并没有达到目的，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人，你何必这样小瞧人家呢？”何应钦听后，只得悻悻而退。

何应钦走后，方鼎英立即去找蒋介石，把此事加以汇报，并对蒋介石说：“张春圃是得你同意我才找来的，何应钦竟这样奚落人家，叫张春圃怎么工作呢？”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留学时为第10期，也是方鼎英的“后辈”学弟，平时在军校还和师生谈起过，听即便说：“敬之（何应钦的字）真是小器，你好好安慰张春圃，要他不要理这些好了。”

“清党”期间尽力救助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广州当局奉蒋介石命令，准备于4月15日开始“清党”。4月14日，

方鼎英到广州开会，在得知蒋介石的命令后，当即提出，命令上只写着“清党”，并没有写“要杀共产党”。他提出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3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3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到5个月。同时还特别提出，军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熊雄“对学校有功绩的”，“拟请他赴法留学”，同时告诉在座的国民党党政军高官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出什么问题”。在方鼎英的力争下，其要求得到同意。

实际上，在当天夜里，广州市内广东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等均被查封、缴械，并开始“下令驻省之入伍生团营执行逮捕”。4月15日，方鼎英赶回黄埔军校，传达“3日之内，或自动报名承认，或请假支薪离校，听各人自愿”的“清党”原则，又于当夜找到熊雄谈话，将广州国民党当局的“清党”计划和盘托出，并提出为熊雄提供川资和交通工具。熊雄听后义正词严地斥责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表示要

“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

经方鼎英的一再劝告，熊雄接受了方鼎英的意见，但表示：即使要走，行前也要与军校师生讲一次话，方鼎英答应熊雄的要求。随后，熊雄立即召集军校政治部中共支部的干部开了个简短的会议，向大家通报了与方鼎英谈话的内容。党员干部们都劝熊雄离开军校，但熊雄坚持要与全校师生告个别、光明磊落地离开，并要求党员干部们听从中共广东区委指示。16日早晨，方鼎英召集全校师生到校本部礼堂。在礼堂，熊雄作了简短讲话，他勉励师生们恪守中山先生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师生们将熊雄送到码头，登上方鼎英为他准备的汽艇。

由于方鼎英争取到3天的时间，黄埔军校的“清党”直到4月18日才开始进行。军校内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进步青年，得以安全离校，从而“保护和挽救了大批革命力量”。方鼎英的这些举措，受到校内如邓文仪、胡靖安等的极力攻击，并向南京控告方鼎英破坏黄埔军校“清党”，“给资放走CP首领熊雄等多人”。“清党”后不久，方鼎英便辞职离开了黄埔军校。

然而方鼎英并不知道的是，熊雄乘汽艇开出没有多久，便遭到国民党广州当局违约布置监视黄埔的军舰的拦截，被秘密逮

捕。熊雄被关押在广州市公安局，后转到河南南石头惩戒场囚禁。1927年5月17日，熊雄被秘密杀害，终年35岁。直到两年后，方鼎英才得知熊雄遇难的消息，感到万分悲痛，多年后，还以“误熊者实我自己”而自责。

和成仿吾的“彼此一笑”

方鼎英和成仿吾是同乡，又同在日本留过学，彼此很熟。成仿吾于1917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专攻枪炮专业，刻苦钻研炼钢、枪炮、弹道学、鱼雷水雷等课程。1921年5月，成仿吾回到湖南，在工业学校任教，并兼任长沙兵工厂技正（总工程师）。第二年10月，他辞去兵工厂技正之职，赴上海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并主持创造社社务。1924年6、7月间，创造社的几种刊物被北洋军阀相继查封，成仿吾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在广东大学理学院任物理力学主任教授，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同乡方鼎英得知成仿吾来广州后，深知他的才能，立即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担任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主讲时事兼授历史、地理课程。

同年11月底，因长兄病逝，成仿吾回原籍探望。1926年3月，他回到广东，仍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两处任教——住在广东大学校内教职楼的二层，每周

乘坐汽艇去黄埔军校工作两日。不久，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成立，他又兼任该分部主任。

1926年6月，黄埔军校奉命组织兵器研究处，并于同年7月正式成立，由教育长方鼎英兼兵器处处长，成仿吾任兵器科技正。方鼎英任军校代校长后，成仿吾接任兵器处处长。这一时期，成仿吾潜心于兵器科学研究，并多方奔走，筹集经费、器材，调查国内各兵工厂的分布状况及生产能力。在1926年12月21日召开的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处务会议上，成仿吾作了工作报告，提出为“使我们可以得到很切实的成绩”，必须克服重重困难，“不论在哪一种工作上，我们应该更努力些”，得到方鼎英的赞许。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宣布“清党”，

成仿吾虽然“言语激进”，但不是共产党员，又有方鼎英保护，没有受到迫害。在白色恐怖中，成仿吾与郑伯奇（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兼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商量后，决定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不久，郑伯奇先走，而成仿吾因在军校兵器研究处任职，一时不能脱身。后来，由方鼎英出面，派他去日本为黄埔军校采办军用化学班器材，成仿吾遂利用这个机会，于7月30日携款5万日元前往上海。

在上海，成仿吾用这笔经费，除按原订货协议购买了一些器材外，因潘汉年曾告诉他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活动经费十分困难，便从这笔款项中拿出1万余日元交给了潘汉年，作为资助。此外，还利用这笔款项贴补了创造社一部分经费，并给郭沫若夫

人安娜留下1000日元的生活费。此后，成仿吾前往日本，于当年年底回到上海，但并未归校，结果黄埔军校内某些人便把此事说成方鼎英“包庇、私放共产党和破坏清党的罪证”。其实，当时成仿吾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成仿吾在上海与离开黄埔军校的方鼎英会面。方鼎英问成仿吾：“你的任务完成了吗？何以不回学校去做交代？”成仿吾回答说：“你尚且被赶走，我回去向谁交代？”方鼎英又说：“你不去交代，当局会下通缉令让你交代的，你小心点吧。”成仿吾则回答说：“嘿，他们现在通缉我，将来是谁通缉谁吧！”于是两人彼此一笑而别。不久，成仿吾赴巴黎从事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黄埔后代”栏目征文启事

长期以来，生活在海内外的黄埔后代，在传承黄埔精神、践行黄埔使命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做出了特殊贡献。为了记录黄埔后代的故事，展示黄埔后代的风采，激励更多的黄埔后人继承黄埔先辈的伟大志业，赓续黄埔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本刊“黄埔后代”栏目向广大黄埔后代征文。

征文要求：1. 内容为黄埔后代在先辈“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感召下，传承和弘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推动祖国

统一大业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故事、做出的贡献；2. 稿件请附本人简历、文章配图及图片说明；3. 稿件中注明作者电话、地址、邮编等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稿件、图片请尽量提供电子文档，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黄埔后代”；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电子邮箱：hpzszs88@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电话：010-58336325

联系人：曹燕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 (七)

□ 熊子杰

第七章

中国在台湾地区的第一个政府机关：元朝巡检司

还记得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吗？一首台湾早期民歌。在公元1281年，元朝就在这美丽的澎湖岛上设置中国在台湾地区最早的行政机构——澎湖寨巡检司，或称澎湖巡检司。

自秦朝，台湾就以不同名称出现在中国历代史书中，但由于航海设施及技术未成熟，关于两岸之间交流的相关史料并不多。

《三国志》及《梁书》中多次提到东吴因靠海地缘关系，有航海技术及设施优势，一直积极向海外探索，史书上就曾记载公元230年，东吴曾派军队到当时的夷洲（台湾）。

吴帝孙权派卫温等航行到达夷洲，并记录下当时岛上居民的生活及习俗，尤其在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中国首次较为详细具体地记叙了夷洲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住民的习俗及生活情况，可印证两岸往来频繁，也激励及带动更多汉人来台贸易、经商及移民。



/ 美丽的澎湖湾。

到了隋唐，两岸往来逐渐密切，隋代对台湾的经营更为积极，据《隋书》记载，隋炀帝为“求访异俗”“志求珍异”，曾先后三次派人招抚流求（即台湾），留下两岸交流的重要历史里程碑。在隋末唐兴时，隋民跟着陈稜后裔及旧部避走台湾，是台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性的汉人移民台湾行动，当时地点就是今日台南市中心。

中国唐宋时期，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东南沿海居民纷纷渡海避乱，许多人选择移居到

澎湖、台湾，在台澎地区形成许多汉人聚落。宋代《汪公行状》中记载，1171年（乾道七年）汪大猷当泉州郡守，当时海上有沙洲数万亩，称为“平湖”。时有毗舍邪人侵入，割尽人民所种的作物。后来，为保护当地百姓的利益，汪大猷在平湖建造房屋200间，派军民屯戍。这里所说的“平湖”，就是澎湖。稍后，宋人赵汝适的《诸番志》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澎湖已有不少居民，而且已经在从

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

随着大陆汉人不断迁居台澎地区，宋朝政府也开始加强对澎湖的管理，在宋朝乾道年间已派兵到澎湖巡防，并在澎湖驻兵防守，澎湖行政划分在福建晋江县辖下，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在台澎地区派军驻防。

在宋朝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多次派员出使日本，要求镰仓幕府对中国朝贡，皆遭推托拒绝，元世祖于是出兵渡海征讨日本，但两次出征皆失利，元朝损失惨重。元世祖于1281年（至元十八年），在澎湖群岛设置澎湖巡检司（或称澎湖寨巡检司），并将澎湖划分在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之下，准备迂回澎湖，再取台湾，为第三次出征日本做准备。据元代《岛夷志略》记载，当时台湾东部高山峻岭，林木葱郁，西部平原土地肥沃，种植黄豆、黍子。大陆商人将大陆的瓷器等货物运到台湾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换硫黄、黄蜡和鹿皮。由于元朝大陆商人经常往来两岸经商，许多汉人已定居澎湖及台湾，因此元朝设置的澎湖巡检司除了负责澎湖巡逻，还兼办查缉罪犯及征收澎湖盐税。

元朝设置澎湖巡检司是中华民族首次在台澎地区设立行政机构。澎湖寨巡检是元朝于澎湖群岛设置的官职，也是中国台澎地区首度出现的正式地方官



/ 元朝澎湖巡检司。

员（前澎湖列岛归属于晋江县管辖），是元朝最基层的官员，隶属于福建泉州府。

元世祖忽必烈对两次出征日本的惨痛失败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在1283年（至元二十年）又下令建造船只军舰，屯集粮草，准备第三次出征日本，此举却引起群臣反对。此时元朝国力空虚，国内动乱，元世祖在群臣劝阻下放弃第三次出征日本计划，此后对海上拓展疆域及征战变得极为消极。直到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逝世，元朝都未再出征日本。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朝海船副万户杨祥请求带兵6000人前往流求（台湾）招降。同年10月，元朝命杨祥为宣抚使、吴志斗为礼部员外郎、阮鉴为兵部员外郎，往使流求，这是元朝经略流求的滥觞。

1297年（元贞三年），元朝政府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元朝行政体系，“行中书省”类似今日的省，受中央直轄）。

1384年（洪武十七年），明朝开始采锁国政策，施行禁海令，将澎湖巡检司废除。直到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日本海寇骚扰中国临海省份，明朝考量东南沿海省份居民的安危，又重启澎湖巡检司，直至1622年（天启二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才又终止澎湖巡检司工作。

1623年11月，福建巡抚南居益袭击荷兰战舰。

1624年，明军于澎湖海战击退荷兰人，荷人便转往台湾发展。

1628年（崇祯元年），明朝政府福建巡抚熊文灿与郑芝龙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台湾拓垦，熊文灿与郑成功提供饥民钱及耕牛，将他们带到台湾开垦种田，当时随熊、郑移民的有数万人。

1661年（永历十五年），郑成功出兵攻台湾时，从金门料罗湾出发后首先抵达澎湖，自此澎湖归于郑氏王朝（明郑）统治。

1664年（永历十八年），郑经设澎湖安抚司，这是自明朝1622年起不再设置澎湖巡检司之后，时隔40年后澎湖再次设有政府官署。

元朝于1281年在澎湖岛上设置澎湖巡检司，是中国在台澎地区最早的行政机构及行使治权的象征，此后明清皆延续元朝制度，设置类似的机构。